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1919 年 5 月至 1921 年 6 月)	1
一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	1
二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	6
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2
四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4
五	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	20
六	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	2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 年 7 月至 1923 年 12 月)	28
一	华盛顿会议和帝国主义共同分割中国	28
二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和革命纲领	30
三	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36
四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	44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结语	48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对立 (1924 年 1 月至 1926 年 7 月)	50
一	1924 年至 1927 年政治形势	50
二	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农民运动的兴起	53

三	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59
四	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根本思想·····	68
第四章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革命的失败(1926年	
	7月至1927年7月)·····	78
一	北伐战争中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78
二	中国共产党内在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84
三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92
四	武汉时期政治形势·····	99
五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对革命的危害·····	10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语·····	109
第五章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1927年8月	
	至1931年9月)·····	112
一	革命转入低潮·····	112
二	中国革命由进攻到退却的转变过程·····	118
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123
四	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126
五	红色地区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政策·····	133
六	红军建设和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141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纠正党内“左”倾路线(1931年9	
	月至1935年12月)·····	148
一	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	148
二	全国抗日反蒋高潮·····	150
三	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有利革命形势的 丧失·····	154
四	“左”倾冒险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158

五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165
六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170
第七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和组织（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	175
一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175
二	国民党欧美派抗日倾向·····	177
三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182
四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84
五	逼蒋抗日·····	189
六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197
七	奠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	19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语·····	203
第八章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	205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205
二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208
三	中日战争发展规律·····	215
四	纠正新投降主义·····	221
五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226
六	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233
第九章	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1941年1月至1942年12月）·····	240
一	人民抗日战争的困难局面·····	240

二	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	243
三	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方针·····	252
四	对敌斗争中的民兵·····	256
第十章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3年1月至1945 年9月）·····	260
一	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260
二	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264
三	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基本政策·····	270
四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274
	抗日战争结语·····	278
第十一章	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斗争（1945年9月至 1946年6月）·····	280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280
二	新的国内战争的威胁·····	283
三	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	285
四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支持下部署反共 内战·····	289
第十二章	人民解放军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6 年7月至1947年6月）·····	295
一	人民革命战争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	295
二	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300
三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和国民党政治欺骗 的破产·····	304
四	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307
第十三章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1947年7月至1949	

年 10 月)·····	311
一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311
二 中国共产党的新区政策和新解放城市政策·····	321
三 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	323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33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语·····	338
第十四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 (1949 年 10 月至	
1952 年)·····	340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际关系·····	340
二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343
三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	
巩固·····	349
四 民族工作的胜利·····	354
五 全国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	358
六 中国职工运动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整党	
建党工作·····	366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1953 年至 1956	
年 6 月)·····	371
一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	371
二 我国的和平和统一政策。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	379
三 肃清反革命运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387
四 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390
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结语·····	400
出版说明·····	402

第一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1919年5月至1921年6月)

一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

中国是世界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国的社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中国的农民同时是手工业者，他们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自然经济占主要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有全国性市场的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例如瓷器业、绸缎业等。手工业工场是一种以雇佣工人的分工协作和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手工业工场同手工业相接近，因为它的基础仍然是手工技术；手工业工场又同资本主义工厂相接近，因为它是剥削雇佣工人为基础的大生产。所以手工业工场是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的阶段。手工业工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还没有成

为支配的生产形式。它主要地是在某些经济发展较高地区（例如长江以南）发生和发展起来，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还没有占支配地位，手工业中许多主要部门也还没有发展为手工业工场。整个来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还没有进入手工业工场时期。虽然如此，在这些手工业工场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按照自己独立发展的规律，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将缓慢地但又必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当中国社会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时候，欧美的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此中国社会的独立发展因而中断了。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是和它本身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资本主义列强曾经多次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由于战败的结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规定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承认协定关税，承认领事裁判权，承认传教自由等等。那时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这些条约为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因此对外侵略带着新的历史特点，即资本输出逐渐加强，侵略形式更带着垄断性质，其结果对中国的争夺更为激烈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充分地说明了这个历史特点。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

“马关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此后，帝国主义日益增多地到中国来创办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控制了中国的工业和金融；同时由于对中国进行政治借款而操纵了中国财政和中国政府；由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作为侵略基地而展开了分割中国的斗争。

帝国主义还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作为它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它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奴颜婢膝地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并为它效劳。帝国主义援助过清朝政府来扑灭太平天国革命，又支持过袁世凯来绞杀1911年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反动势力结成了同盟。这样，封建剥削制度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但仍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相结合，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

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方面，分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用倾销商品和搜刮原料的办法，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加强了中国农民对市场的依赖，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同时，手工业品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品，加上赔款和苛捐重税的负担，就使广大的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遭到破产，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

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不再单纯是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的社会了。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者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依靠着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操纵了中国的军政

大权和经济命脉，控制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为它服务，压倒了中国本来微弱的民族工业，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中国的经济就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能独立自主。中国就丧失了自卫能力和国家的独立性，只在形式上维持着独立国或某些独立性，而实际上变成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坚决斗争的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零九年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前仆后继地在不同时期内和不同程度上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这个革命过程，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各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五四运动以前的八十年，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运动起到1949年，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的革命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1911年革命。这些革命斗争在打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用农民的朴素的自由平等的观念改造了欧美资产阶级带来的基督教，使农民革命的理想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洪秀全利用拜上帝会组

组织了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坚持了十四年（1851年至1864年），革命势力曾经发展到十八个省份，并且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权，打击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颁布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这个革命最后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仍旧是一个没有先进工人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农民阶级是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革命阶级，但是农民是小生产者，受着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具有分散、保守、自私的弱点。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规定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农民同样地生产，同样地分配，每家限定多少亩地，多少棵桑树，多少只鸡，多少口猪。他们幻想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种平均的财产。其实即使实现了这种纲领，农民的前途也是很暗淡的，因为这种纲领并不是要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仍然是使生产力停滞于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所以它虽然有着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从社会发展的观点上看却带有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太平军在它所占领的地区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它的领导集团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如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没有很好联合其他农民起义的力量等等，因而不能抵抗清朝的反革命军队和美英法侵略势力的联合进攻。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在1905年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进行民主革命。同盟会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国家的纲领，提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同盟会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

帜，和君主立宪派公开论战。它在1905年到1911年间领导了多次革命起义。

1911年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但是政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这个革命也就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因而它在革命中不能真正把最巨大最深厚的民主力量——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可是孙中山所领导的1911年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革命也就没有坚固的基础。因此1911年的革命虽然摧毁了腐朽的清朝政权，但革命方面在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阶级政权的面前，表现了无能为力。资产阶级在中国是不能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

鸦片战争后，旧式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都失败了，都没有完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要完成这个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担负领导的责任才有可能，这个阶级和政党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二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

中国的新式工业，是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出现的。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不久，就在中国创办了某些新式企业。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英国在香港创办了近代工业。英、美、法、德等国的商人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创办了造船厂、轮船公司、缫丝厂、砖茶厂、印刷厂等，这些工厂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原料掠夺、文化侵略有密切关联。在这些外国企业中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主要是海员、航运工人。

六十年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开办了军事工业。军事工业促进了煤铁工业的发展。到八十年代，更逐渐扩充到有利可图的民用工业。同时，一部分中国商人、地主、官吏，也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在这些工厂中也产生了一批工人。

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了经济侵略的范围、规模和加快了速度。外国投资在铁路、矿山、工业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铁路方面：滇越路、中东路、胶济路以及京汉、京奉、津浦、沪宁、京绥等路，都在这个时期内筑成。这些铁路或是帝国主义投资经营，或是帝国主义掌握管理权。在矿业方面，外国资本取得了垄断地位。1913年全国煤矿总产量为一二，八七九，七七〇吨，其中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共有七，一三六，五四五吨，占55.4%。铁矿生产中，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更大。1913年全国铁矿总产量为四五九，七一一吨，全部为日本资本所支配。

中国民族工业在这个时期内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商办工业逐渐增多。1911年，中国厂矿资本总额为一五九，六五四，八一二元，其中商办厂矿资本八八，五五二，三六七元，约占半数。中国民族工业中，主要是煤铁开采业和纺织业。中国厂矿资本在工业部门的分配是：矿冶工业四一，三一五，九九二元，纺织业四〇，七八八，六八九元，等等。

这些中外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工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内，由于英、法、俄、德等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忙于战争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

族工商业乘机发展起来。纱厂纱锭 1914 年为五四四,七八〇锭,1919 年增到六五八,七四八锭。生丝出口 1913 年为七〇,一五〇担,1919 年增到一一八,〇二八担。上海中国纱厂纱锭,1914 年为一六〇,九〇〇锭,1919 年增到二一六,二三六锭;丝厂丝车,1914 年为一四,四二四,1919 年增到一八,三〇六,等等。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纱厂的盈利,1914 年棉纱每包为十九点五八元,1919 年增到七〇点五六元。对外贸易,以 1913 年的进出口指数各为一百,到 1919 年,进口指数为 156.4,出口指数为 113.5。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侵略的空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很低。一九二〇年中国纱厂纱锭共有一,五五〇,八四〇锭,帝国主义资本占 41.9%;煤生产量共有二一,三一八,八二五吨,帝国主义资本占 50.9%;铁生产量共有二五八,八六八吨,全部为日本资本所占有。

1915 年统计,全国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在内)约有一千万人,其中工厂工人有六十多万人,占总数 6%。新式工厂中以小工厂为最多。1913 年注册工厂五六五厂的总资本五千万中,十万元以下的有四七九厂,十万至五十万元的有六六厂,五十万元以上的有二〇厂(不及 4%)。

同时,日、美帝国主义,乘着英、法、德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加紧扩张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英、法两国虽然由于战时影响而暂时松手,但是它们依然保持着在中国的原有势力,战后又加紧侵略。

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特点是:第一,外国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通过在中国所经营的企业,垄断整个中国工业。帝国

主义在中国开办工厂压倒了中国民族工业。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工业原料的结果,使中国资源大量出口,而中国重工业却极端落后。1919年全国铁砂生产量为—,〇〇九,五四二吨,出口量占六六二,六三二吨。全国铁生产量为四四二,五九四吨,而进口量却有三二五,一五八吨,进口量相当于生产量的70%。第二,企业投资中以商业投资为主,1914年外国企业资本总额十亿美元中,商业投资占总投资额的83.1%,而工业投资即投在制造业和矿业方面的只占16.9%。工厂中不少是生产品的加工工厂和进口器材的修配工厂。以商业资本为主的外国投资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新式工业中有若干发展的只有纺织业。第三,当时中国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之下,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到十九世纪末叶,支配中国的主要是英、德、俄、法四国,二十世纪初叶,美、日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英、德、俄、法、美、日六国统治中国的局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共和国废止了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德国由于在战争中被打败而中止了对中国的侵略。于是战后的中国变成为英、美、日、法争夺的场所。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在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有了新的发展和壮大。中国工人阶级不但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并且早已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所经营的企业建立而产生,所以工人阶级比较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更久,力量也更大。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它的掘墓人——中国工人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日益壮大起来。

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形成一个为数二百万而且具有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的先进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一般工人阶级所共有的基本优点，即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等。

中国工人阶级除了一般工人阶级所共有的基本优点之外，还有它本身的其他特出的优点。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即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在新式企业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剥削，例如包工制、包身工和养成工等。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有的甚至工作十六小时。而所得的工资特别少，每天仅得银元两三角，不够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工人的待遇极不平等，童工、女工的工作时间和成年人相同，但工资却少得多。外国工人同中国工人在待遇上更不平等，有的外国（英国）工人的工资高出中国工人七倍。在工厂矿山里没有任何的劳动安全设备，时常发生事故，资本家关心的是机器而不是工人，工人残废和死亡的现象到处都是。更没有任何的劳动保险，生、老、病、死、残经常威胁着工人。工人在政治上没有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利完全被剥夺了。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和剥削，因此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阶级都特别坚决和彻底。

第二，中国工业的集中产生了中国工人的集中。行业上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等企业。地区上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企业上集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1919年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十三个省份中，五百人以上的工厂有一百四十四家，一千人以上的工厂有二十九家。工

人阶级的集中，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容易表现，斗争的智慧和力量容易集中，因此，工人阶级就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只有二百多万人，但工人阶级有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即有几万万人的雇农和贫农以及包括一千万以上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工人阶级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居多，所以工人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这些城乡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加起来就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这是工人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中的最深厚的基础，便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

这些特点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性，即斗争意志的坚强性，斗争力量的集中性和广泛性。因此，这个阶级一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而产生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它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了。

中国工人阶级很早就参加过革命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它还没有自觉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斗争纲领，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出现。1906年安源煤矿工人六千余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1911年革命时，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暴动来响应资产阶级反对清朝政府“铁路国有化”运动。此外，工人为改善本身的生活条件进行过多次的经济斗争。1913年北京邮政工人为反对送信次数增多而举行罢工，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为反对以贬值的纸币发给工资而罢工，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工人，为了一部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总同盟罢工。1916年到1919年上海等地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了多次的罢工斗争。工人为了获得斗争的胜利而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例如民间的秘密结社

(哥老会、老君会)，同乡关系的帮口和行会等，但是这些组织往往被买办商人和地痞流氓所操纵，因而不可能引导工人斗争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它的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大的作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加深，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很快地提高起来。

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根本转变，也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变。这个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极其深刻的。

第一，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信心。中国人民从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俄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创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从俄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中，从德奥帝国主义的瓦解和德奥革命的爆发中，从英法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中，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俄国无产阶级把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发展上的障碍物摧毁，宣布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灭亡。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二，十月革命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变为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的一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无产者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就

是说,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一个世界革命的堡垒,这个堡垒,在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大力帮助民族解放运动,使殖民地革命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和苏维埃人民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充满着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同情,贯彻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1919年和1920年,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两次对华声明,宣告:凡是以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所取得的特权,都一律废除。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驱逐帝俄驻在中国的官吏。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了在中国的特权的国家。中国人民对苏维埃政府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热烈的欢呼。当时青年学生和舆论界自动起来,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人们高呼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正义人道之骄子”,高呼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准备同反动军阀官僚政府斗争到底。

第三,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解放自己的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帮助了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②

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照耀着中国人民解放斗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争的道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导师和朋友，我们从他们的学说中吸取了力量。

四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五四爱国运动。

1911年的革命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和革命方面的其他弱点，给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以可乘的机会。帝国主义列强扶植起一个新统治者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当作自己手中的新工具。于是袁世凯利用了他的权力，在清朝政府和革命党之间实行狡诈的恐吓：一方面要挟清朝皇帝退位，另一方面要挟南京革命党向他妥协。帝国主义或明或暗地支持这个阴谋家的活动，把他捧出来作为中国反动派的首领。

袁世凯在1916年因恢复帝制失败而倒下去了。那时，欧洲帝国主义集团由于进行着剧烈的战争而暂时无力过问中国的事情，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扶植起另一个北洋军阀段祺瑞作为它任意驱使的工具。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就出来执掌北京政权。

袁世凯被承认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袁世凯政府一成立就立刻承担起清朝政府对外所订的一切卖国条约。1913年以美国为首的六国银行团给袁世凯二千五百万镑大借款，用以镇压国内革命，条件是银行团直接监督中国政府的财政。日本在1915年诱迫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取得了在中国的独占地位。袁世凯死后，日本所扶植的段祺瑞政府先后向日本举行五万万日元大借款，其代价是出卖满蒙和山东权益，出卖中国政府的军警权和内政权等。

段祺瑞政府还追随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充当进攻苏维埃国

家的走卒；而在反苏战争中所获得的结果就是日本军队开进中国境内，控制了东北和中国的军事机构。

美日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为激烈了。它们一方面竞相从中国军阀官僚买办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各人执掌着自己的工具互相抗衡。另一方面，美国建议组织美英法日国际银行团，以排斥日本的独占势力，并企图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在这个银行团中取得领导地位。四国银行团是在1920年成立的，但是由于四国之间，尤其美日之间的矛盾，它们没有取得协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帝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和平会议——巴黎和会。这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为宰割战败国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分赃会议。中国由于在大战时参加了英、美、法方面，也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了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提出了要求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所订的二十一条条约，提出了要求收回在大战时被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陈述书。

美国总统威尔逊原来在1918年1月发表了所谓和平条件十四条，虚伪地声言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和一切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日本的独占政策之间的矛盾。当日本代表向和会提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的要求时，这个矛盾就在会议上表面化了。但是由于日本的要求获得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赞助，美国为了巩固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转而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否定了中国的正义提案。对德和约中规定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由日本

来继承。至于中国所提出的要求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和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条约的陈述书，和会根本不加讨论。和会暴露了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而又共同牺牲中国利益的狰狞面目。

中国外交的失败，打破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先进人物和在他们影响下的青年学生对巴黎和会的幻想，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自己国家的命运。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爱国示威运动。三千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前，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①三个卖国者。学生们捣毁曹汝霖住宅时被军警所弹压，当场被捕去三十多人。北京政府还逼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学生举行罢课，并在街头上进行爱国宣传。6月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肆无忌惮地逮捕学生三百多人（4日又捕去一千多人），取缔一切爱国运动。卖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学生运动在全国沸腾起来。

6月3日以后，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群众变为工人阶级。6月5日至11日，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纺织工人、机器工人、运输工人、市政工人共六、七万人举行了罢工。在日商纱厂以及美、英、法企业内的工人罢工，说明了这次大罢工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在京奉路的唐山和京汉路的长辛店等地，工人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

^① 曹汝霖，交通总长，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陆宗輿，印制局总裁，在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为驻日公使。

这是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的反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工人阶级的队伍是五四运动行列中最有威力的一支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以及在交通要道和工矿重地沪宁路、长辛店、唐山等地的罢工，给中国的军阀政府一个有力的打击。这支大军的突起，是五四爱国运动获得胜利的极重要的因素。它鼓舞了人民的勇气，并使其他各阶层人民都感到人民力量的增长。

资产阶级也加入爱国运动的行列。五四运动后，扩大了中国制造工业的市场，对于学生运动，上海资产阶级采取赞助态度，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上海工商业举行罢市。接着上海附近城市以及全国主要城市也立即罢市。但上海资产阶级在运动一开始即表现了它的软弱性，它反对“暴动”，主张所谓“文明抵制”，要罢工罢课罢市在“合法”形式下进行，不要超过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所允许的范围之外。

五四运动由北京发展到全国，形成了包括工学商各阶层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的斗争迫使反动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撤换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迫使中国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时期工人政治大罢工，促进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这样就需要一个真正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利益并善于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政党，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地 and 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前，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过民主主义

文化革命。他们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君主政治,反对军阀政治。提倡科学,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反对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旧礼教和旧道德。思想革命必然地影响到表达思想的形式——语文和文学的改革。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最有影响的刊物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它们对于封建旧思想旧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曾经是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战士。

五四运动以前,文化革命虽然没有脱出旧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范畴,但是它富有革命精神和战斗勇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前,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

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1918年底,李大钊进行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并满怀信心地宣告: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尖锐地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论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社会本身寻求社会发展的指导力量,它给人们以奋发有为的战斗精神。李大钊从革命立场出发,把唯物史观当作战斗的武器,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史问题和思想史问题。他又论述了五一国际工人运动史,指出五一劳动节也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纪念日,中国的五一运动将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成为群众运动。李大钊预见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并表明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工人运动的决心。

同时,1918年到1919年,《新青年》刊载了许多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苏俄问题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革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光芒照耀之下,开始觉醒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成为自觉的潮流了。

文化革命在开始时,原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在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互相对抗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社会主义倾向,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斗争剧烈地开展起来。五四爱国运动后不久,1919年7月,资产阶级右派的代表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评论,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胡适并不是对什么主义都加以反对。1919年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实验主义》一文,宣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实用主义,充当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留声机。他所反对在中国宣传的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驳斥了胡适,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不懂马克思主义,就不懂得事物的规律,结果“问题”也无从谈起。中国问题,必须先求根本的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①。研究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主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主义。

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第一次的反攻,打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批判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次争论以后,资产阶级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右派,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

五 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

1920年7月,列宁发表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是被压迫民族革命的问题。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是:

第一,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是互相支持的。列宁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高举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把民族解放运动当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伟大的作用。

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最广大的后备力量,特别是殖民地的天然富源——战略原料、燃料、粮食、棉花等等,对于帝国主义有特殊的意义。帝国主义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和“有色军队”。帝国主义必须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广阔的剥削场所,对殖民地居民进行残酷剥削,并收买本国工人贵族,来分裂工人运动。

因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各民族不可避免地要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世界上分成两个营垒:一个是人数极少的剥削地球上最大多数居民的民族;另一个是人口众多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列宁把这两种民族加以严格的区别。

有两种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两种力量。世界革命的利益,要把这两种力量联合为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

义的革命战线。

列宁认为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必须积极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同被压迫民族结成紧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列宁指出，从二十世纪初叶起，中国、土耳其、波斯等国都发生了革命，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革命的发展，使他们卷入国际政治漩涡之中。列宁正确估计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被压迫民族从前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但是从二十世纪初叶起，这种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将成为新社会新生活的创造者，将成为决定世界人民命运的动力。

列宁指出，被压迫民族面临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是要用民族语言来宣传共产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和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要“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①，就是从每一个国家的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提出革命道路的问题。

列宁指出，领导每个国家的革命，必须估计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因为各民族间的民族区别和各国间的国家区别是很大的，这些区别甚至于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区别决定了各民族的斗争策略有所不同。策略的多样性，决定于民族和国家间的多样性。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竭力阻止殖民地的自由发展，帝国主义侵入后，原来的手工业破产了，让位给帝国主义的大工业。本地工人阶级，十九世纪末叶才产生。极大多数人口不得不从事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2月20日（《列宁选集》第四卷）。

农业，并把原料输出到外国去。土地很快地集中到少数大土地所有者手里。

列宁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世纪剥削制度，即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当前任务。这个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但是这种民主革命已经不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它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一种革命力量，因此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这个革命，实质上就是土地革命，革命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列宁根据革命性质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被压迫民族工人阶级和几万万农民联合起来——工农联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殖民地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①。这两条道路不可避免地将发生激烈的斗争。

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革命的联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这个联盟不能妨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组织群众的工作。因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就成为迫切的问题。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必须由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来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领导，因此列宁号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

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纲领，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 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

为了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为了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和1919年在上海、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这个基础上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8月，稍后，北京小组、广州小组相继成立。上海、北京、广州都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地方。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各省，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出现了这种组织。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运动。新青年社开始有目的地出版了共产主义文献中文本，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又出版了介绍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刊载了关于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关于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中国各地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还连续刊载了“俄罗斯研究”的文章。《新青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成为它的机关刊物。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俄国共产党以及各国共产党方面的论文。

1920年至1921年，共产主义小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即

中国的前途出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同研究系（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政敌）梁启超、张东荪等，进行了一次论战。这次论战驳斥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主张发展中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让中国绅商阶级执掌政权的阶级实质，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积极意义的。

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方面同梁启超、张东荪等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加入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尖锐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政党和人民政权，反对集体主义等谬论，并揭露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伴食者，政治上的骗子。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和组织工作。

北京小组以京汉铁路为中心，开办工人夜校和出版工人小报《劳动音》。1920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接着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组织了工会。长辛店方面的工作推动了北方各地的职工运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沪西小沙渡为起点，开办工人学校和出版工人小报《劳动界》。这个刊物是以工人为对象的，文字浅显明白，富于鼓动性，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到工人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首先在《劳动界》上建立了工人通讯网，使工人和工人以及工人和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机器工会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成立的。以后还成立了印刷工会和纺织工会。

长辛店和小沙渡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职工运动的起点。接着广州小组成立了工人学校，出版了工人小报《劳动声》。湖南及其他各地小组也在工人中进行了宣传和组织工作。

以上工作，增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开始于1917年新民学会的成立。当时全国各地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就是这种组织中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留法学生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去半工半读。毛泽东有计划地组织湖南青年响应这个运动。1918年9月，他带领一批青年第一次来到了文化革命中心的北京。但是毛泽东并不赞成大家都到外国去，因为国内需要人做事，他觉得他应当留在国内，以便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

这时北京大学是文化革命的发祥地。毛泽东注意研究政治理论书籍，吸收了许多新思想，开始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9年，毛泽东回到他生活和斗争了多年的湖南。这时新民学会的学员发展到七、八十人，会员中学生之外还有中小学教师。五四运动爆发了，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又以学联为骨干，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领导群众爱国运动。

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1919年7月14日出版了《湘江评论》，这个周刊的特色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提倡民众统一战线，提倡研究社会问题，歌颂十

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国内思想性较高的一个刊物。

毛泽东为了扩大湖南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初第二次来到北京。同年八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毛泽东精心地钻研了这类书籍,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1920年秋季,毛泽东回到长沙的时候,张敬尧已经被迫逃走,湖南人民发起自治运动,要求实现民主。但是代替张敬尧成为湖南新统治者的是谭延闿、赵恒惕,旧军阀去了,却来了新军阀。谭延闿、赵恒惕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帜,进行政治欺骗。为着引导民主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和揭露谭、赵政府的反动实质,毛泽东指出湖南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即工人、农民、商人、学生为主体,不以人民为主体的自治运动是虚伪的,因此湖南省宪必须由人民来制订。谭、赵政府应当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应由人民直接选举,宪法起草和公布的权力属于宪法会议,然后根据宪法选举湖南的议会和政府。

这是人民宪政运动和军阀联省自治运动的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是人民宪政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而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文化书社创办于1920年9月,以推销各种革命书刊为宗旨。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书刊,在湖南的学生和工人中,大量销行,这对为建立共产党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9月,参加者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和进步教员。毛泽东一方面领导研究会的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书刊,另一方面指引他们用马克思主

义原则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革命实际主义精神，使他成为湖南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公认的领导者。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青年团。有了青年团就结束新民学会。毛泽东极其重视团员的质量，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必须是可靠的“真同志”才被吸收入团。从全国范围来说，湖南是青年团组织最大的一个省份。

为建立共产党，毛泽东极注意工人运动。他为工人作事，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中发现积极分子，经过他们去联系广大工人。在1921年上半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开始逐步地组织起来。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思想、组织和干部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真理，从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7月至1923年12月)

一 华盛顿会议和帝国主义共同分割中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特殊的利益，它是在其他参战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参战的，因此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占了优势地位。各参战国和美国都需要大量的军备，造成了一个巨大市场，并为战争时期和战后美国工业的扩充准备了条件。欧洲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力量和人力在战争时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美国却没有受到战争的危害。战争使美国大发其财，而使其他许多国家陷于贫困，这是战后美国经济强大起来的重要因素。

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13年美国钢生产额等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40%，以后继续上升，到1929年等于50%。美国迅速地变为工业的领导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战后美国依靠着它的经济力量向外扩张，东方的中国就成为美国所掠夺的最主要的殖民地市场之一。

战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基本矛盾是美国和日本的矛盾。美

国在巴黎和会上并没有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反而承认了日本的特殊权益，美日的矛盾并未得到缓和，反而更加尖锐起来。

英国战后的远东市场为日本所侵夺，它向东方的发展遭到了阻挠，英日间的矛盾也因而加剧了。

这个以中国问题为枢纽的国际关系使美英接近起来，形成了美英和日本之间的斗争。

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军备竞赛上。美、英、日三国都积极地扩充海军，特别扩充太平洋舰队，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这个斗争还表现在中国军阀战争上。各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巩固自己的侵略势力，从中国军阀中寻找它的代理人，而军阀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地区，也必然地要依靠帝国主义。于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派系——直系曹锟、吴佩孚等变成英国、美国的工具，而另一些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等变成日本的工具。不同派系的军阀互相抗衡。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1922年4月的直奉战争和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都是美、英、日在中国斗争的反映，各派系军阀之间的胜败反映着英、美、日在中国的权益的消长。

1921年11月，美英为了在远东问题上压倒日本，召开了九国（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在军备问题上决定了美、英、日海军吨数为5:5:3的比例，在中国问题上确定了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这是美英以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为条件达成这个协议的。这样就把中国由日本独占的局面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同时又为美国独占中

国准备条件的新局面。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会议。

华盛顿会议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获得了分割中国的暂时协议，斗争暂时缓和下来，并开始形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革命战线。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根本矛盾仍然是无法解决的。

在华盛顿会议前后，中国共产主义者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前锋》等在评论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特征，揭露了这次会议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和美、英、日三个帝国主义协同分割中国的危险，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是联合起来坚决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斗争。

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革命战线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政府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

二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和革命纲领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了十二个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有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代表着五十多个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所缔造的布尔什维克这个新型的革命政党的榜样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部队，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全体党员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所结合的队伍。这个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领导工人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

构成这个政党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把党员提到高度的水平，吸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最优秀最先进最革命的分子入党。

党要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统一的部队，就必须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党必须坚持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统一，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因此，党必须同党的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之所以具有这样一个特点，首先，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产生的，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了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依据，并且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其次，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不容许工人阶级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社会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一开始就吸取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优良传统，而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传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最大特点。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奠定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基础。

但是，由于半殖民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所以从党成立时起，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极大多数。他们不免或多或少地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带到党内来，这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首要任务。

陈独秀没有参加这次大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陈独秀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以后他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

担任中央局书记。但是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中国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他的思想中夹杂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陈独秀曾经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反动实用主义哲学是“近代两大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主张这两种根本敌对的哲学结成统一战线。陈独秀在中国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但是中国怎样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呢？初时他认为中国第一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以后他又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经过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这些错误观点，在党领导的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中发展成为路线上的错误。陈独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

建设新型政党这个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天起，就成为毛泽东所最关心的问题。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担任党的湖南区委员会书记。一方面在原有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严格地选择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另一方面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

毛泽东极其重视党的思想工作。为了提高党员和团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使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在群众中进行阶级教育，在 1921 年 8 月创办了“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

“自修大学”的影响遍及北京、上海等地，国内许多进步报刊对它进行了介绍和赞扬。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九十五人。

这次大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地处理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纲领政策问题。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就是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察和结论。

宣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须依靠殖民地市场，而中国由于被侵略了八十年，已经成为它们共同的最大殖民地；分析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特别是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新局势，即帝国主义的“协同的侵略”。宣言分析了战后世界两个阵营的对立，一个是帝国主义阵营，即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共同分割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革命阵营，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联合起来的阵营，而这个革命阵营，一定要把帝国主义埋葬。

宣言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力量之一。

宣言第三部分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宣言同时指出，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纲。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口号。这个革命,从鸦片战争起,到五四运动以前,经历了无数次的斗争,可是所有革命的领导者,都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口号由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作为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基本行动纲领。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是英明的领导者,它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纲是根本不同的,所以这个纲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反对。

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胡适大叫大嚷:“这种观察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①。胡适强词夺理地为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都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说华盛顿会议是美国“援助中国”,说美国所组织的新银行团对中国没有“恶意”,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对中国有利等等。胡适就这样武断宣传,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因而反对在报刊上“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又说中国民主问题和国际帝国主义问题并没有任何关系,暴露了他向帝国主义

^①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1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页)。

献殷勤的真正面目。

关于民主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主张用国会、宪法以及好人政府、联省自治等方式来解决。他们企图在军阀政府下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北京政府方面，由改良派组织内阁（好人政府）来促成南北议和，恢复国会，制定宪法；在地方政府方面，他们认为中国不宜于实行所谓“单一制的政治制度”，主张联省自治，地方议会有了权力就可以“制裁”军阀。

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军阀政府下争取一部分政权，甚至幻想地主、官僚、军阀的资产阶级化。这种政治主张丝毫没有触动到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其结果，所谓国会、宪法、好人政府，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央军阀的御用工具，而联省自治就成为地方军阀争吵和冲突的借口。要扩张统治力量的军阀就主张武力统一或者主张成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保持原有地盘的军阀就主张联省自治。所以在军阀制度下，中央政府固然摆脱不了军阀专权，地方政府也摆脱不了军阀专权。

中国的政治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彻底进行民主革命。这样，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革命党，首先是工人阶级政党，由革命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革命的统一。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各种改良主义的错误，指出国民党民主派历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党号召全国民主派在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是奠定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基础，那末，党的第二次大会就是奠定了党的纲领路线的基础。但是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有它的缺点，即关于无产

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第二次代表大会虽然指出了无产阶级终将成为革命的领袖，但它没有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认为党的任务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在实质上是把无产阶级从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地位降低到资产阶级的助手的地位。和这点密切相关的，就是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而认为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工人农民只争得“一些自由权利”。这就没有看到，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但是绝对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其间不可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个缺点后来就在党对 1924 年至 1927 年革命的领导工作中，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发展成为严重的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失败。

三 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领导工人运动当作党的中心工作。1921 年 7 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工人报刊，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斗争。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从 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出现了第一次中国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潮。这个高潮从 1922 年 1 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到 1923 年 2 月的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达到了顶点。斗争前后继续了十三个月，大小罢工在一百次以上，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共有三十多万。极大多数的罢工都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在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们纷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迅

速地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为反对外国资本家而举行了罢工。

中国海员身受多重压迫，工资微薄，连个人生活也维持不了。工头勾结资本家包揽介绍海员工作，从中剥削。工资待遇极不平等，中国海员的工资只等于外国海员的五分之一。还有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中国海员为战后汹涌的世界革命潮流所激动，阶级觉悟较早，他们为增加工资和争取工会介绍工人工作权力而掀起了罢工斗争。先后参加罢工的海员和运输工人共有三万多人。领导这次罢工的是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罢工爆发后，首先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接着香港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还得到全国工人的援助。香港政府用了各种办法（威胁、利诱、调解、分裂、招募新工等）来破坏，但是这些诡计都被罢工工人所击破了。海员罢工斗争的策略是封锁香港。香港是一个孤岛，本地出产远不能供给全市人口的需要，所有粮食和一部分日用品都要从广东内地运来。海员罢工断绝了香港同广东的交通，香港物价上涨，米价增长60%以上，肉价增长20—30%。

香港工人的斗争，逼迫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屈服，3月6日香港当局被迫取消它所颁布的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15—30%。3月8日大罢工以胜利而宣告结束了。这次罢工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坚决的先锋。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工人斗争。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罢工高潮,并对工人运动加强领导,而召开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5月1日,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的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共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二十七万会员。出席大会的包括了共产党、国民党、无政府党和无党无派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了全国总工会以消除各地工会的行帮观念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通过了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等项决议。最后一案的通过和整个大会的过程,说明了参加大会的代表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次大会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罢工浪潮的继续高涨。

罢工斗争到处受到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工人们深切感觉到政治自由的重要,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起草了一个保障工人权利和自由的“劳动法大纲”,其中包括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的自由,承认工人团体契约缔结权,承认八小时工作制,保护童工女工,规定最低工资,承认工人国际联合等,要求北京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劳动法大纲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并广泛地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工人都参加了劳动立法运动。当然,为军阀所操纵的国会,不可能给工人以自由权利,不可能通过有利于工人的劳动法案,但是由于广泛的宣传,劳动法深入人心,变成了罢工高涨中的斗争纲领。劳动立

法运动教育了工人阶级，要想争取政治自由，就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全国罢工斗争继续高涨。当时，湖南是全国工人运动最发展的省份之一。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2年5月第一次劳动大会后，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并在全国各中心城市设立分部，毛泽东担任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大力从事工人运动，领导长沙、安源煤矿、水口山铅矿等处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深入群众，了解工人的疾苦，并站在工人斗争的最前线。

因此，从1922年到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浪潮，湖南工人运动高涨起来。罢工斗争遍及全省，每次斗争都由要求增加工资和争取政治权利而起。在这些斗争中，对湖南以至全国工人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安源大罢工。

安源煤矿在江西省萍乡县境，当时每天可产煤二千多吨，是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的燃料来源。煤矿工人连同株萍铁路工人，约有二万人。

安源煤矿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官僚资本企业。历任的总办都是腐败的官僚，企业中工程大权，为外国工头所把持，企业的管理是封建的把头制。工人们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三种压迫之下，因此，安源煤矿蕴藏着无限的革命潜力。

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矿区开办工人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这个基础上，1922年5月1日，成立了工会。同时在工人中发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从团员中吸收了优秀分子入党。

由于路矿当局拖欠工人工资和准备解散工会，由于汉阳铁厂罢工胜利的影响，1922年9月10日爆发了名闻全国的安源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工人们提出了保证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等要求。

罢工爆发后工人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矿场秩序。江西军阀调派军队来镇压，党动员工人们向士兵宣传，结果士兵非常同情罢工工人，不愿开枪射杀他们。路矿当局又阴谋以“谈判”为名，逮捕罢工的领导者刘少奇，几千工人集合起来包围会场，保护了自己的代表。

由于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力量的强大，罢工的第五天，路矿当局不得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完全胜利了。

罢工胜利后，改组了工会的组织。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团有“十代表”一人，每十团有“百代表”一人，每一工作处有总代表，各工作处有百代表或十代表会议，最高会议为全体总代表会议。工人的组织更加严密。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生活待遇有了显著的改进，工人又扩充了工人学校和开办了消费合作社。安源工会是当时中国组织得最坚实的工会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屠杀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在全国大企业中的工会几被破坏无余，只有安源工会硕果仅存。北伐战争时期，安源工人大力支援了北伐军。1927年秋收起义时，安源工人参加了武装斗争。1928年后安源曾经是井冈山根据地对外联络机关的所在地。

两年间湖南工人斗争得到胜利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当时全国处在罢工运动高潮之中，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怎样组织和领导湖南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呢？

第一，在工人区开办夜校，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熟悉工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到斗争时机成熟时，立即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和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和斗争胜利后又巩固和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

第二，建立工会和工会的基层组织。为了发动斗争，对敌我力量和斗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作出正确的估计；罢工条件和斗争口号，必须向工人群众充分说明。就是说斗争必须有准备和有把握。在斗争中培养工人领袖和发展工人组织。

第三，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利用湖南的省宪法，依靠群众的力量，压迫统治者承认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和工会代表向政府交涉的权利，揭露统治者的欺骗。利用各种社会团体的力量，直接间接地、或多或少地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

在胜利的斗争和坚固的群众基础上，1922年11月，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湖南群众革命斗争的旗帜。

全国工人罢工的最高潮是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反对军阀政府高压政策的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起因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遭到吴佩孚的压迫。1921年以来京汉铁路工人就开始组织工会，到1922年底，全路成立了十六个单位的分会，并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但是，这个正当行动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下令禁止这个总工会的成立。日益强大的工人组织揭露了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大会提出总工会的奋斗目标是：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联合全国全世界工人阶级等。代表们决定按照原定日期（2月1日）在郑州召开大会。2月1日郑州市军警林立，实行

紧急戒严。大会代表突破军警阻拦，到预定会场开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会后代表们竟被强迫出境。总工会被迫在当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总工会移到汉口江岸办公，并号召工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4日京汉铁路总罢工实现了，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大罢工的第三天，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那时候帝国主义就出来公开干涉中国工人运动了。北京公使团向北京军阀政府提出警告，并唆使它迫害工人。汉口英领事召集了军阀萧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联合会议，商议压迫工人的办法。屠杀就在2月7日开始了。萧耀南军队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人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然后开枪扫射，工人代表还没有到达，会所的数百徒手工人纠察队遭到了袭击，死三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捆绑在车站电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严词拒绝，当场被砍死了。接着在长辛店、郑州、信阳、广水、驻马店等地也连续发生了屠杀罢工工人的暴行。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施洋被捕，2月15日被杀害于武昌。这时在武汉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其他各工会也都被封闭了。

二七事件后，在武汉的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当天发布大罢工命令，武汉各大工厂工人都举行罢工。道清路、正太路、津浦路、粤汉路的工人都先后起来响应，举行罢工。京奉路、京绥路工人也在酝酿罢工。全国各大城市民众都起来声援，组织了京汉铁路罢工后援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发表了宣言，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

共产国际为这次罢工斗争发表了宣言。

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是震动了全国全世界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大屠杀后，军阀用军警来捆绑工人上工，甚至用刀枪相威胁，但工人在未接到总工会命令前，坚决不肯复工。各地分会也完全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拒绝单独谈判。一直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为了保存力量而劝告复工时，工人才忍痛复工。这次惨案，京汉路各地工人死四十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多人。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人员被“通缉”，书记部由北京迁往上海，各铁路工会被封闭。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工人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这次工人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屠杀。这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必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次事件中工人阶级出色地表现了斗争的坚决性、彻底性和组织性，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威信，说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出现了伟大的领导力量。这次事件也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要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否则，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这次事件也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就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就是说，必须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和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革命的联盟。此后，党就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帮助国民党组织军队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进行革命战争。

四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三十多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残暴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所以，在中国，建立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是孤立的，反对他们的人是很多的，不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对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也有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建立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里，很快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正确地决定了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来进行中国革命。党的三大奠定了党的策略基础。

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同盟会，是1911年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联盟。1911年革命失败以后，这个联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原来的地主阶级反满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主的妥协分子所组成的许多政客集团，投靠帝国主义

和中国反动派；另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在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民主主义的斗争，但由于找不到革命的正确道路，也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因而在多次斗争中遭到失败，以至内部更加涣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对中国及其他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政策，苏联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关心和帮助，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切，逐渐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进步的国民党人的注意，使他们倾向于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共同进行中国革命。

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乃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是反满的统一战线的联盟，又是家喻户晓的，因此，党就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和改造国民党，使它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使它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主力量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联盟。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改造为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而通过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在讨论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时，大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批评了党内两种机会主义倾向。

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既然是民主革命，那末，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

级共和国成立和资本主义发展后，再来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主张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极端错误的分析出发的。一方面，陈独秀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其作用。他完全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一般工人阶级所共有的基本优点及其本身的特出优点。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他更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说它“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因而否认它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陈独秀不了解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不了解农民斗争在这个革命中的意义，因而把它放在革命统一战线之外。

另一方面，陈独秀不了解被压迫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夸大它的革命性，忽视它的妥协性，说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因而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这样，陈独秀就错误地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把这个革命看作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个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只能得到某些民主权利，农民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加速分化。他根本没有打算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使它的胜利首先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来掌握人民民主政权，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过渡到社会主义。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公式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革命的主力军是民族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至于农民，不包括在革命动力之

内，被他一笔勾销了。

这个公式是机会主义的公式，是中国孟什维克的公式。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共产党不应当同国民党合作，因为国民党是不革命的。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单枪匹马地进行革命，如果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就会模糊工人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反对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

这种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条件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哪怕这个同盟者是暂时的和极不可靠的。他们不懂得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社会，工人阶级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统一战线模糊工人阶级思想的说法，实际上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大会批评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倾向，决定同国民党合作，一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大会指出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必须发扬共产党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克服同盟者的妥协倾向和改良倾向。指出党必须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并且在工农群众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扩大党的组织。但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次大会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

毛泽东出席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坚持了正确意见，反对了错误意见。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结语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斗争规模，也随着发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的产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党是按照布尔什维克这个模型而建立起来的。从此中国就出现了完全新式的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国革命当前的基本任务和革命的民主主义纲领。

党首先把领导工人运动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进一步相结合，于是由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显著地表现了出来。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受到反动派的严重打击，使党认识到工人阶级不能单靠自己一个阶级去同敌人搏斗，必须发动一切民主力量，联合最广大的同盟军。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规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并积极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现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组织原则、革命路线和策略方针的奠定，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最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面目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时，党还没有及时注意和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人民政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革命军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革命运动高涨中，日益成为迫切问题，同时也成为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分歧。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对立

(1924 年 1 月至 1926 年 7 月)

一 1924 年至 1927 年政治形势

1924 年至 1927 年国际形势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稳定局面,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暂时稳定。

苏维埃国家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军的叛乱后,从 1921 年起就开始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 1927 年,苏联国民经济已经超过战前水平。1926 至 1927 年度,工业生产量等于战前 100.9%,农业生产量等于战前 108.3%。苏联工业生产量在国民经济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为 38%,公有化工业生产量在全部工业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 86%,苏联迅速地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苏联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稳定是健全的,并且是日益巩固的。

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也出现了稳定的局面。1924 年至 1927 年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已经恢复到或超过战前水平。

1926年资本主义各国铁产量等于战前100.5%，钢产量等于战前122.6%，煤产量等于战前96.8%，五种谷物收获量等于战前110.5%。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某些国家(美、日)，并不是缓步地而是跳跃地越过战前水平，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特征。

资本主义世界的暂时稳定局面，主要是依赖美国的“援助”，以西欧各国屈从美国为代价而达到的。战后世界垄断资本的剥削中心，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各国依靠美国资本的流入而暂时支持下去。美国成了一个最大的债权国，欧洲各国每年向美国支付巨额债款和利息，这就不能不无限地加重本国人民的赋税负担，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不能不强制地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数目达一千三百亿马克)去支付美国债款，使德国经济破产，使德国失业现象增长；不能不残酷地剥削殖民地人民，使这些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加深，人民生活恶化。这也就不能不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不牢固的。

两种不同的稳定使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了暂时的均势局面。

由于这时没有发生削弱帝国主义力量的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暂时的均势，所以帝国主义就能够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但是，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增长却是这

个时期的又一个特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危机，由于工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更加深化。印度和埃及的反英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的反法斗争，尤其是中国人民反对英美日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到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使帝国主义有丧失自己基本后方的危险。就是说，这个时期内，殖民地半殖民地看不见有任何稳定的迹象，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战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震撼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战后，帝国主义对外加紧压迫和剥削，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陷入停顿状态。中外纱厂的纱锭、线锭、布机的比例是：1919年中国纱锭占53.3%，1927年占57.4%；1919年中国线锭占88.7%，1927年占45.8%；1919年中国布机占40.8%，1927年占50.3%。从1922年到1927年，中国厂出产的棉纱，在全国棉纱总产量中，由92%降到58%，外国厂出产的棉纱，由8%增到42%。从1925年到1927年，中国厂出产的棉布，在全国棉布总产量中，由83%降到47%，外国厂出产的棉布，由17%增到53%。

在对外贸易上，战争期间曾经大量减少的贸易入超额，战后迅速地增加起来。1919年出入口贸易接近平衡，1920年为入超二二〇，六一八，九三〇元，以后的几年，入超继续上升。

帝国主义继续支持中国各派军阀政府和策动各派军阀进行内战。1924年发生了江苏浙江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发生了浙江奉天战争等等。

北洋军阀历次所进行的战争双方每次动员的兵力，一二十万、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不等。1924年9月至1925年12月，由于军阀战争所造成的北方工商业的损失共有七亿九千万元。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人民承担苛刻的捐税，农民受到地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战争，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工商业破产，人民贫困化，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

二 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农民运动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立场，估计到把国民党改造成成为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盟的可能性，因而确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这次大会之前，党就积极进行建立统一战线和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工作。党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的影响，李大钊、林伯渠根据党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

苏联对孙中山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1923年3月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十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

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

从此，国民党开始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不许为少数资本家所专有，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个人和团体都享有民主权利。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主张“节制资本”，改善工人生活，不许少数资本家和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

由于新三民主义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新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所以，由共产党人出席并参加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了中国革命高涨的起点。

这时，还有促进革命高涨的两大事件，即：苏联同中国订立友好条约和孙中山建立革命武装。

中苏友好条约订立于1924年5月31日，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友好的条约。

北京政府先后两次拒绝了苏维埃政府对华声明中所提出的中苏建立邦交的建议。1922年，苏维埃政府代表来到北京，受到北京人民的欢迎，却受到北京政府的冷遇。但是，中苏两国人民

的友谊是谁也阻挠不了的。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又派代表来到北京，再度声明完全放弃帝俄时代的特权，并愿意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北京政府再也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了。中苏谈判的结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协定里，苏联根据对华声明中的原则，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和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租界、租地、贸易垄断圈、兵营等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和治外法权，取消中东铁路商业事务以外的一切特权。这个条约是中国和外国订约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呼。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建立了革命武装。孙中山基于历次革命失败的经验，认识到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创立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1924年5月在广州成立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负责的，军校许多优秀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学习中和以后的战斗中起着先锋作用。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为骨干所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是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武装力量。

在广东革命政府管辖地区，工人运动开始复兴了。

二七屠杀事件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当时工会工作中的紧急问题，是救济工人和恢复工人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募款救济工人受难者及其家属。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以组织“工厂小组”为中心工作，就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作处，成立若干个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来组织工人群众。

国民党政纲中有“制定劳工法”和“保障劳工团体”的规定，

工人运动在广州开展起来,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

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英租界)的洋务工人为反对新警律(中国人出入沙面要佩带执照)而举行大罢工,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这个歧视中国人的条例。这次罢工不但轰动了广东,并且波及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接着有上海南洋烟厂工人、汉口人力车夫、苏州机织工人和浙江余姚盐民进行罢工,这是工人运动复兴的征象。

南方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早在1921年,彭湃^①在广东就进行了农民工作。1923年1月,成立了包括十万会员的海丰农会,进行了反对豪绅和减租的斗争。1924年2月,海丰农会被反动军阀陈炯明所解散,但是农会组织已经由海丰陆丰发展到潮州汕头一带。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山一带组织了十万农民加入农会,并领导农民同湖南军阀地主进行了流血斗争。以广东、湖南为中心的南方农民运动,不仅扩大了组织,进行了经济斗争,而且卷入政治斗争,广州周围农民自卫军帮助孙中山镇压了商团的叛乱^②。

1924年10月,直系军人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举行政变,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把直系军阀势力从北京驱逐出去。

北京政变后,奉系军队侵入华北,夺取了北京政权;吴佩孚

① 彭湃: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广东海陆丰红色革命政权的创始人。1927年被选为党中央委员,1928年被选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遇害。

② 广东商团是广东地主买办阶级的武装组织(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国民党右派分子)。1924年10月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图谋里应外合地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革命政府在工农的支持下,镇压了商团军的反革命叛乱。

战败后，直系残部退到长江流域，积蓄力量，准备卷土重来。北京政府成为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三派的联合政府，由段祺瑞当权，号称“临时执政”。

当时北京政府还没有巩固起来，暂时放松了对工人的压迫，党利用了这个时机，首先救出二七事件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铁路工会，并为失业工人安排工作。192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即爆发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接着北京、武汉、沈阳、唐山等地都连续发生了工人罢工斗争。

在这个局势下，党为了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集中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① 在党的号召下，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

在人民运动走向高涨的时候，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四人。

大会对政治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党的政治任务。当时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直系军阀已经倒台，奉皖两系军阀没有巩固它的统治的时期。中国人民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这个人民运动的发展决定于党的政策和它在民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此，大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展开全国人民运动。

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在于争

^① 国民会议口号最早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8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的。

取这个革命彻底胜利后把它引向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它是不同于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参加民族民主革命不能附属于资产阶级，而必须以自己阶级的独立地位和既定的目的去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必须是工人阶级取得领导地位才能保证彻底胜利。

大会指出当时中国有召开国民会议的可能，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加，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因此在军阀统治地区应当组织工会，首先在铁路、矿山、纺织等产业工人中和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中进行。

大会指出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基本力量，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各地农民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因而决定普遍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反对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

大会批判了一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国民党改组以来已经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并确定了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为人民运动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大会的缺点是没有提出土地纲领问题。

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借以助长国民军的声威；段祺瑞、张作霖为收买人心，借口共商国事，也邀请孙中山北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在1924年10月离开广东北上。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到北京后，发觉段祺瑞不但没有召集国民会议的诚意，反而以召开善后会议相抵制。为了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下，

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反对善后会议、传播革命思想、引导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在北上时期因为劳累过度,旧病复发,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前致书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热烈地希望中苏两大民族的合作。联共中央以斯大林名义致电哀悼孙中山的逝世。联共中央指出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并鼓励国民党民主派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到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友人和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突然逝世,曾经引起全国人民的哀悼,因而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国民党员和中共党员的努力,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很快传播到全国。

三 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工厂(主要是纱厂),进行经济侵略。战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所开办的纱厂更多了,尤其是日本。战后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遇到国内市场日益缩小的威胁,日本资本家挽救危机的方法就是实行国内垄断政策和对华扩大投资。日本在中国办厂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它可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中国军阀政府和租界对工人实行高压政策;可以利用协定关税;可以在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各省操纵棉花生产等等。除以上优越条件外,它还有雄厚的资本、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因此它能压倒中国企业,攫取超额利润。1913年到1925年,日本纱厂纱锭数在中国纱锭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

13.6%上升到45.3%，中国纱厂的纱锭数，由58.8%下降到44%。日本纱厂都集中在上海和青岛，中国纱厂远不是它们的敌手。

日本纱厂老板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延长工时，克扣工资，尤其是奸狡的上海日厂准备用所谓养成工，以便将来替换成年男工，随便压迫剥削。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了1925年2月的大罢工。罢工波及上海大部分的日本纱厂。日本一面调遣军舰举行武装示威，一面由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硬警告。在当时，这是一件震动远东的事件。

这次罢工使工人深信自己阶级的力量，于是加入工会的工人日益增加，工人按企业组织起来，奠定了工会组织的基础。工会力量的增长引起了日商的恐惧，他们决心取缔工会，开除工会的组织者。上海工人又举行了罢工。5月15日上海日厂资本家向罢工工人开枪，当场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打伤了十余人。

4月19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由于日本资本家压制工人组织工会，开除工会的发起者，而举行大罢工。5月28日，日本老板实行封闭工厂，勒令工人出厂，日本军队开枪射击工人，制造了青岛屠杀事件。

这些屠杀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成为五卅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由当时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议发起，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时正处在全国

反帝国主义大浪潮的前夜。出席大会的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人。

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必须找寻自己的同盟军，而最基本的同盟军就是农民。大会指出当时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的迫切要求是，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女工童工劳动条件，实行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大会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必须竭力使所有工人加入工会，而工会组织中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产业工会。此外必须纯洁队伍，铲除工人运动中的奸细和工贼。

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了总工会章程和选举了总工会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会之后不到二十天，五卅运动就爆发了。

上海各大学学生在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时和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被捕去多人。帝国主义者决定于5月30日在会审公廨开审被捕的学生，并决定于6月2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所谓“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增加码头捐的提案是使中国商品进出口负担更加沉重；交易要向工部局注册领照的提案，是限制中国人民在租界的民主权利，并在经济上打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印刷品向工部局注册，违者罚金、监禁的提案，不但打击中国出版商人，而且直接侵害中国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因此这些提案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

顾正红被杀后，沪西爆发了两万多纱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的罢工，日本老板采取关厂办法来破坏工人斗争。中国共产

党中央认为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必须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当前蓬蓬勃勃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汇合起来，把经济斗争转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决定了5月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5月30日下午三时许，群众一万人在南京路举行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十数人，捕去五十多人。

五卅事件后，群众到处集会演讲。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运动。在党的领导下，31日，上海二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核心。6月1日，上海伟大的三罢运动开始了。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五万多学生举行罢课，绝大部分商人举行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举行罢岗。接着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这个组织是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拒绝加入。6月6日，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严正地指出解决上海事件的途径：“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并提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斗争的主要目标^①。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6月1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十七条交涉条件^②，包括撤退外国在华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结社、出版的

① 1925年6月6日《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向导》周报117期）。

②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提出“先决条件”四条，“正式条件”十三条（《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1925年7月出版）。

自由，工人有罢工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华人参加租界市政会议，收回会审公廨等等。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

在伟大的革命浪潮下，美、英、日帝国主义将大批军舰集中到黄浦江上，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并在街道上殴打中国民众。同时又以允许上海租界纳税会议董事会增加华董、收回会审公廨为钓饵，和买办同谋，分裂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帝国主义者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相利诱，一面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等相威胁。同时通过戴季陶、胡适等提出了“友谊协商”办法。在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大买办虞洽卿就乘机修改十七条，并决定单独停止罢市，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奉系军队在青岛、天津、南京等地压迫罢工运动。在上海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逮捕了许多革命领袖。上海总工会为了保存工人组织和既得胜利，决定自动停止总同盟罢工，以解决工人的经济要求和解决地方性问题为条件，在7、8月间逐渐复工。

上海事件后，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北京、汉口、长沙、九江、杭州等地都曾经发生示威游行以及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广东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为抗议上海事件而起的。6月19日，香港十多万工人举行罢工，一致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并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条，要求答复。香港当局立即宣布戒严，

并对支持香港工人正义行动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6月23日,广州工人、学生、市民、军人十万人,举行援助五卅运动的游行示威,经过沙面对岸的沙基街道时,英法军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五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沙基大屠杀后,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和英国经济绝交,封锁海口。香港的中国工人在苏兆征^①、邓中夏^②领导下,掀起了二十五万人的大罢工。十三万罢工工人陆续撤回广州,和广州的工人通力合作,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厉行抵制英货日货运动。

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上有代表八百多名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议事机关,下设干事局、法制局、会审局、审计局、财政委员会、监狱、武装纠察队、医院、学校等,罢工委员会的整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政府机关。

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封锁了广东的所有港口。广东海岸,东起汕头,西至北海,蜿蜒几千里都被封锁起来。

广州香港的罢工斗争,使香港受到严重的损失。

在罢工时期内,香港对外贸易比罢工以前减少了一半以上,

① 苏兆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及1925年广州香港大罢工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192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1月病逝于上海。

②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2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以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1928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由莫斯科回国,担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3年在上海被捕,同年被害于南京。

香港的商店大量倒闭,香港纸币被拒绝使用,使香港每天的损失达三百五十万元。

另一方面,罢工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和发展。由于罢工委员会打通了广州和上海的航运,各地向来到香港直接采办货物的商人可来广州采办,使广州的批发商业不但恢复到罢工以前水平,并且日趋兴盛。广东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恢复信用,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罢工委员会决定结束罢工,并决定在海关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这一项收入为结束罢工费用。1926年10月10日宣布省港罢工结束。

这次罢工,由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这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伟大的事件,就是在世界工人罢工史上也是少见的。

由于省港罢工工人以及广东农民的支持和帮助,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起来。

罢工开始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内部军阀杨希闵、刘震寰^①和国民党右派阴谋叛乱,外部军阀陈炯明、邓本殷进行围攻。一切反动派企图里应外合地颠覆革命政府。

在孙中山北上前后,陈炯明盘踞着惠州、潮州、汕头一带,得

① 杨希闵原为滇军,刘震寰原为桂军。1922年6月孙中山北伐时,滇、桂军表示支持孙中山。时值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要求滇、桂军入粤讨陈,杨、刘趁机扩大地盘,孙中山委任杨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刘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1923年1月入广州,之后不再追歼陈炯明,在广州包烟包赌,包税走私,无恶不作,处处与军政府为难。1925年5月杨、刘和陈炯明、陈廉伯勾结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密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6月5日公开叛乱,6月11日被击溃。

到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军事援助，威胁广州安全。1925年2月，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东征军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学生军只有三千多人，而陈炯明及其同盟者的军队有八九万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和学生军的英勇善战，到三月底就击溃了陈炯明的精锐部队，占领了潮汕。

1925年6月初，杨希闵和刘震寰准备推翻革命政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主张，东征的革命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反动军队全部瓦解，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在讨伐杨刘战役后，7月1日，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并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军队的名称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

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却非常剧烈。国民党右派阴谋叛乱，为罢工委员会所察觉。8月11日广东工人举行肃清内奸大示威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左派。但是左派却动摇不定，不敢动手。接着发生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事件。广东革命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解散了反动军队，驱逐胡汉民、许崇智出广州^①。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首先攻克了陈炯明所盘踞的惠州。到10月底击溃了陈炯明的军队，收

①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积极进行反共活动。6、7月间，胡经常约集孙科、邓泽如、邹鲁、林直勉、胡毅生（胡汉民堂弟）等人秘密集会，攻击坚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商量反共清党问题，并与粤军首领许崇智部属联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主谋者朱卓文、胡毅生罪行被揭露。胡汉民、许崇智因与廖案有重大嫌疑，胡于9月间以“出使苏俄”为名，被逐出广州，许亦被蒋介石“通知”去上海“暂避”。

复了东江。

接着革命军举行南征。12月克服了高州、雷州、钦州、廉州，1926年2月消灭了海南岛的残敌，广东完全为革命军所统一。

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农民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开始结合起来，使农民运动成为整个革命的一支突起的新军。

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培养农民工作干部的主要机关，讲习所出来的学生，一部分留在广东，大部分分配到各省开辟农民工作。

1926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给这次大会的信上指出，农民运动必须和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且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

这一切促进了农民运动的高涨。

1926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有九十八万人，其中广东最多，有六十四万七千人。广东当时是革命根据地，农民运动首先开展起来。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包农制^①、减租退押、组织农民自卫军、取消民团、建立工农联盟等项重要决议。这时广东农民斗争，由取消苛捐杂税、减租退押，进而反抗豪绅和民团的压迫。

广东农民也投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东江战役中，海丰、陆丰、五华等县农民，协助东征军，打败了陈炯明。在讨伐杨刘战役中，广州四周农民，协同军队作战。在省港罢工中，农

^① 包农制就是资本家组织公司向地主承包田地，然后转租给佃农，一经转租，农民所受的剥削加重。

民和工人通力合作，封锁香港，坚持省港大罢工的斗争。

广东是农民运动先进省份之一。广东革命政府是在工农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前夜，开始发展起来。湖南有组织的农民有四十多万人，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有一百万人。湖北农民协会会员有七万二千人。

农民开始了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并准备迎接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担任革命军的助手和向导。

河南、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贪官污吏而举行了此起彼伏的暴动。农民采取了原始的组织即红枪会等，来反对军阀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农民的这种组织，往往为地主豪绅和富农所把持，变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工具。

北方这种农民的原始组织，由于共产党的努力，也逐渐改造为先进的组织——农民协会。1926年4月，河南成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农会会员二十七万人，农民自卫军十万人，在军阀统治下进行了抗捐抗税的斗争。

四 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根本思想

由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中国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结果，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接近于大决战。在革命阵营中，反动派和革命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到了紧张的程度。

这正是北伐战争前夜的革命形势。

这时，对于谁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基本问题，即：革命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严重的争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的民主力量。他们只注意同资产阶级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者都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在1926年3月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这篇论文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根本思想。

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根本思想的根据是：

第一，毛泽东完整地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代表着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存在和发展

依附于帝国主义，他们是帝国主义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他们是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的。他们是中国的反动派，是革命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

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力量集中，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恶化，因而最富于革命的战斗性。近年来爆发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工人罢工，例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煤矿罢工，特别是上海罢工和香港罢工等。毛泽东从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富于战斗性，从近年来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力量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个不可怀疑的结论。

半无产阶级，即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极容易接受革命宣传和卷入革命斗争。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占农村人口的极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这就是说，农民是有伟大的革命潜力的阶级。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即工农联盟问题。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个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部分，即小资产阶级右翼（占少数）、中派（约占半数）和左翼（有数量不小的群众）。这三部分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左派参加革命，中派可能参加革命，即右翼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合着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即革命性和妥协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由它本身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他们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工人阶级就有联合他们的必要。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他们总是力图使自己爬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缺乏革命的坚决性，特别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们害怕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有可能由妥协调摇而脱离革命，有可能充当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因此，工人阶级要提高警惕性，和他们的妥协性作坚决而适当的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从1911年的革命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它还有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种左右开弓的叫嚣。

毛泽东预见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随着买办资产阶级走。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完全证明了这个科学的论断。

第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分为两大势力，即社会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国的革命，只有加入社会主义方面，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成为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才能获得胜利。

这样，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国内条件国际条件所提出的革命路线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必须以工人阶级为

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并联合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

这篇著作,是中国最早的最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文献。它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论断,正确地解决了过去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对待资产阶级问题。它坚决地反对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路线。

这篇著作也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理论而写的。国民党改组时,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开始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国民党关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政纲。后来,孙中山把右派冯自由集团开除了,但留在党内的胡汉民、邹鲁、张继等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国民党右派反动理论的代表是戴季陶^①。

第一,戴季陶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认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必采取斗争方式,可以用仁爱的心去感化资本家,使他们尊重工人的利

^① 戴季陶:又名传贤、天仇。国民党右派集团的“理论家”。早年加入同盟会,1918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1923年底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执委委员和常务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到处讲演,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形成了系统的“戴季陶主义”。恽代英、瞿秋白等曾著文批判之。戴季陶小册子散发后,被群众愤怒烧毁了几万册。

益。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工农群众放弃阶级斗争，听凭资本家的恩赐和指使。

第二，戴季陶说“国家”“民族”是最高原则，但是，戴季陶的所谓“国家”“民族”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而工农处于从属和被统治的地位。他把“国家”“民族”当作招牌，来欺骗工农群众，并阻挠工农提出革命的正义要求，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第三，戴季陶认为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只应当信仰三民主义，而不应当信仰共产主义，只应当承认三民主义是唯一的理论，国民党是唯一的政党。他的意图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制甚至消灭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

戴季陶虽然口口声声反对阶级斗争，但是，他在思想上行动上进行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阶级斗争罢了。因此戴季陶叫喊：“拚命行一种迪克推多”（即军事独裁），这是教唆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最露骨的叫喊。

廖仲恺被害后，国民党右派首要分子无法在广东立足，被迫出走北方。到1925年11月形成了西山会议派。这些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外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会，即西山会议，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布开除共产党，取消联俄政策。他们宣称在上海成立另一个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西山会议是国民党右派的公开叛变。但是，他们从广东被驱逐出去，开会的地点在段祺瑞政府庇护下的北京，他们担当不了反革命的主导作用，因而产生西山会议派拉拢蒋介石，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阴谋。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实际上西山会议以后，反革命的首领不属于西山会议派方面而属于蒋介石方面了。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广东广泛地进行了反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使它和反革命成为同义语，妇孺皆知，中外闻名。这时，蒋介石虽然早已暗中和西山会议派互相勾结，但是他还装着革命的样子，假意反对西山会议派，主张联合共产党、联合苏俄和各国革命政党，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进行欺骗。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三大政策，并斥责右派的反动活动和开除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但是，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领导这次大会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接受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正确意见来坚决反对右派首要分子，把他们从国民党内驱逐出去，反而对右派分子作了无原则的让步，把已经被广东革命势力驱逐出广东的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从上海召回来参加这次大会，选举他们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因此，由这次大会产生的三十六名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只有7人，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15人。在监察委员中，右派分子占了多数。这就使这些右派分子后来利用他们在国民党内的职位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更严重的是把蒋介石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抬高了他在革命中的地位。

蒋介石是躲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冒险家、野心家。在1911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上海的交易所里充当经纪人。孙中山联俄后，他觉得向革命投机对他有利，就又投奔孙中山。蒋介石曾经被派到苏俄考察，回国后，高唱革命的调子，使孙中山错认他革命，后来还派他当了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这个野心家窃取

了重要的军事职位以后，就装着革命的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实际上准备篡夺革命，以便最后出卖革命。

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从此以后，蒋介石为一切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所器重，成了他们的政治代表，使他敢于发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事件。

1926年3月，蒋介石和他的党羽共同策划了一个“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人开刀了。

3月18日，蒋介石密令他的党羽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要海军局调派所辖的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阴谋分子就立刻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准备暴动，推翻政府。蒋介石恐怕中山舰起来抵抗，又命令另一只军舰开到黄埔进行监视。20日早晨，蒋介石即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且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窃取了第一军的军权。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①。即限制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共产党员不得占全体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当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须交给国民党主席。这次会议之后，蒋介石就开始把国民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蒋介石这些阴谋活动，是利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

^① 《整理党务决议案》（《政治周报》第14期）。

机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弱点的。在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等主张对蒋介石采取进攻的策略来打退反动阴谋^①。当时进攻的政策是可能胜利的，因为蒋介石在广东国民革命军各军中是孤立的，他所统率的军队只占少数，所有民众革命组织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如果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是可以打退的。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敢斗争，认为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能压倒蒋介石，而蒋介石不但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整个资产阶级都站在他一面，为了使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应当采取让步政策。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错误地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柱石”，凡是反对蒋介石的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为了所谓“统一”，给人家戳了一刀，也不敢还手，甚至也没有还手的意思。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竭力替蒋介石洗刷罪恶。陈独秀说：“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即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②野心家、冒险家蒋介石，在陈独秀眼里竟成了革命者，自然陈独秀也就敢于荒谬绝伦地说反对蒋介石就是“反革命”了。

陈独秀这种妥协让步的政策，更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

① 据茅盾同志1978年1月回忆（茅盾当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山舰事件后，广东区委陈延年请示上海党中央，回电说要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按国民党二大既定计划在下半年出师北伐。毛泽东不同意此方针，认为从两广整个局面看，蒋介石只掌握第一军，和其他军有矛盾，力量上并不占优势。主张给蒋以反击，先说服国民党左派领袖撤出广州，然后公开声讨蒋介石，至少可迫使其让步。但苏联顾问团代表不同意毛泽东意见，遂同蒋介石妥协。

②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926年6月4日（《向导》157期）。

但是，这时蒋介石反动集团还想利用工农力量来窃取更大的革命果实，所以还不愿也不敢公开反共。蒋介石的地位巩固后，就转过来打击他的同谋者王柏龄、吴铁城等，不是限令离开广州，就是囚禁起来。因此，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之后，又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口头上表示联共，一面时刻准备着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

第四章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革命的失败

(1926年7月至1927年7月)

一 北伐战争中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一直是北方反动势力的首领。他们反对国民会议，排斥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扩大在关内的占领区，压迫人民革命运动。五卅事件后勃兴的爱国运动完全为奉系军阀的高压政策所摧残。奉系军阀是帝国主义最有力的一个工具，全国人民都反对这派卖国军阀，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反奉运动。

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利用人民反奉的要求，1925年11月间同张作霖宣战，向江苏上海方面进攻。直系军阀企图在反奉运动中取得领袖地位，同奉系在帝国主义面前争宠。1925年12月，在全国反奉高潮下奉系内部又爆发了战争，即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在滦州举事，率领军队打到奉天（即辽宁省）沈阳附近。

张作霖在北方的反动统治在崩溃中。

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地使用武装来帮助张作霖。英美帝国主

义鉴于全国人民的反奉运动乃是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有力工具,将要危害帝国主义的统治,于是以“反赤”为口号促成张作霖和吴佩孚两派军阀的合作,进攻中国人民和倾向革命的国民军。

帝国主义第一次武装干涉,是1925年12月日本出兵奉天帮助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保存了奉军的心脏地带。第二次是1926年3月日本帮助张作霖攻打直隶(即河北省),国民军被迫退出天津、北京,再退出南口、张家口。英国帮助吴佩孚攻打河南,解除国民军的武装。

当张作霖进攻直隶国民军时,日本军舰协助张作霖在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引起北京人民的愤怒,1926年3月18日举行了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运动,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制造了“三一八”事件。

北京屠杀事件以后,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得到部分的成功,“反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扩大。第一,帝国主义纠合直奉两系军阀,巩固他们在中国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并组织奉直北京联合政府。第二,援助张作霖把国民军驱逐出长城以外以至西北地区。第三,援助直系军阀由湖南、江西、福建方面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包围进攻。

当时吴佩孚占据河南、湖北两省,孙传芳占据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张作霖除东北各省外,还占据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吴佩孚、孙传芳进攻南方革命势力,张作霖进攻北方革命势力。

虽然吴佩孚、张作霖在“反赤”中彼此常常争吵和冲突,但是,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奉直两系军阀已经联合起来;虽然对于反动政府的分赃,吴张之间还有许多争执,但是这个政权的反动性

质是不变的。帝国主义各自掌握一派军阀，互争优势，同时共同支持南北军阀的反动统治。

吴佩孚反对南方革命势力的步骤是：首先，援助湖南所有反动部队，把倾向革命的军队从湖南驱逐出去，并打击湖南革命势力；其次，纠合湖北全省军队以及河南、湖南、江西一部分军队攻取两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鉴于中国人民在奉直两系军阀的统治下已经起来，用革命战争摧毁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迫切要求；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在军事上处于被包围的不利地位，而冲破军事包围的唯一出路是出师北伐。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①，号召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因而积极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

1926年7月革命军举行北伐。

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革命军队中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而且北伐各军政治部的工作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重大的因素。

苏联在北伐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给了巨大的援助。

北伐战争的方针是把革命军队的主力用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并分出两支部队在广东东部和北部的边境上防备福建和江西的敌军。到湖南、湖北战场取得胜利后，然后集中兵力进击孙传芳部队，最后讨伐张作霖。

^① 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向导》163期）。

北伐战争的第一个战场是湖南、湖北战场，吴佩孚部队十万人，集中在这个战场上，摧毁吴佩孚部队，乃是北伐战争的首要任务。北伐军直接用于这个战场的是第四军及其他部队共五万人。第四军中由叶挺将军率领的独立团，是最精锐的先锋队，这支先锋队是由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组成的。

大军出发前，独立团首先北进，攻入湖南，开辟了北伐军的前进道路。北伐军很快攻克长沙和岳州，挫败了吴佩孚的气焰，动摇了吴佩孚的军心，使革命军得以长驱直入。

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汀泗桥战役。汀泗桥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高山耸立，只西南端有铁路可通，而铁路桥东又有深河，是湖北省境粤汉铁路上易守难攻的重要据点。吴佩孚军队据险坚守，一面调遣北方援军南下反攻，一面等待着孙传芳在江西袭击长沙切断革命军的后路。北伐军迅速地在8月底占领汀泗桥，粉碎了吴佩孚的作战计划。汀泗桥战役刚结束，吴佩孚的后援部队即开到汉口，而孙传芳也指挥他的主力部队从江西出动，可见汀泗桥战役迅速地胜利结束在整个战场上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汀泗桥战役后，吴佩孚军队守卫着粤汉路上另一个重要据点——贺胜桥。北伐军攻克了敌军的指挥阵地，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接着一鼓而攻下汉口，并在10月10日占领武昌。武汉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革命的中心。到1926年底武汉政府北伐军把吴佩孚残部驱出武胜关以外，统一了湖北全省。

第二个战场是江西、安徽、江苏战场。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这个战场上的北伐部队主力就转向江西，协同作战。第二战场上的第二军和第六军，依靠共产党人的政治工

作，在江西会战时，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但是，王柏龄所带领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的一部分，由于排斥共产党员，丧失了作战能力，一遇到孙传芳部队，即溃不成军。在安徽方面，北伐部队由九江沿江东下，由于投靠过来的地方军阀部队的响应，占领了合肥、蚌埠、安庆、芜湖，从南北两面包围南京。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南昌为蒋介石所占据，成为反革命的中心。

第三个战场是福建、浙江战场。北伐开始时，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军的另一部分，由何应钦带领进驻广东潮州、汕头，防御福建方面的敌军。江西会战时福建军阀周荫人部队侵入广东梅县松口，何应钦由广东东部进占漳州、泉州和福州。由于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不在，在福建各次战役中没有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浙江战役从12月开始。浙江地方军队举行倒戈，为孙传芳部队所迫，退守衢州。何应钦、白崇禧乘势由江西进入衢州。1927年2月攻入杭州和绍兴。

北伐军向长江流域推进，得到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

大军出发时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革命局势，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即自动结束省港罢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湖北工农群众极大地帮助了革命军，使北伐军迅速地攻入湖南、湖北两省。

北伐战争前夜，湖南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早有强大的组织基础。全省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十一万，农民有四十多万人，受党直接影响的农民有一百万以上，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有组织的。

1926年3月9日，湖南群众为抗议军阀政府屠杀群众领袖在长沙召开市民大会，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在群众的压力下，军阀赵恒惕从长沙出走。北伐军出师后在湖南所进行的几次战役，工农都积极参加，例如直接参战、狙击溃兵、带路、送信、运输、宣传、慰劳等等。北伐军进入长沙前，军阀叶开鑫就已逃走，工团联合会组织了工人保安队，把守城内外各要道，维持城内秩序。湖南长沙、安源各地工人，组织了运输队，帮助革命军。粤汉路工人组织了破路队，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响应革命军北进。

工农群众的支援，乃是北伐军所以能够迅速占领长沙、岳阳、武汉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1926年7月到年底，不到半年，广东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六个省份，歼灭了吴佩孚的军队，击败了孙传芳的主力。江苏、上海和南京，正在被包围中。

直系军阀的败亡，在军事形势上，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方面的重大变化，形成了国民革命军同奉系军阀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支持的国民革命军的继续发展和胜利，将要战胜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完成中国的独立和统一。

但是，在革命军的进军中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内两种力量的斗争。第一，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夺取了总司令的职位，他规定国民政府下的海军、陆军、空军以及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等都由总司令统辖。北伐军出发后，国民政府的民政财政各部机关都受总司令指挥，各省各军的官员都由总司令任免。于是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在北伐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和影响

的军队特别是第四军，摧毁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军队。湖南、湖北两省的工农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因此，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和南昌后，开始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武汉革命中心和以蒋介石反动派为代表的南昌反革命中心。第二，在闽、浙、赣、皖四省战役中，孙传芳部队的倒戈是促成北伐军长驱直入的便利条件；南方许多地方军阀都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因而新编的国民革命军绝大部分仍旧建筑在军阀统治的基础上。将军们利用雇佣兵制度，依然掌握着兵权。他们归向广东革命政府，与其说是倾向于革命，毋宁说是为了保存自己原有的实力。

因此，北伐战争的非常迅速的胜利过程，同时也是参加革命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迅速发生变化的过程。

一方面，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因素；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革命内部的军阀，看见反帝国主义反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超过他们所控制的范围，将要危害他们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勾结起来准备夺取革命领导权，以达到破坏革命的目的。

上海和南京被革命军占领的前夜，也是革命内部各阶级重新结合的前夜。

二 中国共产党内在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北伐军向长江流域进军，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成为全国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最尖锐的地区。因此，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密切地关联着中国革命的全局。

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和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不可分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战争开始后，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随后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湖南学生回到铁路沿线进行工作。他们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首先联络贫苦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然后成立乡农民协会，到若干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成立区的领导机关。这样，使湖南农民运动，有着深厚的基础。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民由自觉地参加北伐战争进而迅速地发展他们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并且自动地提出农民本身迫切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坚决地为取得政权而斗争。

到1926年11月，湖南全省有五十多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人。

农民协会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就是农民的革命专政的政权形式。农民通过农会猛烈地进行了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斗争。第一，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把地主阶级的权力打下去，树立起农会的权威。推翻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乡区反动政权机关。用革命民众团体和县长联合会议来控制县政权。在农民中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觉悟。禁牌赌，清盗匪，建立革命秩序。第二，阻止谷米出境，禁止抬高谷价。减租退押，不准退佃。废除苛捐。组织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限制中间剥削和放高利贷。第三，反对族权、神权、夫权等束缚农民的精神绳索。农会在农村中开办农民夜校普及文化。1926年12月，在长沙举行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

了减租退押、禁止放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重要提案，并正式产生了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机关。

在几个月内，以这一百多万农民会员为骨干，推动千百万农民群众，在湖南进行了旋转乾坤的大革命。

于是，在农民问题上，就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斗。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分子、北伐军的反动军官，向革命农民进行了各种反动的宣传和行动。

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诬蔑农民的革命斗争是农民的“惰性表现”，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从极端反动立场上来否定农民运动的革命作用。

反动派另一种恶毒的宣传，说农民运动使有钱的人逃跑了，赋税锐减，军费无着，所以农民运动妨碍政府收入和影响北伐战争。反动派企图把扰乱北伐后方的罪名强加在农民身上。

反动派更利用地主武装力量——团防来公开残杀农民领袖和革命农民。在偏僻地区，还组织各种暴乱，煽动落后农民游街示威，捣毁农会、国民党党部和政府机关。更组织假农会，利用旧政权，贿赂流氓地痞混入农会，控制国民党基层党部，勾结北伐军中反动军官，进行各种破坏。

在反动派的进攻面前，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地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陈独秀所写的决议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有了发展。

陈独秀主张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协

会除贫农雇农和中农以外，还包括中小地主在内。如果这样做，就使地主富农分子渗入农会，从中操纵把持。陈独秀反对农民的革命政权，主张用一种改良的绅权（即所谓正绅的政权），去代替旧的绅权（即所谓劣绅的政权），实际上是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因为这样，陈独秀主张农民武装只是自卫的而不是进攻的。陈独秀反对农民武装变为常备组织，同民团和反动军队进行战斗，取消农民的武装力量。

因此，陈独秀不敢提出土地革命纲领，而只提出“限定最高租额”、“限制高利盘剥”等改良政策。

陈独秀只注意同资产阶级合作，而忘记了农民，结果也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责任。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①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是不会和国民党争夺政权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②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陈独秀看来，是不存在的问题，不会发生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在中国建立所谓“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是乌托邦社会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而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样，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当然不为陈独秀所注意了。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1926年7月）。

②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向导》第172期）。

在北伐战争中，农民革命已经起来或正在起来，陈独秀就跟在反动派后面，压制农民革命。

陈独秀想用妥协的方法来缓和国民党内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进攻，使他们不离开统一战线，以便挽救革命。结果，陈独秀越发让步，反动势力就越发猖獗，而群众运动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政策就受到极大的损失。

为了支持在北伐战争中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斗争，毛泽东在1927年1月到湖南进行考察，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热烈地歌颂农民的英雄行为和革命创造，代表无产阶级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总结了当时农民革命的各方面的经验及其在革命中所达到的各种结果。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革命问题的科学的概括。

第一，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农民革命的目标是一切封建势力，而一切封建势力就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热烈地歌颂了同时又明确地肯定了农民革命的伟大意义。因为它要完成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战争和孙中山四十年来所没有做到的历史任务。

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流言蜚语，大骂农民运动“糟得很”。而毛泽东代表几万万农民的利益站起来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农村革命如暴风骤雨，什么力量也将压抑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将被农民革命送进坟墓，而一切政党都将在革命的农民面前受到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摆在一切政党面前要他们迅速选择的有三条道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

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而毛泽东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选择了第一条道路，表明无产阶级是农民的真正的领袖。

农民中有各个阶层，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富农中农和贫农对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富农——“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但是中农不同于富农，到革命潮流高涨，中农也卷入革命。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是农村革命的中坚，是革命的先锋，是革命的元勋。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基层农会的骨干，几乎全是他们。他们站起来而且当权了。他们团结中农，使富农中立。毛泽东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这是反革命的地主士绅们的恶毒的攻击。

第二，报告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革命思想。

对于农村里旋转乾坤的大变革，改良派认为是反常、过分、过火。但是，毛泽东却肯定地指出这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事变。因为农民的反抗，是由地主的压迫而来的，地主的压迫越发凶残，农民的反抗也就越发猛烈。农民的革命方向一点也没有错。“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在农村革命中，旧的倒不下去，新的就长不起来，所以大的革命潮流，农民的绝对权力，这在革命时期中是十分必要的。

农村反封建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农村民主势

力和封建势力的大决斗。对于这个革命，采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根本分歧。改良派企图束缚农民的革命行动，要农民在封建制度范围内去进行，只许修补封建的残缺，而不许破坏封建的成规。毛泽东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打翻封建制度，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能用改良的方法。

当然，群众在斗争中也可能产生某些错误，但绝对不能因此而束缚群众的手足，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甚至把斗争本身也否定了。这里革命领导就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农民的前头去领导他们。

革命都是干起来再学，而不是学好了再去干，领导者的责任是信任群众的正确的创造，然后集中群众的革命经验并引导群众向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被士绅们所诬蔑为“痞子”的基层农会的领袖，由于过去在旧社会里生长，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不良思想和习惯，这是事实。但是，革命的大风暴来了，他们掌了权，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得到了改造。“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匪患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这里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农民群众能创造革命的奇迹，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改造了旧的社会，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是群众的革命创造的过程，也是群众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报告明确地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革命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的统治的暴力革命。湖南

农民起来打翻地主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是湖南一千万革命农民群众的口号。农会权力高于一切，农会发号施令，在旧社会里没有地位的人都站起来而且当权了。

革命武装是革命政权的支柱。农民有了武装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才能压服一切反动派的反抗。湖南农民武装，一种是由地主武装改编而成的，另一种是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梭镖队。而梭镖队势力大于旧式武装势力。梭镖队各县有三、四万以至七、八万不等。毛泽东劝告湖南国民党当局：要使这种武装力量普及全省，使每个青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扩大这种武装力量，来保证革命的完全胜利。

发动群众，既要反对命令主义，也要反对尾巴主义。命令主义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群众的自愿原则，不相信群众正确的创造。尾巴主义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不能集中群众的意志和经验，领导他们走上胜利的道路。

共产党不同于所有其他政党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和最广大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特征，从毛泽东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说明。他科学地估计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从而奠定了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根本思想。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根本思想在农民革命问题上的具体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毛泽东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指明了工人阶级能否实现对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著作就成了关

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经典著作。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在革命紧急时期对农民革命这一个左右革命全局的问题的公开的完全的分裂。

三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北伐军的胜利前进和工农群众革命的高涨，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因而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有两种方式：第一种，采取屠杀政策，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第二种，扶植革命内部的反动派来分裂革命。

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所以能够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因为英、日、美帝国主义在财政上、军械上、精神上给他们以各种援助，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中国革命的刀锋也对准着这些军阀。消灭北洋军阀，就是打击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

但是，当广东革命军向长江流域推进的时候，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不能充当消灭革命的有效工具，于是采取更毒辣的方法，在革命统一战线里面，寻找它的同盟者，即帝国主义和当时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反动派勾结起来，要从革命内部来破坏革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于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就更加激烈了。

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有宣传员在汉口英租界和华界交界点讲演，英国调集水兵登陆驱逐听讲群众，并刺死和刺伤群众多人。汉口革命群众一方面要求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另一方面在1月

5日举行示威大会，占领英国租界，迫使英国放弃租界，交还中国政府。

1月6日，九江英国兵枪杀中国工人，群众又占领九江英租界，交中国政府接管。

汉口和九江租界的收回是反帝国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创举。

自北伐军占领武汉转战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孙传芳军队交锋后，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起义，解放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长期侵略和统治的中心据点——上海。

武装起义以前，1926年5月30日，上海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游行示威。接着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工人掀起了大罢工运动。6、7、8三个月内，罢工人数前后有二十万人，到9月还有三万工人坚持长期的罢工斗争。上海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要求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资本家通过军阀政府封闭上海总工会，并停闭工厂，使工人受到失业的威胁。对于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也无故开除或克扣工资，并收买流氓向工人挑衅。但是上海的罢工并不因此而停止，从8月下半月起，大罢工的锋芒转向反日。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了罢工命令。这次大罢工，更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和组织力量。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吴佩孚失掉了他最后的地盘。北伐军主力开赴江西，孙传芳军队大部分调到前线去抵抗。在浙江的孙传芳部下夏超倾向革命，10月在杭州宣布和孙传芳

分裂，并进攻上海，逼近上海市郊。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0月23日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之前，上海工人组织了一百三十人的工人武装和一千人的没有武器的战斗队伍；敌人在上海市内有步兵和警察三千人，还有一个旅分布在上海附近的长江两岸。这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和夏超的失败，没有成功。

北伐军占领杭州和嘉兴后，党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攻，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和罢工的要求。上海工人立刻举行罢工，第一天参加罢工人数十五万人，第二天二十七万人，第三天三十五万人，第四天三十六万人。罢工开始的第一天，军阀政府立刻联合上海租界工部局实行白色恐怖。第四天(22日)武装起义开始了。上海工人、商人、学生的代表和共产党、国民党的代表成立了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

不利于这次武装起义的情况是：这时由白崇禧所率领的北伐军停止进攻上海，坐视上海工人单独同孙传芳军队作战，两败俱伤。党在军阀军队(海军和李宝章军队)和中间阶层的工作做得很少。因为海军和李宝章军队表示动摇，如果设法争取他们，是可以从内部来瓦解敌人的；同时，对于一般市民没有号召他们行动起来，而依赖大资产阶级(钮永建、虞洽卿等)。第五天，上海总工会宣布24日一律复工，这次起义也失败了。

接着党以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党在职工会、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做了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向工人群众宣传建立人民政权的意义。发动小资产阶级起来。保持同大资产阶级的联系，同时逼迫他们服

从群众意志,反对他们的妥协政策。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进攻距离上海不远的龙华时,上海总工会再次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人,在党的领导下武装起义开始了。划分了七个起义地区: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起义军一开始就截断铁路,占领了警察署、电话局和电信局,切断了电灯线和自来水管。枪炮声和群众的口号声顿时响彻整个上海天空。徒手群众也夺到了武器。闸北以外的六个区都在21日下午打下来了。闸北一区的战斗最为剧烈,从21日正午起到22日午后六时止,前后经过两天一夜,才取得了胜利。直鲁反动军队中有白俄兵和英国铁甲汽车协同作战。起义者夺取各警署后即占领天通庵车站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最后的战斗是集中火力攻打北站。由于工人武装的猛攻和群众的加入作战,北站被占领,反动军队被击败,第三次起义获得了完全胜利,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工人阶级的英勇的搏斗下解放了。党立即召开上海市民大会,选举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及其他部队占领了南京。当天夜间,英、美、日、法等国的兵舰炮击南京,死伤军民二千人。帝国主义以大炮来恫吓中国人民,并企图在心脏地带打击革命。

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接着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

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一天天露骨了。1926年冬蒋介石进驻南昌后,就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论,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而

以南昌为他进行反革命的中心，同武汉革命中心相对抗。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接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中央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推动下，一致通过提高党权、提高民主、反对独裁的决议，并且罢免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次会议是革命派对反革命派斗争的一个胜利。会议后蒋介石加紧准备叛变，他积极扩充他的嫡系部队和到处收编在闽、浙、赣、皖四省各次战役中反正过来的军阀部队。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呼吁求援。蒋介石通过戴季陶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王正廷、宋子文、李石曾、吴稚晖等去勾结英、美、法帝国主义。日本、美国、英国也通过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等和蒋介石谈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条件。许多旧官僚政客（黄郛、张群等）靠到蒋介石的身边来，帮助蒋介石策划反革命。这时，英、美、法、日帝国主义集中在上海的侵略军队共有三万多人，还有军队陆续调来，声援蒋介石。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更加合拍，蒋介石的反动也就更加猖獗了。1927年3月，蒋介石惨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①，镇压了赣州工人运动，解散了九江市总工会，打死打伤了工人多人，在安庆组织了伪安徽省总工会来捣毁真正工人组织的安徽总工会和左派国民党的省党部。上海工人解放了上海，蒋介石马上赶到并和集中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会面，并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策动下，布置反革命政变。

^① 陈赞贤：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1926年任江西南康县县长，后至赣州领导工人运动，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和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3月6日被反动派杀害。

首先，从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开始，蒋介石调遣他的亲信，占据南京和杭州，孤立了上海的革命力量。4月2日，反动派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由吴稚晖提出了弹劾共产党的文告，作为反革命政变的根据。4月3日至5日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举行反共会议，取得一些反动协议（镇压共产党和上海工人武装，拒绝执行武汉国民党的命令）。接着蒋介石就纠合上海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来反对上海总工会。调派反动军队驻防闸北，来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刽子手白崇禧、周凤岐为司令），禁止集会，禁止罢工，禁止游行。

另一方面，蒋介石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腕。蒋介石虽然把工人纠察队看成眼中钉，但是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并赠给工人纠察队以“共同奋斗”锦旗一面，麻痹革命者的警觉，以便对革命进行突然的袭击。蒋介石更利用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一面制止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原定3月29日成立），一面指使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辞职，使人民政府流产。但是，陈独秀不敢发动群众来支持人民政府，以为政府中不能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无原则地去拉拢他们，蒋介石见陈独秀束手无策，就指派他的党徒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人民的政权。

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联合宣言，在这个宣言上没有一字指责反革命的阴谋，它反而成了蒋介石布置屠杀的烟幕。

这一切反动阴谋布置完后，4月9日蒋介石就离开上海到南京。

上海工人纠察队分驻于闸北、吴淞、浦东、南市等地。4月

12日黎明之前，蒋介石发出了大屠杀命令。早已准备好的流氓和反革命军队一齐动手。流氓从租界冲出，袭击工人，军队借口援助工人，而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有些地方就由军队直接动手缴械。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刽子手白崇禧诬称流氓袭击工人为“工人内讧”，所以缴械。又恐怕工人举行罢工，同时颁布了严禁罢工的命令。

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上海工人进行了英勇的反抗。4月12日中午，工人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立即发布命令，从当天起全市举行总罢工。尽管在白色恐怖下，参加罢工工人还有二十万人。

全上海工人和市民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向反动派表示严重的抗议。特别是南市群众大会后，五十万市民到龙华请愿，迫使白崇禧不得不在口头上接受了一些条件。

总工会13日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到周凤岐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在宝山路上遭到反动军队的大屠杀，死难者百人以上，伤者不可胜计。

大屠杀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取消总工会，并指使“上海工界联合会”（即后来改名的“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的流氓占据上海总工会会所，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屠杀工人领袖。接着上海市一切革命的机关团体，也先后被封闭了。从此，上海工人和革命者的一切自由完全被剥夺，集会者枪毙，罢工者枪毙。工人斗争陷于孤立，如果继续举行总同盟罢工，徒然增加无益的牺牲。为了保存力量，总工会14日晚发布了复工的命令。

上海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极严重的摧残，总同盟罢工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但上海工人并没有屈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总工会依然坚持秘密工作，领导上海工人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蒋介石叛变后，东南各省和广东都充满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血腥恐怖，许多优秀的革命者，牺牲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屠刀之下。

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先进分子，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了工会农会。在广东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有二千一百多人，被秘密枪杀的一百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二千多人。6月19日和23日，工人奋起抵抗，举行总罢工，结果也被镇压下去。

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是革命的部分失败，但是整个革命却进入新的阶段。

四 武汉时期政治形势

4月12日反革命事变以后，中国南部就出现了两个营垒，一个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营垒，另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营垒。

这时武汉地区工农群众运动继续发展，特别在湖南湖北农民运动正在高涨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员有五万七千九百多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员只有九百多人。党的政治影响比党员数目的增加更快，也更大，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工人有二百八十万，农民九百多万。

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是从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到要求参加政权；是从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取得团体契约权到要求管理国有企业；工会从分散的行会组成产业组合，各地方的总工会，有最高的权力。

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暴风骤雨般地爆发起来。

1927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共有九百一十五万人，其中湖南最多，四百五十一万人，湖北其次，二百五十万人。

在马日事变前，湖南掀起了农村革命的风暴。农民起来管理和分配粮食。农民起来扫荡土豪劣绅在乡村中的统治权。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由丈田（清丈田亩，照田的面积交租）而插标（把土地耕种权重新分配以插标为记），而分田（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

湖北农民运动也有极大的发展。1927年3月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以后，农民在农村中开展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农民协会变成农民的革命政权，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由减租减息到要求分配土地。

1927年2月，江西成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农民进行了打倒土豪劣绅和减租减息的斗争。江西农民运动还在发动时期，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统治之下，经过左右派两次政权的转移。

广东的农民运动，发展最早，农民群众早已要求分配土地。但是，在反动统治之下，农民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东南苏皖浙闽等省减租抗税的斗争都已开始。河南的红枪会进行了反抗军阀、抗捐抗税的斗争。北方各省农民在军阀暴政之下，也纷纷起来反抗。

湘鄂粤三省农民运动，是以贫农为基础的。农民运动这种社会基础指明它的前途一定是土地革命。农民政权是以贫农为骨干的。农民掌握政权是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枢纽，因为农民不但取得土地，要有自己的政权，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自己的政权不可。农民的斗争起初是减租减息，往后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

农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其发展阶段先后不一，但是，在南方各省，一般趋势已经进入土地革命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在革命紧急阶段，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 27 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参加大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职工国际代表团。

陈独秀在这次大会上，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没有进行清算。例如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政策，陈独秀不肯从批判机会主义错误上得出正确结论，硬说妥协是由于革命力量不能压倒蒋介石和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反革命面目。又例如上海工人起义，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只可以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起义是错误的，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责任和建立革命政权的伟大意义。

土地问题是当前最根本的问题。陈独秀主张只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即使如此，也只是原则上的承认，并不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指示。陈独秀完全避开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财产。

陈独秀把扩大革命和深入革命截然地分开：要就是扩大革命，继续北伐和扩大革命范围；要就是深入革命，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陈独秀选择了所谓“扩大革命”的道路。陈独秀主张继续北伐，也是为了缓和武汉地区的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

陈独秀认为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以及其他工业区都不可能发展革命，因为那里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力。革命应当转移到西北各省去，因为在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成长。因此，陈独秀主张革命要退出东南各省。

瞿秋白在大会上散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长篇意见书，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和支持。

大会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

大会指责了陈独秀放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获得胜利的根本条件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大会驳斥了陈独秀把扩大革命和加深革命截然分开的错误意见。扩大革命和加深革命是互为条件的，革命要扩大，也要加深，加深革命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大会指出只要扩大革命而不深入革命的危险，例如在革命军所占领的地区中，由于革命不深入，没有摧毁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到蒋介石一叛变，革命人民就无力抵抗。

大会指出了蒋介石政变并没有击败革命，当前不是革命低落时期，而是革命高涨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因此，大会驳斥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互相争夺的主要场所。因此，从稳定局面中产生着新的危机，造成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正因为这样，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紧张起来，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由1927年8月至1930年这个时期内，国民党新军阀发动了六、七次内战。1927年10月发生了蒋介石、李宗仁和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2月发生了蒋介石和广东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4、5月间发生了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1929年3、4月发生了蒋介石和广西军阀争夺华中的战争；1929年8月发生了蒋和冯、阎的战争；1930年4月又发生了第二次蒋和冯、阎的战争。此外，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各省军阀的战争。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三年间，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没有的。

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冲突的反映。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反动派利用它的优势地位并得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战胜了它的对手。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彻底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彻底地依靠封建势力，压迫国内人民。叛变了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蒋介石变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

毛泽东曾经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加以最本质的分析：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

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①

这就是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过去旧军阀的统治的阶级基础完全一样，而且更加残暴凶恶。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以江苏、浙江的金融买办势力为中心而构成的。买办、流氓、军阀、党棍混为一体，向全国人民进行军事的、特务的恐怖统治。国民党新军阀，虽然彻头彻尾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革命事业，把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变成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组织，把革命的旗帜变成反革命的旗帜，但是，它在表面上始终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拿在手里，借以欺骗人民。因此，蒋介石这个新军阀统治的特点，一方面是军事恐怖，一方面是政治欺骗。

1927年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也跟着大资产阶级而投降变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坚持着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结成反革命联盟。因而在全国范围内，敌人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革命转入了低潮。

国民党反动统治对于跟着大资产阶级跑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给以任何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一两个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参加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过是为了粉饰法西斯专政的门面。国民党反动派对于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工农群众进行了更残酷的屠杀。仅在1928年1月到8月，工农群众被残杀的就十万人，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比革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命以前更为厉害。

国民党反动派首先向城市工人进攻。

国民党反动统治比旧军阀的统治凶恶得多，残暴得多，把工人已经争得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全部都剥夺了。

革命时代，上海、广州、武汉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胜利之一是增加工资。但在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武汉、广州工人的工资是大大减低了。

工人的工作时间恢复到十一小时以上，以前所争得的饭后半小时休息被取消了；星期日的休息，一般是没有的，而且星期日有休息的时间大半也是没有工资的。

劳动条件更为苛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上海纱厂从前做十六支纱的，现在要做三十二支；从前一个人管理一部机器或两部机器的，现在一个人要管理三四部。改良待遇取消了，女工产前、产后一个月休息和童工待遇的改善等，也都被取消了。不仅如此，工厂里的工人必须有保结和联保。工厂里还设置特别的包探、巡捕甚至军队，监督着工人工作。

更残暴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赤色工会的进攻。他们用白色恐怖对付赤色工会，所有赤色工会都被封闭了，赤色工会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中，不能公开活动。工人及其领袖被镇压，工人中参加过斗争的，差不多80%都被杀害或被开除了。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只能暂时地维持它的政权，无论如何是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稳定的。虽然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生活极端恶化，但工人的斗争仍旧坚持下去。

1928年，上海共发生了一百四十次罢工，参加的工人有二三三，八〇二人。上海工人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罢工的斗

争。

但是，因为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反革命的恐怖统治和赤色工会不能公开活动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所以不能不带着革命低潮时期的特点：

第一，工人的斗争，极大多数是经济斗争。例如 1928 年下半年上海劳资冲突的原因属于经济方面，即因改善工资待遇而起的占 92%，其他占 8%。工人由于所受剥削的异常严重而有迫切斗争的需要。

第二，这些斗争大多数是带着自发性的。自发的工人斗争占 49%，由黄色工会发动的占 12%，赤色工会领导的占 37%。

第三，罢工工人中，店员和手工工人占很大的数目，参加工人斗争的一百九十六个业别中，属于手工业工人、店员、码头工人的共有九十四，约占半数。产业工人在反革命恐怖之下受到极大的摧残，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

第四，这些斗争中完全胜利的只有 22%，部分胜利的 19%，失败、无结果和未解决的却占 59%。工人斗争取得胜利的很少，大部分是失败的或无结果的。

在反革命恐怖之下，城市工人运动的高潮暂时过去了，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进攻性质转为防御性质。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农村的豪绅地主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农民在北伐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大都被豪绅地主所摧毁。减租减息的法令，一律取消，地主们疯狂地加租加息，反动政府残酷地加重田赋捐税。这一切剥夺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

农民运动，在粤、湘、鄂、赣四省开始进入武装割据。在广东

东部的海丰、陆丰和南部的琼崖，在湘赣边界，在湘粤边界，在湖北黄安、麻城等地，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在蒋介石统治中心的江苏、浙江，发生了农民抗租抗税的斗争。河南的红枪会等农民原始组织的斗争，日益深入。河北和山东的某些地区，发生了农民骚动。

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农民群众的斗争同样地坚持下去。

但是，在白色恐怖之下，农民运动也带着低潮时期的特点。毛泽东根据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正确指出了革命潮流的低落：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①

对国内政治形势这种深刻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冷冷清清，就是说群众运动被打散了，还没有恢复过来；游击战争要硬打，就是说，反动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到崩溃的危机，还没有发展到不能统治下去的局势。

湘赣边界是这样，其他各省也是这样。

当时，农民革命多数发生于粤、湘、鄂、赣四省中有革命基础的地区。因为这四个省份，在北伐战争时期，受过大革命风暴的影响；而在广大农村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但是农民起义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农民的武装和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各个地区，由于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和党的领导的强弱有所不同，所以农民运动的发展也不一致。

^①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总括起来说,1927年革命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因此,中国此时依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但是,革命失败以后,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工农革命力量被摧残被打散了。第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个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当然,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它是在对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旷古未有的血腥镇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在人民中间极端孤立,和全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加深;由于它立足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它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是脆弱的;由于它内部的倾轧和战争,也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这一切说明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大大削弱,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也不稳固,这就是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的客观基础。

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是决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从这里就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促使中国革命由低潮逐渐转变到高潮。

二 中国革命由进攻到退却的转变过程

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危急的时候,党为挽救革命的失败,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等的领导下,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武装起义是在8月1日黎明时发动的,仅仅三小时的战斗,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的军队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

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没有认识到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结合的重大意义，因而举行起义以后，武装部队向哪里进攻的问题，就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当时，江西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还在高涨中，起义的军队应该而且只有向农村进攻，武装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才是正确的方向。但起义的军队却南下远征，企图重新占领广州和广东。在南下途中，部队不取道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江西西部，直入广东，而取道农民运动没有起来的江西东部的荒凉地区。部队到达瑞金、会昌后，不南下攻取梅县，竟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攻取潮州、汕头，使敌军得以从容地布置军事进攻。部队本身没有很好建立起政治工作，在南下进军中，在军队和群众中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宣传，军队党的支部建立在团而不是建立在连队上。结果使大部分军队在和优势的反动军队作战中遭到失败，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力量。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武装力量，向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党在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反对反革命屠杀而挽救革命失败的英勇斗争。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

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从这时候起，中国出现了一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斗的军队。它把中国革命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党的中央紧急会议以决定挽救革命的对策。

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领导权问

题、革命武装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八七会议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党必须领导农民用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革命的斗争。建立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胜利后作为临时革命政府；建立工农革命军，在军队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和建立党代表制度。这些是八七会议的功绩，也是八七会议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八七会议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没有根据各地区的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来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以便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革命力量，反而允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

党的八七会议号召各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以挽救革命。

湘、鄂、赣、粤四省是革命基础强大的地区，党决定了首先在这些省份发动。秋天是农民收获的时候，也是地主催租的时候，党领导农民在秋收举行起义，一粒米也不缴纳给地主豪绅，并在起义中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湖南中部的湘潭、宁乡和东部的平江、醴陵、浏阳，在湖北东部的黄安、麻城和南部的蒲圻、咸宁，在广东东部的海丰、陆丰，都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

党派遣毛泽东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在那里把安源煤矿起义工人，把从武昌开来的由党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的警卫团和萍乡、醴陵、浏阳的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革命军。9月9日发动了起义。但由于所收编的夏斗寅残部（进攻武汉被击溃流落在湖北南部一带）举行叛变，使起义部队受到

了损失。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进行整顿，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成立了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前敌委员会。三湾整编后，就有计划地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发，十月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1927年12月11日，广州工人和士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有名的广州起义。以叶剑英所部教导团为主力联合工人赤卫队，首先起义。随后广州工人自动参加赤卫队作战的有五、六万人。起义开始即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颁布了革命的政纲。广州起义是大城市起义。起义开始时，国民党在广州市内的武装力量超过起义者五、六倍以上，国民党各派反革命军队、警察、民团等，都联合起来从四面向广州进攻，美、英、日帝国主义更以兵舰掩护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广州起义也没有来得及同海丰、陆丰农民起义结合起来，结果这次起义很快遭到了失败。紧接着是国民党军阀的白色恐怖，被杀害的革命者共有七、八千人。在革命低潮、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企图长期占领象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

秋收起义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到广大农民中。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军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领导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变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巩固了它的反动统治，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必须立刻采取退守政策，从战场上退下来，停止一切革命斗争，进行“合法运动”。陈独秀武断地说武装起义是幻想，不可能经过起义而取得政权。只

主张农民“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反对农民武装起义，反对农村土地革命，反对建立红色政权。陈独秀派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同时，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在党内的反映。这种“左”倾情绪开始于党的八七会议，后来继续增长。到1927年11月党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就形成“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时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认革命有阶段的区别，认为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和一定任务，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的任务中去完成。

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即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不但不是低落，而是高涨、上升，认为当时各省农民起义，已经发展到夺取几省政权的局面，并接近于夺取工商业中心。因此，他们错误地规定了湖南、湖北两省的起义计划，规定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江苏、浙江等省的起义计划，甚至规定以河北省三专区和京东四县为起点的北方各省起义计划，以及东北起义计划等等。他们对城市斗争和乡村斗争不加区别，错误地认为城市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上海工人必须同附近各县农民起义互相呼应。宜兴、无锡农民起义后，又命令在南京也必须加速准备起义等等。

他们否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否认革命的低潮，反

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一定要把城市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一定要把农村的抗捐抗租发展到武装起义。起义不必经过准备阶段，而且一经发动即不得退却。这样，他们就不顾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群众的疲惫状况，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少数革命群众进行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的军事冒险。

和上述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他们在组织上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这次“左”倾盲动主义使实际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很快就受到了毛泽东和在白区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批评。到1928年初，盲动主义政策就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到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举行有极端重要历史意义的进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由湘南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正式组成了中国的新式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28年4月到7月，正当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蒋介石命令江西、湖南的军队向湘赣边界进行了三次围攻。反动军队每次出动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而红军以不到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相周旋。红军打破了敌人的湘、赣两省的“会剿”，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

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由于遵循了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

这个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则是：

第一，在军事方面，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红军不能分兵的理由是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领导力量分小了就不健全，而环境越恶劣，部队领导力量越要集中，越要健全。因此，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才能发动较大范围的群众，成立几个县连在一起的政权。湘赣边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而分散兵力，单独行动，在实践上，几乎没有一次不遭受失败。当然，红军在井冈山时期也有过近距离或远距离的分兵；但是，只有在好的环境中才能分兵，而且，红军的分兵也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扩大和巩固根据地。这里要考虑到两种不同状况：即在反动政权的破裂时期和暂时稳定时期。如果在反动政权的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就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区，也可以比较地扩大，当然这是有阵地的前进。但如果在反动政权的暂时稳定时期，就必须逐步地推进，根据地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第二，在地方工作方面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基础。即在根据地内建设工农民主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发展共产党。这就是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革命思想。

毛泽东根据上述基本原则，规定了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方针。

（一）建立各级工农兵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工农兵政府是由群众大会选举出来的。而有些地方成立了代表大会，选举总揽大权的执行委员会。在工农兵民主政权初

建时，毛泽东指出，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代表大会制。

(二)揭起了土地革命的大旗。最初是没收一切土地，彻底重新分配。这个政策后来被纠正了，只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土地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土地斗争中必须争取中间阶级，因为争取不到中间阶级，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延宕分田时间和隐瞒土地实数，白色恐怖一来，他们就会反叛。毛泽东十分重视争取中间阶级，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政策。

(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红军成分是工人、农民、游民无产者，又以敌军俘虏为最多。因此，必须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建立党代表制度，支部设在连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在红军中实行民主制度，废除打骂，官兵待遇平等。红军帮助地方建立武装，用以镇压反革命和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就帮助红军作战。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释放俘虏，医治伤兵。

(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边界各县的党是在农村战争环境中建立的，极大多数是农民党员。当时党内机会主义现象(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仍然到处发现，因此，党内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思想建设是共产党建设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是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并用根据地去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引导革命首先从农村发展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从一块根据地发展到多块和大块根据地，即以武装的革命的农村去包围并最后夺取反革命所占据的城市，这是毛泽东所发现的中国

革命的发展规律之一，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力量被强大敌人击败而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条件下，革命的发展规律。而井冈山就是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呢？因为：（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界江西、湖南，革命的发展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斗争经验丰富的地方武装。（三）井冈山上有不少村落，出产各种杂粮，四围接连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款、筹粮。（四）井冈山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山洪激流小道，通向山里，因此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了。从退却来说，选择了易于积蓄革命力量的农村作为退却的中心阵地，这个退却是全党最有计划、最有秩序、损失最少的退却，不但保存了参加这次退却的革命力量，而且掩护了全国革命力量的退却。从进攻来说，这个进攻是在革命暂时失败的形势下，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正确地转移到反革命力量较薄弱、阶级矛盾较多、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因此，这个进攻是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要害的进攻。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前进的道路上，它是1927年革命失败后，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火”的唯一道路。

四 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并分析当

时的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从而规定党的革命任务和策略方针。

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真正的统一没有完成;第二,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被废除,封建势力没有被肃清;第三,国家政权仍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规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十大纲领。^①

大会指出了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当时工农受着极严重的打击,工农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在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的游击战争还只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同时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不可避免地将要来到。因为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的继续向前发展,就必然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因素。

据此,大会就确定党在当时的策略路线不是在城市中实行进攻和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六次代表大会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会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自愿地断送了革命的领导权。但是,陈独秀坚持他

①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十大要求”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不肯接受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精神，拒绝接受中共中央警告，坚持取消主义立场，他也拒绝了中央多次催促他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邀请。此外，他还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反党的小组织。因此，党就在1929年11月把陈独秀开除出党。

大会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认为盲动主义者在敌人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的大城市所举行的武装暴动，都是强迫命令的军事冒险。命令主义和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而争取群众，乃是党在当时的重要任务，因此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

这些就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面，也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同时大会也有它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于党在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需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个关键问题，还没有必要的认识。因此，这次大会以后，党的中央机关仍然留在城市，党的工作仍然以城市为主而不以乡村为主。

第二，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①。大会没有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政权下的地位及其两面性，因此就没有预见到这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有变化的可能。大会又简单地认为“国民党的各派”“都是反革命的派别”^②，而没有把他们区别开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孤立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1928年7月9日。

② 同上。

少数最反动的敌人，以便各个击破。

第三，这次大会对于第一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仅限于指出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否定了某些显著的错误事实，并没有对于错误路线进行思想批判，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错误路线的实质和思想根源。

由于大会的这些缺点以及大会以后党的领导工作仍然掌握在“左”倾领导者手中，就妨碍了“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的“左”倾领导者发展成为更完备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没有出席党的六大。在六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六大以后，毛泽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没有解决和没有正确解决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

当革命力量在城市中为强大的敌人击败以后，向农村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乃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呢？这个问题是全党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样重要的问题，当时在党内，并没有提出圆满的解答。

当时，党内某些同志对客观形势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因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种，看小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大了反革命力量，因而产生悲观主义情绪。其中有些同志以为距离革命高潮很远，因而沉溺于单纯游击战争，忽视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还

有一些同志一遇到打败仗或被敌人四面包围时，就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卓越地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政治任务。

红色政权、红军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长期占据中心城市，革命不可能很快地在城市中取得胜利。为了避免过早地同敌人进行决战，工人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和农民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在农村里建立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革命战略基地，借以抵抗敌人的进攻和发展革命力量。

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农村革命的发展，使落后的农村变为革命的农村。红军以革命的农村为基础阵地，从四面八方把盘踞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的敌人包围起来，不断地进行出击，给反革命以极大的困难。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证明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希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建立农村根据地，把革命引向全国胜利，这个复兴中国革命的路线，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毛泽东科学地说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落后的封建经济同时并存，若干现代化工业城市和广大的中世纪的落后农村同时并存。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它的落后性和不平衡性，而这种落后性和不平衡性因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

而加剧了。这样就规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既然中国经济是落后的、不统一的,那末中国农村对于城市就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农村就可以保持自给自足,因而革命就可以在农村长期存在。既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在很多偏僻的地区还没有形成直接支配的经济力量,而只有间接支配的经济力量,或是它的经济力量还没有达到,那末中国革命就可能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区中首先获得胜利。

第二,并不是在任何农村都可以建立红色政权。红色政权首先可能在受过革命影响的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区,工农群众受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对地主阶级作过剧烈的斗争,建立过工会和农会组织。就是说,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红色政权就首先有在这些地区建立和发展的可能。而在这些省份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江西的情况,认为第一,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而江西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些;第二,江西向来都是由外省军队驻防,他们不熟悉当地情况,对于本省的问题就不那末关切;第三,江西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较远一点。因此,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普遍些。

第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决定于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国民党叛变后,引起革命的一切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军阀和士兵群众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有区别,同时又有联系。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争夺中国,必然扩大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加深帝国主义间

的矛盾，由此就形成了不断的军阀战争。军阀战争又引起其他一切矛盾的深刻化。国民党军阀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就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发生和发展起来。

第四，一定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创造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必要条件。有了正式红军，就可能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进攻，坚持游击战争，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红军又可以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

第五，共产党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的条件。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着重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即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决议，根据党在红军中思想斗争的经验，分析了红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根源，并规定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从而规定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共产党的基本原则。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因为党内错误思想是党内错误的政治路线的认识根源。用主观主义来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其结果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左”倾盲动主义。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针，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政治形势和处理问题，就是注意社会、政治、经济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党在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同时，还在政治上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那种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看不见革命前途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反对那种不愿意做细小的、艰苦的日常工作，犯革命急性病的盲动主义。党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即反对不正当地限制党内民主，但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党的集中，“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因此，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非组织观点，反对各种个人主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存在，就可以充分利用各派反革命之间互相斗争的空隙，而使革命力量能够存在；就可以使革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首先胜利，使革命在农村长期存在。

毛泽东对于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作了正确的分析，因而就得到了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把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卓越地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论证了中国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革命可以首先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取得胜利，并走向全国胜利。这个新的结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结论。这个新的结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五 红色地区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政策

秋收起义后，起义的武装部队，凡是实行了正确的领导，实行了和毛泽东相同的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方针的地方，革命武装就得到了发展。秋收起义后，经过三年的战斗，到1930年初，已经在许多地区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中国工农红军。

(一)中央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奠定了湘赣根据地的基础。1928年11月，红军第五军的一部分到了井冈山，同红军第四军会合，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困封锁政策，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进入赣南，开辟了赣南根据地。1929年2月到12月，红军第四军三度入闽，和闽西地方党相结合，开辟了闽西根据地。1930年3月，成立了闽西和赣南工农兵政府，6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8月，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会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二)湘鄂赣根据地：1928年7月平江起义后，成立红军第五军，在湖南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萍乡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1930年2月后，红军到鄂东南开展游击战争，攻克崇阳、通城、咸宁、阳新、大冶等县，并扩大部队，组成了红军第三军团。

(三)鄂豫皖根据地：1927年10月在黄安、麻城一带的人民武装举行秋收起义，1928年初蒋桂战争爆发后，他们又举行了第二次起义，以大别山为根据地。1929年3月，商城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建立鄂豫皖的豫东南中心根据地。接着六安农民举行起义，建立皖西北中心根据地。黄安、麻城、商城、六安这三个地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区，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黄冈、商城、六安、霍丘、霍山、固始、英山等县。1930年2月，成立鄂豫皖特区。1931年，红军改编为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四)洪湖湘鄂西根据地：1927年底至1930年初，红军在湖北南部长江北岸洪湖地区的公安、潜江、沔阳、监利、枝江等县进

行游击战争，成立了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第六军。秋收起义后，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大庸和湖北西南部的恩施、鹤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第二军。1930年，第二军和第六军在公安会合，组成了红军第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五）闽浙赣根据地：1927年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在弋阳、横峰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底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至1929年革命根据地由贵溪、万年、余江、上饶、德兴、玉山等地发展。1928年，闽北农民受了赣东北农民运动的影响，举行起义。1929年冬，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后，形成了闽浙皖赣的领导中心。蒋、冯、阎战争爆发后，1930年5月，红军到景德镇、乐平、赤化、浮梁、婺源三角地带进行游击战争。1930年，成立了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第十军。

（六）广西右江左江根据地：1929年10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党在右江领导农民军和革命士兵举行起义，占领右江果德、田东、田阳、百色、东兰、凤山等县，12月，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第七军。1930年2月，党在左江龙州领导一部分革命士兵起义，成立了红军第八军，并成立包括龙州、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的工农民主政府。左江革命政权不久失败，第七军和农民军在右江坚持斗争。1930年，红军主力由右江北上，转战于湖南、江西，同中央红军会合。

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30年初，武装起义地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包括：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等省，全国红军发展到六万人，稍后发展到十万人。

中国共产党在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

绩的，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全国各地的红色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得到相当的恢复。但是，当时党内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革命力量向前发展的形势之下，特别是在1930年5月蒋、阎、冯战争爆发后的有利于革命的国内形势刺激之下，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发展起来。1930年6月，“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的领导机关。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何在呢？

第一，他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在全国到处一样，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同样地尖锐化，没有什么区别。认为由中心城市的起义，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就能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因而布置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起义计划。他们低估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因而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在长时期中用主要力量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思想。

第二，他们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错误地认为革命力量的初步发展和当时的军阀战争，就已经造成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只要党一号召起义，群众就起来响应。认为当时群众只应举行起义，不要经济罢工，只应大干，不要小干。所以，他们错误地主张加紧工人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罢工，使每次经济斗争都发展为政治斗争，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加紧军事训练，以便在全国举行武装起义。

第三，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必须在

世界革命总爆发下，才能成功。

第四，他们忽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因而对中间阶级规定了“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主张把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银行当做“反革命的武器”加以没收。

1930年6月，“左”倾领导者规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取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攻取桂林、柳州、广州。随后又把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李立三拒绝许多同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们主张的同志，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但是李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很短（从1930年6月至9月），凡是实行李立三路线的地方，党和革命力量都遭到损失，广大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个错误路线。特别是毛泽东，他以极大的忍耐，纠正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当时有利的国内形势得到了发展，并在1930年底至1931年初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攻。

1930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及其后的中央，纠正了李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这些都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的特征，所以三中全会对于李立三路线的

停止执行是有积极作用的。李立三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离开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但是，由于三中全会和中央并没有清算和纠正李立三路线的实质，因而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依然存在。

红色政权所在地和红军所到的地方，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斗争。

只有在农村中燃烧起阶级斗争的火焰，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带动广大的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使革命得到更大的发展。

要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制定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唯一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雇农一般没有土地和工具，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雇农群众是农村无产阶级，土地革命中的先锋队。贫农占有很少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一般要租入土地和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受人剥削。贫农群众是土地革命中的坚决拥护者，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因而依靠贫农、雇农是进行土地斗争的中心政策。

中农一般都占有土地，也有相当的工具，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中农受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一般有土地要求。因此，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的重要政策。因为联合中农，就可以更好地去对付地主的反抗；同时，中农是土地革命后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党的政策，必须获得中农的赞助和拥护，必须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反对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和行为。

富农占有土地，一般都有充足的生产工具，自己参加劳动，但以剥削雇佣劳动、放高利贷和收地租为主要的的生活来源。富农是半封建的剥削者。但是，富农的生产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有用的。富农可能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反封建的斗争，也可能中立。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反对消灭富农经济的倾向，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给富农以经济上的出路。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地主阶级是封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它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阶级。他们坚决反对革命，所以，对地主阶级采取消灭政策，但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

对中小工商业者所采取的保护政策，乃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政策，这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活跃革命根据地内部的经济上，是必要的。

这个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事实证明，凡是正确地执行这个路线的地区，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推翻了封建势力，进行了胜利的土地斗争。

1928年至1931年时期，即井冈山时期和中央区创立时期，党的土地政策，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根据群众的革命实践和创造，而总结出来的。

第一，红色区域在土地斗争中的分田方法。首先由基层民主政府调查土地，知道共有若干田亩，若干人口，得出每人应得田数，然后，召集民众大会讨论和通过。

分田的正当办法是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是红色区域土地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关于没收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两个土地法，即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和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共土地。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兴国县后，土地法内容，在这一点上，有了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土地”。

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两个土地法都规定了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即把土地的地主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不是农民所有。和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就是禁止土地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些规定，到1930年也有了变更，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而农民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土地。

第三，争取中小工商业者。1929年1月，红军总司令部布告中规定“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规定“苛捐杂税，扫除干净”。党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土地斗争中，贫农雇农都得到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

首先人数最多的贫农雇农都分了田，也分了山，这是根本的经济上的利益。革命以前的债务一概不还。最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利益，即贫农雇农取得了政权。

中农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中农是需要的；平分的结果，中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土地，多数中农在分田时得到了土地。同时，中农还得到政治上的利益，中农和贫农、雇农参加了政权，中农在乡区两级政府中担任工作的约占40%。

革命后所成立的工农民主政府的基层——乡政府的骨干都是贫农和雇农，政府是以贫农雇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政府。

革命根据地经常处在敌人围攻的状态中，因此，每个乡村都

实行军事组织。每乡男女年龄由八岁至五十岁的加入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它的任务是站岗放哨、守卫家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的队员和团员都受到必要的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

这些民众军事组织，又是红军的基本来源。有了这些组织，红军就得到了补充和扩大的基础。

六 红军建设和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革命根据地是经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土地革命的发展，必须武装斗争取得胜利才有可能。要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首先就要建立一支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必须在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下进行作战。毛泽东系统地、完整地规定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红军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其他军事原则，就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

第一，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红军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这是建军的根本思想。

从这个根本思想出发，必须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在红军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把红军放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使它能够坚决执行党的纲领、政策。同时，在红军中建立和加强政治工作制度，以党的纲领、政策来教育红军，克服红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量。

从这个根本思想出发，革命战争必须依靠农民，建立以农民

为主体的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因此，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单纯打仗，它除了打仗之外，还要担负起向群众宣传，以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和建设党等任务。此外，红军还要担任筹款的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是红军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红军还必须建立正确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必须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

毛泽东建军的根本思想，以及由此得出的一整套建军原则，就使红军成为区别于任何军队的革命军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二，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经过了一次大革命；（二）敌人强大；（三）红军弱小；（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说明红军有可能发展和战胜敌人，也说明红军不能很快发展和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如果弄不好，还可能失败。因而，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规定了人民战争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的战争形式，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上以多胜少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在敌强我弱和敌大我小，敌之脱离群众和我之联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充分发挥红军的优点，才能求得红军的生存、胜利和发展。因此，红军必须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

人。

红军战争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战争形式。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理解。“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①尽可能地大量地发展游击战争，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力量的成长把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战争逐渐向正规战争发展，但当时的红军战争还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敌我形势上，我处于劣势，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因此，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方针，逐渐改变不利于我的形势。而在战役战斗上的原则，和这相反，不是持久战，而是速决战。由于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敌人有很多支军队，打一股敌人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战斗，那末，别股敌人就会来增援，打破一次围攻还要准备连续作战，等等。因此，在战役战斗上，不能不实行速决战，旷日持久，对红军是不利的。

在战略上，必须采取以少胜多的方针，而在战役战术上，必须采取以多胜少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使我军在每一次战役中，占绝对的优势，才能获得胜利，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获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毛泽东发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并从这个特点出发，充分估计到战争中主观指导的作用，而规定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这个战略战术思想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井冈山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

时期，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著名原则。前者是小游击队小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所必须采取的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能打开又要能收拢的作战原则。后者包含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含了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这是红军适应当时战争环境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到红军由小游击队发展到大游击兵团，根据地扩大和巩固起来时，到江西中央区反围攻战争时，就又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基本原则。

第一，诱敌深入即战略退却，这是劣势军队对优势军队，为了准备反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所必须采取的有计划的战斗步骤。为了反攻，必须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一）选择群众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二）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三）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准备这些条件，以便转入反攻。

第二，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进退攻守的形势，使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敌军在战役上处于劣势，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的敌军在战役上处于被动地位。当然，也不是把一切兵力都集中起来，因为集中兵力之目的是要保证红军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的优势；在箝制方面和次要作战方面，也是必须使用一定兵力的。

第三，红军战争的特点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这是因为红色地区领土很小，军队的数量和技术同敌人差得很多，而且每一个根据地只有一支红军。所以，阵地战对于红军基本上是无用的。但同时也不否认阵地战，战略防御时固守箝制方面的某些

支点，战略进攻时打击孤立无援的敌军，也是必要和可能的。

第四，在战役的战斗问题上，红军必须执行速决战，一个战斗在几小时内或一两天之内就要解决。在“围城打援”时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相当持久的，但是，围城打援的方针，不在于打围敌，而在于打援敌。对援敌依然是速决战。

第五，红军一切几乎取自敌军，作战的方针是打歼灭战，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歼灭敌人来补充自己。

这些是红军军事原则的发展，内容大为丰富，形式也有许多改变，但是基本上依然是那个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在红军四次反围攻战争的胜利中完全证实是唯一适合于当时红军战争的指导原则。

1930年冬季，红军已经建立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对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发展，感到极度恐慌，在蒋、阎、冯大战结束后，即结集了十万兵力进攻我中央根据地。这就是第一次围攻。

敌军十万人，以鲁涤平为总司令，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一线，由北向南移动。当时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宁都的黄陂、小布地区。

敌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其中张辉瓒、谭道源部是围攻的主力军。张辉瓒师在龙冈，谭道源师在源头，接近于红军的集中地点。红军在龙冈方面集中了最大兵力，因为龙冈的群众条件好，又有优良阵地。

1930年12月27日战役开始。红军集中全力向敌军奇袭，把张师全部歼灭了，接着又追击谭师。1931年1月1日战役结束。消灭了敌人一个半师，张辉瓒被俘。

1931年4月，蒋介石又调集兵力二十万人，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从吉安到建宁，筑成一道八百里战线，向中央区进击。

敌军全部也都不是蒋的嫡系部队。红军三万人。红军决定先打围攻军队的弱点——王金钰部队。等王金钰离开富田地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931年5月16日战役开始。当王金钰部队由富田向东固前进时，红军猛力攻击。胜利后由富田打过去，一直打到江西福建边境的建宁泰宁地区。战斗到5月30日结束，历时15天，红军走路七百里，打仗五次，横扫八百里战线，歼敌三万多人。

第二次围攻就又这样地被打破了。

1931年7月，蒋介石任总司令，率领三十万兵力，举行第三次围攻。

蒋介石分兵三路，深入中央区，中路何应钦，右路陈铭枢，左路朱绍良。其中主力军是蒋的嫡系部队，共十万人，其次是陈铭枢部队。其余非蒋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

敌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它。红军苦战后，没有休整和补充，又从建宁绕道返回江西兴国集中。红军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

红军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疲困敌人。8月初，红军从兴国通过了敌军主力的空隙地带，转到莲塘，三战三捷，敌军死伤三万多人。

那时，所有向西向南的敌军主力都转旗向东对红军采取大包围形势，红军又越过了它们的空隙地带，到兴国境内结集休息，而敌军早已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只有退却了。红军又乘敌

退却时，猛烈追击。

经过三次反围攻战争的胜利，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发动的几十万近代化军队的进攻，红色政权站稳脚跟，并且扩大和巩固了。

毛泽东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根本思想，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在农村中建立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必须纠正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全国性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主张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也即组织群众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这种错误主要是没有看到当时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所争夺的半殖民地。

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主要因素。他说：“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①

由1927年10月到1931年，红色政权屹然存在，而且日益扩大和巩固，成为革命高潮的大动力，它已经是由“星星之火”发展起来的“燎原之火”。

三次反围攻战争的胜利，促进中国革命走向高潮。

^①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纠正党内 “左”倾路线

(1931年9月至1935年12月)

一 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

1929年末，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破坏作用空前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个危机日益加深地延续了三年多，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生产的危机和商业、金融的危机，错综地相结合，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化。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工业到1932年底降为1929年的53.8%，英国降为83.8%，德国59.8%，法国69.1%。

这次危机和以前一切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最久最深刻的危机。从前的危机，以一两年为限，而这次危机一直到1932年底，才达到转换点。它把资本主义多年积累起来的民脂民膏，化为乌有，它是所有危机中最沉重的一次。

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有前所未有的拖延性质，因为：第一，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经济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世界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日益强盛起来。第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爆发

了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开始转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和发展了本国资本主义,它在市场上和资本主义国家相竞争,使殖民地市场问题更加尖锐化。第三,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的生产设备经常地开工不足,并存在着大量失业常备军。战前,在周期性的工业高涨年代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是可能达到充分开工和缩减失业现象的;但在战后,即使在经济活跃的年代,企业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全部利用,失业常备军日益增长。

此外,还有使经济危机更深刻和更持久的其他原因是:这次危机遍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严重地打击了占全世界生产和消费一半以上的美国,结果使各国彼此难于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这次危机和一切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互相错综,不能不使危机更复杂和深入。工业中的垄断组织竭力保持商品的垄断价格,使在垄断组织以外的生产者大量破产,使广大消费者感到特别痛苦,因而大大阻碍了存货的销售。

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周期性的 重要变化。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不能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了。

在这个时期内,苏联工业,是在按照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1931年,苏联工业和战前1913年水平比较起来,就已增加到314.7%。1931年苏联工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为66.7%(1913年为42.1%),苏联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55.4%。

苏联农业集体化获得了重大的胜利。1930年，集体化农户在全国农户中占23.6%，1931年占52.7%，而1929年却只有3.9%。1930年至1931年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胜利的年代。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间、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间、工人和资本家间、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两方面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建立最反动的法西斯专政来镇压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掀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侵略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危机给它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日本统治阶级就把对外战争看作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它撕毁了九国公约，要从中国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撵出去，使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

斯大林又指出，无产阶级的出路必须在革命中去寻找。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时候，就是把民族革命战争当作自己的出路。

二 全国抗日反蒋高潮

当欧洲各国和美国由于经济危机而忙于内部事务的时候，蒋介石政府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并依靠英美的帮助去进行反革命内战。1930年到1931年，中国发生了蒋介石、张学良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和石友三对张学良的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东北军的主力都调到关内，中国东北地区国防力量空虚。在强大的日本军队的威胁下，辽宁省留下五、六个旅，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剩

下五个旅。而这些军队大多数是装备低劣，平时又没有对外作战的准备和训练。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攻取军力薄弱和市场广大的中国。日本首先用武力占领中国的东北，作为它殖民地化中国的基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境内的军队，袭击沈阳，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驻沈阳和东北各地的军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撤退到山海关以南，使日本帝国主义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全境。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军队在上海举行了新的进攻，企图夺取上海，作为它殖民地化中国的另一个基地。上海军民起来，和日本军队英勇作战，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蒋介石破坏了上海的抗战，在上海作战的十九路军被迫撤退，蒋介石5月5日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上海停战协定，承认中国方面不得在上海驻兵，并取缔全国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惊醒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唤起了民族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卷入抗日反蒋热潮之中。

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下，组织了抗日义勇军，进行英勇的斗争。

1931年10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派出代表，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并组织了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枪械对日作战。北京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义勇队、宣传队。其他各城市工人，都先后起来，积极进行抗日工作。

1931年9月28日，南京学生捣毁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并殴打了外交部长。1931年底，京、津、沪、汉、粤等地学生代表团到

南京请愿示威，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外交部。上海学生捣毁了国民党市党部，并组织民众法庭审判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全国各地学生群众捣毁了许多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以及城市工商业者实行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上海抗战时，上海商会和银钱公会举行罢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申报》等报纸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变态度，恢复中苏邦交，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开放党禁，一致对外。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行动，使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

1931年10月初，当日本军队占领辽宁、吉林并乘势进攻黑龙江的时候，马占山^①部队奋起抗战，阻止了日本企图迅速占领东北计划。

蒋介石派到江西去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万多人，1931年12月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抗日的号召，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这个部队，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协助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顽强地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粉碎了日本军阀企图在几个小时内占领上海的计划。

① 马占山：东北抗日将领。九一八事变前后，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1931年10月，领导了著名的“江桥抗战”（黑龙江嫩江大桥），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和支援。1932年2月，在敌人威逼利诱下，一度投降日军，4月，宣布反正，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后退出东北。

1931年9月,由于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爆发了宁粤分裂,1931年12月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

在日本的恫吓下,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迁都洛阳。

南京卖国政府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动摇中。

在红色区域,1931年8月,江西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围攻,鄂豫皖的红军在反围攻中击溃了国民党军队,扩大了根据地。红军恢复了洪湖根据地。在陕西和甘肃边境出现了红色游击队伍。

1931年11月7日,红色区域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

1932年4月1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并号召和领导工农红军和广大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破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日倾向,由于工农红军第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和中国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及其对日宣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改变了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状况,中国人民的抗日反蒋运动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全国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当时革命形势还有严重的弱点,就是敌强我弱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反革命力量还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但是,人民群众不愿照旧被统治,蒋介石集团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许多在野派和反蒋派同意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

治或表示中立。这个政治形势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革命。

新的革命形势很快地到来。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反蒋、组织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口号被提出了。在当时，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如果有正确的策略，即正确地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联合抗日反蒋各派，推动十九路军，同时领导工农红军采取配合行动，这就可能使蒋介石不能重新登台，并组织起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领导全国革命力量对日作战。

三 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有利革命形势的丧失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停止了李立三路线以后，党内一部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领导下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他们不是帮助中共中央去清算和纠正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思想以及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而是把李立三路线说成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指责了当时中共中央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所以，陈绍禹等的批评李立三路线和反对中共中央的特征是反右倾而不是反“左”倾。当时，陈绍禹曾发表了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李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

他们不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在革命任务上把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封建势

力的斗争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相提并论，认为在民主革命中，只有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在重分土地时富农只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质量较坏的耕地。主张剥夺富农和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工农民主政权中他们没有民主权利。

他们不加分析地搬用别国共产党关于中间阶级的公式，否认中国有中间阶级的存在，说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营垒的一部分，“第三派”、“中间营垒”不可能存在。说在当时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进步的作用，所以，中国革命力量只是工人阶级、雇农、贫农、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下层。

他们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在全国革命高潮条件下，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可能，而这个胜利是以占领一个或几个主要经济政治中心城市开始的，因此，必须准备全国各地或主要城市的同盟罢工、游行示威。他们强调两个政权的决战，因而主张当时党的策略路线是进攻的。

他们诬蔑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当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所谓右倾。他们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和改组中央政治局。并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条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

1931年1月，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威胁下，召开了党的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共中央取得领导地位，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时期。

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次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领导机关，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李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和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四中全会以后不久，1931年5月9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这时，中国连续发生了重大事件：江西中央根据地红军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三两次围攻的胜利，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陷入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左”倾领导者采取关门主义政策，而反对统一战线政策。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没有看到更没有利用革命形势。他们不采取抗日反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这样，就不能广泛地组织群众，不能有效地集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来进行广大的抗日反蒋的斗争。这样，也就没有能够在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形势下，将革命推向前进，反而由于错误的领导使革命遭受新的挫折。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开始降低，造成了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可能。但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却强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强调国民党各派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认为日本在东北

的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认为当时形势不是使国民党各派更加分崩离析，而是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革命。

由于强调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一致，一方面，忽视日本首先侵略中国东北进而侵略整个中国的危险，忽视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这样就使党脱离了当时的广大反日运动。另一方面，忽视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忽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这样就使我们不能利用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分裂，使当时的形势有助于反日的斗争。

由于强调国内统治阶级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强调国民党各派的团结，把一切统治人物等量齐观，忽视当时各种统治人物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化，抹煞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抹煞了在野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在朝的买办豪绅阶级的矛盾，抹煞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采取灵活的政策；根据他们的利害关系，利用他们的矛盾，孤立和打击最强大最凶恶的敌人，来扩大革命的力量。

这种思想和行动，也只能使掌握统治权的蒋介石反动派和买办豪绅阶级得到好处。

第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又过大估计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因而片面强调两个政权的对立，强调阶级的决战，认为当时中国只有两种政权：或者是国民党政权或者是红色政权，而否认第三种政权的可能，即两个政权的对立之外，还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同南京政权相对立的政权。

因此“左”倾路线的指导者拒绝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国防政府不是南京的卖国政权，也不是红色政权，而是各党派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当时，广大群众甚至于有的在野派，都反对

南京卖国政权，要求建立抗日民主的政权。

由这个错误必然地产生另一个错误。就是占领一两个主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湘鄂赣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在第三次反围攻战争以后，“左”倾领导者反对胜利后的休整，命令红军继续追击敌人，要“取得一两个中心或次要的城市”。由于他们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所以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并把它当作党的中心任务去完成。

“左”倾领导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也是为了拥护和配合红军在湘鄂赣方面的进攻。

四 “左”倾冒险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蒋介石下野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汪精卫集团，重新上台了。1932年1月蒋介石汪精卫上台后，立即镇压全国抗日运动和破坏上海抗战。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一方面重新发动对鄂豫皖区的围攻，另一方面，继CC团之后，成立复兴社^①，这两个法西斯组织，用最阴险和最残暴的手段，破坏共产党，压迫人民爱国运动，瓦解国民党内反蒋派。蒋介石又在反共口号下，召开所谓国难会议，组织反革命统一战线，来维持他的反动政权。

① CC团，全名“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由陈果夫发起组织成立于上海，专事反共活动。

复兴社，全称为“中华复兴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效法德意法西斯组织而建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1932年3月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为社长。4月，成立其内层组织“力行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解散CC和复兴社，1938年8月，成立以复兴社为核心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压迫人民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侵略。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1933年1月，日本军队侵入山海关，接着向热河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3月中，日本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当时国民党驻防北平、天津一带兵力，超过敌人兵力十倍。但是，蒋介石制止中国军队进行抵抗。日本军队占领长城各口后即向前进攻，包围北平、天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

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行为，促使中国统治营垒继续分裂。

日本占领长城各口和滦东后，又指使伪军进攻察哈尔，侵占察哈尔东部多伦等县。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收复了察哈尔北部。蒋介石军队和日本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抗日同盟军，逼迫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并围攻吉鸿昌所率领的向河北省东部进发的抗日军队。在日本和蒋介石的夹击下，这一支抗日部队在十月间就失败了。

被调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由于逐渐觉悟到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1933年11月，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和蒋介石政府破裂，并和红军订立抗日反蒋的协定。

福建事变爆发的时候也正是红色区域第五次反围攻战争的

时候。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对红军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十九路军抗日反蒋，是正确的。但是“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在军事上却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他们没有在东线突击蒋介石部队，来帮助十九路军，并粉碎蒋介石对中央区的第五次围攻。

从1931年9月，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成立起，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止，这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继续发展的时期。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在这之前，“左”倾路线的指导者不顾由他们所造成中国革命运动以及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当时存在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把认为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和北方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观点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宣称全国各大城市罢工浪潮正在高涨之中，在北方可以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他们盲目地判断当时的革命斗争是两条道路——即红色政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认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夺取中心城市是最迫切的任务。他们就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支配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冒险主义的行动。

当时，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策略方针是：第一，把党的公开组织转变为秘密组织，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合法手段。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在形式和方法上，必须严格地加以分开，而在内容上和政治上，必须密切地加以结合，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群众工作中隐蔽起来。第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群众斗争主要是为了积聚革命力量和提高群众觉悟程度，

因此，必须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和斗争方式去发动和提高群众的斗争，以便准备将来的进攻和决斗。第三，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指导者反对刘少奇这些策略方针。

他们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拒绝可以同共产党合作的中间派别。由于他们的这种冒险政策，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另一方面，他们宣称当时党内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诬蔑中央区的正确路线是所谓富农路线。迁入江西根据地以后，他们就改变了中央区的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在红色区域里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土地政策。土地法规定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后，不得分配土地。富农的土地没收后，只分较坏的耕地；富农分得土地后，多余的农具牲畜也须没收。宪法大纲上规定富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对于红色政权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阶层，采取了过左的劳动政策、经济政策和政权政策，即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一切斗争的政策。他们否认根据地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不平衡，否认党在不同地区应当采取不同政策。他们宣布以共产主义为工农民主政府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还有，他们执行了过左的肃清反革命政策，等等。于是他们的错误路线在中央区和邻区得到进一步贯彻执

行。

对于福建事变，“左”倾路线也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

他们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不同派别，一律当作没有差别的反革命派。把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福建人民政府当作“玩弄新的把戏”，否定蒋介石南京政府和福建人民政府间的区别。他们不肯积极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忙于批评人民政府的不彻底，指责人民政府的纲领不同于红色政权的政纲，号召福建人民群众单独行动，“促进第三条路线找寻者的破产”。

因此，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优势进攻下，在它内部分裂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政策下，1934年就失败了。

虽然“左”倾路线改变了中央区的党的正确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在错误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以前，第四次反围斗争仍然得到了胜利。

第三次反围攻胜利之后，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了肃清反革命据点的工作，巩固了革命的后方。

这个时期，蒋介石对中央区采取守势，集中兵力向鄂豫皖区和洪湖区进攻。1932年1月，敌人进攻鄂豫皖区，第四方面军在潢川突破了敌人的战线，击败了它的增援部队，把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的商城、固始、新集和安徽的金家寨、岳西等地区。因为鄂豫皖区控制长江，围困武汉，威胁京汉铁路，它有重要的战略意义。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区的第四次围攻，麻城七里坪一战，红军击败了敌军主力。但在胜利之后，第四方面军领导者认为国民党军队都是“偏师”，没有继续进行反围攻的准备，结果在敌军进攻时就正面硬拚，以致伤亡很大，不得不在1932年10

月退出鄂豫皖区,经河南、陕西转移到四川北部。

1932年秋,贺龙所率领的红军第二军团自洪湖地区北上,前锋抵汉阳附近,和第四方面军相呼应,进迫武汉。第四方面军西进后,第二军团也退出洪湖地区,转移到湘鄂川黔边界,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932年夏,蒋介石以五十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区的第四次围攻。

这次围攻从1932年6月12日到1933年2月,前后八个月。敌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由北向南,齐头并进,直奔金溪。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围歼战的作战方针。浒湾(金溪西)一仗歼敌一个师。敌军重新部署,分三路向南丰、广昌前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个师暴露于红军面前。红军转移阵地隐蔽集结,先打西路敌军于宜黄南部黄陂,歼敌两个师。敌军大举增援,红军又在宜黄南东陂、草台冈附近的霹雳山、雷公嶂地区,展开了围歼战,歼敌一个师。经过这两次战役后,第四次围攻就被红军粉碎了。

第四次反围攻胜利后,中央区开展扩大红军运动。这时,第一方面军连地方武装在内,约有十万人。根据地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人口约计三百万人。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总结报告。

从1933年夏季起,蒋介石就积极部署第五次围攻战争。一方面,实行新的军事策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区域的周围,到处建筑碉堡。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这时,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经济

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分析了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指出为了保障红军战争的物质供给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必须进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一，红色区域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农业，而调剂劳动力和耕牛问题，是发展农业的关键。

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青年成年男子上了前线，因此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尤其组织妇女劳动力，有特殊的意义。中央区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这种互助社，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原则，以村或乡为单位，组织起来，妇女也成群地加入生产战线。

互助社除了社员互助之外，还优待红军家属和帮助孤老。

中央区又组织了犁牛合作社，集股买牛，共同使用，解决了农民没有或缺少畜力的问题。

有了这种互助组织，到1934年，有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量，不但恢复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保证了红军战争的粮食供应。

在发展工业上（纸、烟、钨砂、樟脑、农具、肥料以及布、药、糖、硝、盐等）是通过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三方面进行的。发展工业为着自给和出口，都是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

中央区每年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去交换必需品。又向外输出钨砂。另一方面，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六百万块钱的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发行公债,实行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其任务就是要使出口的产品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国民党区买得盐、布进来。

毛泽东指出红色区域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首先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 and 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对于私人经济,在法律范围之内,加以奖励和帮助,并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第二,工农民主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它必须大力解决群众的问题,改善群众的生活。

在红色区域里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地方,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因而得到了提高。被表彰为模范乡的江西兴国长冈乡和福建上杭才溪乡,人民生活都改善了。革命前才溪乡贫农、雇农每年只吃三个月的米饭,其余九个月都吃杂粮,并且都是吃不饱的。1934年就不同了,六个月吃米饭,六个月吃杂粮,也吃饱了。长冈乡贫农吃肉的增加一倍,工人吃肉的增加二倍。农民买布比以前多了一倍,食油也有了剩余。

长冈乡青年成年男子出外当红军和做工作的占80%,上才溪乡占88%,下才溪乡占70%。

这个成就是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不可分的。群众从他们切身问题上认识到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群众都响应政府的号召,把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生命。

五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蒋介石第四次围攻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了另一次围攻的准备。蒋介石发觉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对红色区域无能为力,于是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施行法西斯

主义训练,研究堡垒战、山地战的战法;并设立地方保安队,加强法西斯反动统治;向外国借款,对红色区域厉行经济封锁。蒋介石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方面进行对革命根据地的总围攻。

蒋介石企图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缩小革命根据地,最后找寻红军主力作战,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为了配合对红色区域的军事围攻,蒋介石对国民党地区的革命文化施行旷古未有的压迫。

国民党的所谓文化主持者是什么反动透顶的“政府委员”和“侦缉队长”等类人物。它的所谓文艺家早已堕落到连“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都写不出来,所以它只有用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抵制革命文化,只有用流氓、侦探和刽子手来和革命作家对立。

国民党禁止一切进步书刊的出版,查封出版或代售进步书刊的书店,提倡读经尊孔,求神拜佛,鼓吹法西斯主义。对革命者的压迫和屠杀,更是历史上罕见的暴政。由国民党叛变革命到1935年,青年被杀戮的就有三十万之多,而失踪和被监禁者更不可胜计。

国民党屠夫们企图用残酷的白色恐怖来“剿灭”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不但证明他们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集团,同时也证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是不可摧毁的力量。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一切准备完毕后,结集了一百万军队举行第五次围攻,并以五十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区。这一次战争前,中央区开展了扩大红军运动,扩军成为一种潮流,工农积极上前线。中央区的经济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红军

的供给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多次的反围攻中都得到了胜利。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战争。国民党地区的人民抗日反蒋运动开始走向高涨，并爆发了福建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及其他大城市成立了以宋庆龄、马相伯为首包括各阶层著名人士发起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并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一切造成了粉碎第五次围攻的有利条件，红军在中央区打破国民党的围攻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指导者不去利用这些条件，特别是由于他们机械抄袭外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而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红军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他们反对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提出红军必须固守阵地，不让敌人占领红色地区一寸土地的口号等等。

敌人为了隔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进攻黎川。红军由福建回师，在洵口和敌军作战，消灭敌军一个师。红军战争十分重视初战，初战必须胜利。“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①。这次洵口战役是胜利了，但是，主张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的指导者们不把洵口战役当作反围攻的第一战，按这次战役所必然引起的变化，去诱导战争向胜利的道路前进，而震惊于黎川一地之失，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他们首先去打黎川以北白区——硝石，不胜，再打东南的资溪桥，又不胜。接着，就辗转寻战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12月，敌军向团村（黎川南）进攻。这一次战役，因为红军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分散了兵力，不能全歼敌人。敌军经过整编后，向南推进，压缩我根据地，红军退守闽赣边界的德胜关、大杉岭，掩护建宁、泰宁一线。

福建事变时，敌军由北线抽调兵力去攻打十九路军，对中央区采取守势，沿线建筑防御工事。这正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时机。但是，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红军并没有向敌出击，反而出师乌江（江西吉水东南）、神冈、党口，结果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南京军队的优势进攻和十九路军内部的分裂而失败了。

福建事变后，敌军集中全力进攻红军。红军和敌军在康都（建宁西北）、建宁、泰宁地区，相持九个月，最后被迫后撤。

以后，敌军主力由甘竹向广昌推进。广昌为中央区北面的门户。北路敌人侵占广昌是要号召其他各路军队协同进攻中央区。“左”倾路线指导者集中红军兵力，进行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但是红军装备低劣，虽然杀伤了敌人，却束缚了自己的机动性，结果遭受很大的消耗，终于阻挡不了敌人。

广昌战役后，敌军第一路由泰和向兴国突进，第二路由滕田向古龙冈前进，第三路由宁都、石城前进。红军却分兵把守，企图阻敌前进。红军曾经组织广昌南部高虎脑、万年亭战役，完全采取节节抗击的阵地战。这是第五次反围攻中阵地战发展的最高峰，虽然也杀伤了敌人，红军却因伤亡很大而损失了元气。接着是驿前战役（石城北），红军节节退守，根据地日益缩小。

驿前战役后，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线的红军，也相继撤退到兴国以南。

总之，在第五次反围攻的整个过程中，不利用洵口初战的胜利，不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主张两个拳头打敌人，主张以集中

对集中,主张分兵把守阵地,如此等等,都是消极应付,分散被动,使红军元气大受损害,而敌军也阻挡不住。因此,战争继续一年多,终究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最后不得不退出了江西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为了突破蒋介石的围攻,争取新的胜利,1934年10月开始了震动全世界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派遣第七军团,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支红军由福建、浙江、安徽转入江西,和方志敏率领的第十军会合,组成第十军团。经过多次战斗第十军团1934年底转移到怀玉山,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失利,方志敏被捕,在南昌英勇牺牲。此后,这一支军队的余部在粟裕的指挥下,继续坚持了闽浙赣游击战争。

8月,中共中央命令任弼时率领红军第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开始突围转移,作为整个主力红军侦察探路的先遣队。10月,第六军团在贵州东部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到9月,原来活跃于鄂豫皖区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由河南罗山地区突围长征,进入陕西南部,创造了鄂豫陕根据地。

抗日先遣队的北上,红军第六军团的西征和第二十五军的进军西北,有力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以至全国红军的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十万人左右,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首先在江西的安远、信丰间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北部;在湖南的桂东、汝城间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占

领宜章；突破了粤汉沿线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等县。红军分兵向西推进，渡过潇水，直迫广西边境。

11月底，红军到达湘江东岸，强渡西向，通过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着沿广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攻克黎平、锦屏、施秉、余庆等县。

红军到达黎平后，整理部队，然后向遵义前进。在前进中打败了国民党王家烈部队，渡过乌江，1935年1月6日占领遵义。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六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红军从江西、福建出发，经广东、湖南、广西，1935年1月到达贵州遵义。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已经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的严重不满，又由于许多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开始觉悟并站在反对“左”倾路线的立场上，因此，在大多数同志拥护之下，遵义会议否定了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并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新的领导。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特别是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央的领导的开始，是我们党极端重要的一个转变。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胜利地向前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进行了总结，指出这次反围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和战略战术上犯了根本性质的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攻中和长征开始时，起初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表现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左”倾分子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使革命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上采取了运动战的方针，整顿了队伍，减轻了行装，以神出鬼没的运动迷惑敌人，抛开敌人。

党的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队急忙作了新的部署阻止红军在四川北渡长江和川陕区的第四方面军会合。红军由四川西出云南威信，又折回贵州，在遵义附近集结主力，击溃了国民党许多追击部队，接着向西北前进。蒋介石又布置重点阻止。于是红军直逼贵阳，又由贵阳向云南前进，占嵩明和寻甸，直逼昆明。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远远落在红军后面。中共中央命令部队渡过金沙江，以便使红军脱出敌人堵截追击的包围圈，这是战略转移过程中的重要关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由会理附近继续北上。红军先遣部队5月15日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完成了大渡河的强渡任务，接着大军夹河而上，直趋泸定。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两岸都是二三十里高的高山峻岭，河幅宽三百多公尺，水深七公尺至十多公尺，水流湍急。红军

在敌人前后堵截和追击的情况下，终于在5月29日夺取了安顺场北面险要渡口——泸定桥。接着强渡大渡河，经过天全、芦山，开始攀越川康边界大雪山南端的一个高峰——夹金山。6月16日，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继续北上，爬过了大雪山的另一个高峰梦笔山，7月10日到达松潘县西南面的毛儿盖。

这时，在红军第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现了严重的逃跑主义和军阀主义。由于张国焘否认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夸大敌人力量和轻视自己力量，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因此他和中共中央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以迎接当时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张国焘反对这个方针，提出红军向西康、西藏间少数民族区退却的失败主义路线。

张国焘这个错误方针，要使红军离开汉人地区，其结果必然大大削弱红军，削弱全国抗日运动，以至把革命断送。

红军在雪山地区休整一个月。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举行了两次重要会议——懋功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

红军休整后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通过荒芜泥泞的草地（松潘以西），8月28日到达巴西。左路军至阿坝后，张国焘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天全、芦山，并命令右路军的第四方面军部队，再过草地一同南下，把部队带到西康甘孜一带，实行分裂红军，并自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还企图危害中共中央。

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分坚决北上，向甘陕前进。9月5日，

由毛龙出发,进入甘肃南部岷县,占领通渭,越过六盘山敌人封锁线,经固原,出环县,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北部的保安县吴起镇,和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合。

另一方面,1935年11月,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由湘鄂川黔突围北上,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甘孜,1936年6月和第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努力,第四方面军同张国焘的意志相反,和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在1936年10月,第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静宁和第一方面军会师。这时,张国焘又命令第四方面军向新疆西进,因此,第四方面军只剩了一小部分,其余在向新疆前进时,大部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断送了。这是红军在长征中所受到的另一次重大损失。

由于懋功、毛儿盖会议和后来的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反党活动,第四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下,迅速地回到中央的正确领导方面来。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一贯采取教育的方针,直到他犯了成立伪中央的严重错误时,依然本着宽大精神给他以自新的机会。但是,一切仁至义尽的方法也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者的没落。张国焘终于在1938年春叛变革命,卖身投靠国民党。

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的整整一年中,经历了十一个省(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堵击,连续行军二万五千华里,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胜利地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会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攻以前,发展到

三十万人，由于“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以及张国焘的分裂破坏而受到极严重的损失，到陕北会合，总共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最可宝贵的精华，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可宝贵的财产。

三支主力红军都作了阵地的大转移而且胜利地会合了，它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①

长征是历史上的新记录，因为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因为它证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攻的破产。长征是宣传队，因为它在中国广大地区内宣布了红军的道路就是人民解放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因为它在十一个省内散播了许多革命的种子。

长征是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七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倡导和组织

(1935 年 12 月至 1937 年 7 月)

一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1929 年下半年在资本主义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 1932 年底，工业低落过程暂时停止，危机转入萧条，接着来了少许的高涨。

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出产量，以 1929 年作一百计算，1933 年，各国工业有些增长，1933 年以后的几年，继续上升。1935 年，美国为 75.6%，英国为 105.8%，法国为 67.4%，意大利为 93.8%，德国为 94%，日本为 141.8%。日本、英国超过危机以前的水平，德国、意大利接近于这个水平，而美法两国和 1929 年比较，还减少 25% 左右。

资本主义各国的危机所以减轻一些的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力量发生一定的作用，即各国垄断资本家加强本国工人的劳动强度，减低本国农产品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产品的价格。由于各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人为因素的结果。

日本正是这样。在这个时期内日本对华侵略，由东北扩大到华北。日本在中国攫取超额利润，扩充军备，进行侵略战争，补偿了一部分经济危机中的损失，引起了日本工业部门的某些活跃和上升。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把沙文主义和准备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把压迫工农群众和实行反革命恐怖作为巩固将来战争后方的必要手段。帝国主义国家日益陷入无法克服的内外矛盾的深渊。

因此，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

特别是德、意、日三个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政策上，彻底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公开的恐怖手段来施行法西斯专政。在对外政策上，它们都不满于九国公约和凡尔赛条约，认为是它们的侵略行动的障碍物。于是这三个侵略国形成新的侵略战争的策源地。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使英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更加扩大。德国要修改欧洲相邻各国的疆界，准备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和整个中国发动新的进攻。德、意两国撕毁了凡尔赛条约，日本撕毁了九国公约，它们退出了国际联盟。

用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新的侵略战争是由德、意、日三个侵略国的当权人物，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开始的。这个战争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英、法、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战争，因为它的目的是要重新分割世界上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使侵略国得到利益而使被侵略国及其

他帝国主义受到损害。

三个侵略国的联盟也就这样开始形成起来。

在这个时期内，苏联工业生产一直向上增长，由1929年的100%，上升到1935年的293.4%，差不多增加了两倍。

苏联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1933年为70.4%，苏联工业生产品中社会主义工业部分占99.96%。

在谷物播种面积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在1933年占84.5%，而个体农民经济只占15.5%。

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和平，因此，苏联的利益要求它和某些不愿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起来。

德、意、日三国退出国际联盟后，1934年末，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国际联盟是软弱无力的组织，但它还可以作为揭露侵略者的场所，因此，苏联就利用国际联盟进行反侵略的斗争。1935年5月，苏联和法国缔结了互助公约，同时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同样的条约。1936年3月，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缔结了互助公约。

二 国民党欧美派抗日倾向

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建立法西斯军事专政后，就开始建立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立夫和陈果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组织。

四大家族的垄断，是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为中心的。国民党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作为所谓国家银行，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募集内外公债等特权，1928年到1935年，蒋介石政府用加入官股的办法支配了

原是北洋军阀政府的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35年成立了由原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名的中国农民银行。

四大银行在全国银行中，占垄断的地位。1936年，四大银行资产总额占全国银行的59%，各项存款占59%，发行兑换券占78%。实际上，四大银行就是全国银行的银行，全国商业、工业、农业的垄断者。

1935年11月，蒋介石政府为了搜刮全国人民的财富，把它变为四大家族的私产，实行法币政策，发行了不兑换的纸币。

四大家族，以四大银行为活动中心，首先，在商业方面，进行垄断和搜刮。宋家在棉业、米业和百货业方面组织了极庞大的商业托拉斯，垄断全国商业。

1935年和1936年是民族工商业危机的年代，四大家族完成了对金融的统制之后，又在工业方面进行统制和垄断。四大家族在官办形式下，除吞并原有官僚工业之外，又建立了垄断全国工业的主要机关——资源委员会。四大家族所经营的钨铁、炼钢、机器等工厂，都同帝国主义合作。在商办形式下，四大家族乘人之危，利用加资、改组、放高利贷等方式，攫取民营工业的统制权和所有权，其中特别是纺织工业。1937年上半年，四大家族所兼并和经营的纱厂锭数占全国纱厂总锭数13%。

在农业掠夺方面，四大家族是国民党统治区最大的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它还利用反动政权，将一切苛捐杂税、强迫劳役、抽调壮丁、无偿征用土地等强加在全国农民身上，实际上使全国农民都成为四大家族的剥削对象。

四大家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吸血鬼，它通过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各方面的垄断，掠夺了全国人民的财富。

蒋介石集团是依靠出卖中国主权取得外援来维持反动统治的。因此,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过程同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市场的过程。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取得了支配地位。1936年,全国煤炭总产量中,外国资本占55.7%。铁矿几乎完全被日本资本所控制。1937年中国铁路投资中帝国主义各国占90.7%。1936年,长江航线航运吨位,外国轮船占81.9%。电力发电度数,外资占55%。银行总资产中,外资占20.8%(但是,不能单从外国银行在华资产的数量上来推断它的实力,因为外国银行有发行纸币和管理关税、盐税的特权,外汇价格也为外国银行所操纵)。外商纱厂的纱锭占全国总数46.2%,线锭占67.4%,布机占56.4%,等等。

总括起来说,抗日战争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的采煤、冶铁、铁路、航运等事业,控制了中国金融,在轻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外国资本占统治地位。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大部分不是由外国输入,而是由中国掠夺而来。掠夺的方式是勒索赔款、强占土地、骗取企业所有权、吸收中国资金等。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只把很少一部分资金输入中国,而由中国掠取了大量利润,所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结果就造成了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由1894年至1937年这四十三年内,中国国际收支中,国际收入为十七亿三千六百多万美元,而国际支出三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这个逆差,一方面是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资本掠夺的结果。

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膨胀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实现的。

第一，1936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四十二亿八千五百多万美元投资中，英国有十亿四千五百多万美元，同1930年十亿四千七百万美元的投资额相比，英国投资陷于停滞状态。美国有三亿四千多万美元，同1930年二亿八千五百多万美元的投资额相比，虽然增加了20%左右，但是美国投资总额是很小的。日本有二十亿九千六百多万美元，同1930年十四亿一千一百多万美元的投资额相比，增加了48%。日本投资的数目最大，发展也很快，日本投资占各国投资总额的半数。

第二，193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投资有十四亿五千五百多万美元，占投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但是，日本在关内（山海关内）投资的数目很小，也没有显著的增加。在关内投资大量增加的只有美国，增加了40%，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借款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由美国借来的。

第三，1936年帝国主义各国在关内十三亿六千九百多万美元投资中，英国最多，占六亿五千一百多万美元，其次日本，占三亿零五百多万美元，美国最少，占二亿一千多万美元。帝国主义在关内二亿八千一百多万美元制造业投资中，日本最多，占一亿四千多万美元，英国其次，占一亿零七百多万美元，美国最少，占二千多万美元。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这时，日本资本继续向关内侵略，垄断了华北的棉业、电业、金融、矿业、铁路、港口等等，并向关内各省倾销商品，武装走私。上海的日本纱厂积极扩充，并进一步排挤、掠夺华厂。

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政策，严重地危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动摇了四大家族的经济基础，

这样，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四大家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裂口就日益扩大和加深了。

1935年夏天，美国经济考察团来华。这年冬天，英国政府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在英美的策动下，蒋介石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了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的钞票为法币，并宣布白银国有。法币和英镑相联系，对外汇兑，规定华币一元合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蒋介石政府的法币，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来决定。为了维持汇率，中国白银大量流入美国，使美国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实行法币政策的结果就使美元和英镑完全支配了蒋介石政府的货币。

帝国主义间的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动摇。国民党当权派中日益分化为欧美派和亲日派。南京政府的欧美派在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和在美英政府的影响下，开始改变对日的态度。

1935年底发生了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和亲日派喽罗唐有壬被刺事件。接着，国民党政府改组，亲日派去职，亲欧美的蒋介石派接替，和新政学系（投机政客集团）分子，加强以美英帝国主义为背景的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派和汪精卫派的联合从此分裂。1936年9月至12月，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和蒋介石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进行过多次谈判，在谈判中，南京政府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谈判没有获得结果而停顿下来。

1935年华北事变时，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6年5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个变化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并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

任务。

三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北部发动了新的进攻。

日本政府声明它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任何国家都不能插足于中国，中国也不能同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

1935年5月，日本军阀借口所谓中国援助东北义勇军问题，提出种种极端无理的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军队侵入关内，威胁天津、北平，声明南京政府如果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它就采取“自由行动”。

在新的军事进攻面前，南京政府完全屈服了。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取消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长，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消河北省的反日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着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

6月，日本借口中国军队扣留日本特务人员的所谓张北事件，要求撤换察哈尔主席宋哲元。

10月，日本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三河等县“饥民”，举行叛乱，并在香河县组织维持会。11月，日本喉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又纠合伪军李守信和德穆楚克等组织“内蒙古自治政府”。

南京政府为了适应日本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冀察两省放置在中国行政区域以外。

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抗日运动走向高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大祸迫近眉睫的时候，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这个宣言号召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和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及其他抗日军队，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到达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红军会合之后，在1935年11月发表宣言^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和蒋介石政府出卖中国的危险，因此，抗日反蒋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这个宣言着重指出抗日反蒋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拥护这个唯一正确的救亡图存的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12月9日北平五、六千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爱国请愿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抗日救亡的基本条件。国民党政府用屠杀和逮捕等野蛮手段来对付爱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更多的学生群众所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斗争在继续酝酿中。12月10日北平各校举行总罢课，先后成立了学生会，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和市民三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爱国

^① 《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1935年11月13日，《六大以来》上）。

示威运动。群众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和袭击，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在群众威力下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12月9日和12月16日的爱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很快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救亡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

这次爱国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扩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基础，在同工农相结合的斗争中青年学生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办工人夜校和农民夜校，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很快遍及全国。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广大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结合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接着，全国各地人民先后组织各界救国会，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到这个时候，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倡导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新的革命高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高涨起来。

四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革命重新走向高涨的时候，需要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进行正确的分析，决定党的政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

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对于当时政治形势、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全面的分析，并确定了党的策略。决议指出日本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是当时形势的特点，中国政治生活中各阶级各党派及其武装力量正在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坚决抗日，在统治阶级营垒中一部分人也有抗日的要求，他们内部就发生了矛盾和分裂，因此，党的任务是要用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发动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战争。决议反对了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个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①的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第一，报告指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存。这就使中日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其中工农是抗日的最坚决的力量。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1927年以后，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但是，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自1926年至1930年这五年内，东北每年进口棉纱一二，八八八，九七七海关两中，关内中国产品占九，九〇六，一八三两，即占77%，棉布五三，一九九，二五五两中占一三，八五七，一七四两，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即占 26%。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的丧失以及其他原因,使 1931 年后关内中国纱厂停工锭数经常在一百万锭以上。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每年产煤一千万吨左右,是国内重要的产煤区之一。东北煤炭出口约占半数,关内工厂过去时期依靠东北供给煤炭。1931 年后,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北的煤矿,因而大大影响到关内工业燃料的供应。东北大豆每年出产四、五百万吨,其中有一半输出国外。东北大豆是中国换取外汇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东北被占领后大豆为日本所掠夺,因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入和外汇率(中国国际收入中出口总额所占的比例,由 1930 年的 61% 下降到 1933 年的 42%),使中国工商业者在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上大受损失。

由 1931 年至 1936 年,日本工厂,特别是棉纺织工厂,在关内各省积极扩张,吞并华厂。华北两大纺织中心是青岛和天津。青岛向来是日本纱厂独占优势的地区。1931 年,日本在天津还没有独自经营的纱厂,到 1936 年,日本纱厂纺锭占天津全市锭数 55.2%,布机占 32.9%。上海是中国棉纺织业的最大中心,从 1931 年到 1936 年,日本纺锭由 51% 变为 49.9%,布机由 52.8% 变为 57.7%,中国纺锭由 41.9% 变为 41.8%,布机由 34% 变为 29.1%。五年内日本布机增长 5%,而中国布机却减少 5%。在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棉纺织中心,日本资本都已取得了优胜地位。

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化的危机下和民族工商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威胁下,它有参加抗日或采取中立的可能性。

“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并吞中国的行

动,会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矛盾裂口的扩大,因此,“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这些变化,指出中国革命阵线和反革命阵线正在变动之中。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扩大了,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可能。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反日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趋向高涨,革命形势处于“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中国的革命力量暂时还小于反革命的力量。因此,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迫切需要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党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第二,这个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规定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各种政策。人民共和国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同时又允许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对富农的土地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这次会议后半年左右,1936年7月,为了使红色政权成为

抗日救国的中心，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对于汉奸卖国者的土地财产和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对于各种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生活状况很坏的小地主、小土地出租者等等）的土地，不得没收。

第三，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和这个策略相反的是关门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者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使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发生变化。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阵营是固定的，他们盲目地把当时积极起来的中间派别当作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关门主义者说“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恰恰和关门主义者所设想的相反，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路一样是曲折的，而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阵线也是可能变化的。组织千百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革命的需要。只有这种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集团打倒，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要集合广大的人马，把敌人包围起来加以消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相反，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单枪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关门主义者把可能做革命友军的人们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了。他们实际上帮助敌人，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于失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统一战线是有很区别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领导，不敢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靠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结果革命统一战线由于没有中心支柱而招致了失败。但是，国内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有了久经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长征，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党和红军必然要成为中心支柱，必然要成为坚强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担负着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责任。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队伍，必须扩大党、扩大党领导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坚强的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

第四，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表明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又指出国际援助的必要性。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世界人民一定会援助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世界人民对于我们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按照可能和一切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结合起来，孤立日本帝国主义。

五 逼蒋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下，全党积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逐步实现了统一战线。

国民党反动政府调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①在陕西、甘肃

^① 十七路军属冯玉祥所部西北军。

进行反共战争，党首先必须争取它们和红军停战并和它们订立抗日协定。1936年1月25日，红军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信^①上，指出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肃陕西去打红军，使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遭受牺牲和损失，指出蒋介石处处压迫东北军，把他们调到最穷苦的陕西、甘肃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地区(陕南和甘南)也不肯给东北军，并派遣自己的党羽去监视、分裂东北军，因此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一条——抗日反蒋。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日作战。红军坚持打击“剿共”主力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而对被迫和胡宗南一同向红军进攻的东北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②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同红军订立了停战协定和抗日协定。

3月10日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红军组织了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占领同蒲路，并准备开赴冀察前线，为全国抗日人民打先锋。但是，蒋介石调动大军协助阎锡山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又命令陕西、甘肃驻军捣乱红军的后方。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国难当前，双方的决战，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敌人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就把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并在1936

①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六大以来》上第746页）。

② 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把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从华北调到西北，任命张为西北“剿共”副司令。

杨虎城：曾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1929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1949年9月被杀害。

年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政府进言，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三省停止内战，双方派遣代表，共同磋商救亡的具体办法。并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出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和监视这个主张的完全实现。

在这以前，蒋介石正继续出卖东北和华北，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但是，由于日本在华北的进攻和英美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同英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在美英政府的指使下和在人民抗日高潮的逼迫下改变它的对日态度，因此，党这个通电采取了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这个主张。红军回师之后，接着举行西征，解放宁夏、甘肃边界广大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不久，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两广事变。1936年春，蒋介石以“加强团结”为词，要广东军阀陈济棠取消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执行委员会。这两个机关是为了反蒋而成立起来的。两广地方实力派也以“抗日”为名，在这年六月间，举起了反蒋的旗帜。蒋介石先赶走了陈济棠，于是反蒋重心由广东转到广西。桂系李宗仁邀请许多反蒋的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到了广西，并准备在广西成立政府，坚决反蒋到底。蒋介石的军队也从四面八方把广西包围起来。

双方剑拔弩张，大规模的内战又迫在眉睫了。

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可能成为抗日的同盟者，所以抗日反蒋的口号不适当了。

党的方针是：第一，对蒋介石集团，一面争取他们抗日，一面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和行动。第二，进行逼蒋抗日的同时，联合国民党各派及其军队。两个方针同时并进，因为联合更多的抗日民主力量，就更能实现逼迫蒋介石抗日的目的。第三，在全国人民面前，党必须担起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来促成国内和平统一。所以，对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两广事变），应当避免袒护一方的态度。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由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由于广西方面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主张组织政府同蒋介石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终于避免了内战的爆发。

中共中央估计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不会为蒋介石所接受，为了推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抗日，在8月25日给国民党的信上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企图用由国民党当权派所控制的只可以充当国民党政府咨询机关的国防会议来代替党所主张召开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用国民党当权派所操纵的国民大会来代替党所主张成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出：在国民党和全国各界中，有许多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和这些爱国人士共同携手，组织统一战线，并希望爱国的国民党员能够在其党内形成一种支配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申明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9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①中，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

^①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六大以来》上，第779页）。

指出民主共和国同工农民主专政比较起来，在地区上，是更普及的民主，同国民党一党专政比较起来，是大大进步的制度。但是，要实现这个口号，必须发动群众和加强党的领导。民主共和国必须实行党的抗日救国纲领。这两个口号，形式上虽然不同，实质上却是一样。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6年8月，日伪军队侵犯绥远。驻防绥远的中国军队进行抵抗，全国人民展开了援助绥远军队抗日的热潮。上海和青岛的纱厂工人在十一、二月间举行了反日罢工。

全国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继续进攻红军。当时，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同意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不仅拒绝接受反而加紧布置“剿共”军事，并准备把张学良、杨虎城撤职。当时在党的影响下，西北各抗日团体举行反对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示威。张、杨在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亡国的反共内战。蒋介石被扣留后，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所把持，他们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并策划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扩大中国的内战。南京政府欧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了蒋介石集团及其英美主人的利益，反对马上讨伐和处置张学良。宋子文和宋美龄先后到了西安。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中共所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①，说明这个事变是国民党一部分实力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受了中共的影响而发动的。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政策，而主张对日抵抗、对内和平的政策。所以，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可以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但是，这个事变又是一种军事政变，造成了新的内战的可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防止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党的方针是联合南京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这样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情张、杨的义举，并愿意对张、杨给以积极的援助。

蒋介石拥有全国性政权和几百万军队，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争取蒋介石对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有决定的作用，对于争取英美共同抗日，也有重要作用。所以，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12月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同志来到了西安。中共代表一面告诫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一面说服张、杨要认清怎样处理这次事变的正确途径。在中共的努力下，以张、杨的抗日通电为基础，一方张学良、杨虎城，一方宋子文、宋美龄举行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和实现抗日战争，中共中央根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

^①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六大以来》上，第792页）。

提出四项保证和五项要求^①，改变了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各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等主张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亲日派汪精卫等坚决地反共，叫嚷取消红军，取消工农民主政府，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欧美派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了统一战线，但他不肯放弃独裁和反共反人民政策，蒋介石要一切统一于他，一切服从于他。

这样，国民党三中全会由于亲日派的存在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反共反人民政策，国民党并未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转变，也没有批评它的过去政策的错误。但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声明对外主张抵抗，对内主张和平，承认国共两党可以进行谈判。到此，中共所要争取的国内和平和停止国内武装冲突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这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时期。

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和批准了1935年以来党的政治路线。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从1935年12月9日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

① 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是：（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引自《六大以来》上，第798页）。

中全会时为止，党的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在这个时期内，争取国内和平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时期，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民主。因为抗日战争需要国内和平，需要人民动员，而民主乃是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和进行人民动员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一环。

国民党必须立即开始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第一，建立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改变国民大会选举法，实行民主选举，制定民主宪法，成立民主国会，选举民主政府。第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特别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为此，党必须争取群众，即发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资产阶级抗日派，因此，党的基本任务在于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这个报告着重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①。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个结论。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民主问题，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进行斗争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所提出的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为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根本问题。

六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把它作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次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就有了巩固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厅控制了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南满铁路公司支配了东北的工业和交通。东北被占领后,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在东北的投资由1932年的五亿五千多万美元增到1936年的十四亿五千五百多万美元(当时日本在中国投资共二十亿美元)。1937年东北生铁产量有八十一万一千吨,钢材产量有二十四万六千多吨,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铁路有八千二百九十六公里(当时全国铁路共一万九千零二十八公里)。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进行武装移民,强占民田,日本金融机构进行高利盘剥和统制粮食。日本侵略者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封建领主。

日本在东北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所谓“协和会”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党一面在延边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面在各抗日队伍中进行工作,争取和

领导他们抗日。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是，由于日本军队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分裂破坏，更重要的由于这些旧抗日军内部矛盾和脱离群众，到1933年春，三十万旧抗日军就先后被敌人各个击破。各地自发的抗日武装，有的被地主阶级分子所把持，有的没有正确的方向，也被日寇所击破。

1933年底和1934年初开始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抗日的主力 and 重心。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游击”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党所领导的延边、磐石、珠河、饶河、宁安、海龙、汤原等地的游击队，在战争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各地溃败的群众武装和一部分旧军队都团结到党的周围，接受改编或接受统一领导。

当各地区的抗日部队的联合行动初步完成后，全东北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2月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193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抗日联军各军编成三路军：第一路军活跃于辽宁省东部山地；第二路军活跃于吉林省东部山地；第三路军活跃于黑龙江省的山地和平原。准备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关内时，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以便更有力地箝制敌人，配合全国抗战。

在全国进入抗日战争之前，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从而削弱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延缓了日本侵略者向关内进攻，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七 奠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革命时期，即抗日时期。有系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问题，使革命理论站在革命实践的前头，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任务。为此，毛泽东曾经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社会、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在制订政策和进行革命时，必须以客观形势为出发点，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引导革命前进。

中国抗日时期，民族的矛盾和阶级的矛盾，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形成了奇特的交错。因而迫切地需要党善于分析和解决这些极其复杂的矛盾。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在党内先后取得了三次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全党必须以“左”倾路线指导者的失败为殷鉴。为了从根本上击败党内机会主义，就必须揭露“左”倾路线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最本质问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也即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他们是主观主义者。为了便于在政治上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击败机会主义。这就是说，要首先在革命先锋队内部从思想战线方面来准备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光辉地完成了党内思想斗争的重大任务。

《实践论》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起源于实践又转而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开始只有感性知识，感性知识材料积累多了，又经过研究分析，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即实践（存在）到认识（思想）的阶段。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得到了证明，使精神变为物质，这是认识过程的另一个阶段，由认识（思想）到实践（存在）的阶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反复地进行，认识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丰富，这就是毛泽东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认识论的特征，就是割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教条主义者从一个方面来否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们离开实践，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词句，把一切外国经验生搬硬套。

正是教条主义者在 1931 年至 1934 年的革命年代，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实践论》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错误。

经验主义者从另一个方面来否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们只满足于局部的经验，轻视理论学习，不懂得把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水平上，不承认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看不见革命的全局。

否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征。他们只看见片面，而看不见全面。认识的片面性，乃是两种主观主义的共同点，他们都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

的真理。这是在党的历史上这两部分人能够互相合作的原因，而由于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认识，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合作时，一般地是作为前者的附庸而出现的。同时，教条主义者如果没有经验主义者的合作，也不容易流毒全国，因为经验主义者接受了教条主义，并把它贯彻到实际中去。

《矛盾论》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每个事物都包含有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斗争又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人类社会如此，自然界也是如此。事物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中，其中有许多矛盾存在。要认识复杂事物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其主要方法，在于研究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各种矛盾中有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而每一矛盾中也有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主要的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而主要的矛盾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方面。人们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捉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进中国内部的时候，就要看到矛盾的新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矛盾。掌握了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问题，并给解决其他矛盾创造条件。一定要掌握主要矛盾，才能解决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果掌握不住这一点，就不能够把事物推向前进，许多次要的矛盾也解决不了。毛泽东的思想及其领导方法的特点，是善于组织一切力量，为解决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斗争，而解决了中心问题，又为解决其他次要问题创造了条件。

抗日时期，抗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不是国民党顽固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抗日的力量，放手地发动进步力量，因而找到了解决中日矛盾的正确方法，也找到了解决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一种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每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遵循着这一种方法来对待一切事物。

另一种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学者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固定化或僵化，用静止的孤立和片面的观点去观察世界，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永远不变的，彼此无关的。

这种思想方法，用在政治问题上，就产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其中有联合也有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有矛盾，所以他们趋向联合共产党，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也有矛盾，他们又和共产党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左”倾错误的片面性，不承认矛盾的统一，右倾错误的片面性，否认统一内部的矛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只看见革命和反革命的尖锐的矛盾，而看不见其他的矛盾，因而主张一切打倒。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只看见中日的矛盾，而抹煞其他矛盾，又否认斗争。政治上“左”右倾机会主义，产生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矛盾论》之所以能够这样卓越地运用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

命问题，因为毛泽东为人民革命而研究辩证法，同时又吸取人民革命的经验而丰富了辩证法。《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语

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渡过了极严重的反动时期。这时，一方面，敌人对革命发动了无数次的军事进攻，企图完全消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党在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又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几次侵袭以及张国焘失败主义路线和分裂破坏，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党找到了自己的杰出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毛泽东，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领导革命从农村出发，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由一块根据地发展到多块和大块根据地，即以武装的革命的农村包围并最后夺取反革命所占据的城市。这是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因而创造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使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因而产生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以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在红色政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克服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和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在反对日本军

国主义的斗争中，党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

这样，在十年反动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就击败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克服了机会主义的侵袭，保存了红军基干和一部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党的大批优秀干部，积蓄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在 1935 年末又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结束了内战局面，走上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时期，因此，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完成了政治准备和干部准备。

第八章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始和进行的。

1929年至1932年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就它的拖延性、深刻程度和破坏力量来说,是史无前例的。1933年后,资本主义各国转入经济萧条。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这种萧条和以前的经济萧条不同,它不会带来工业的新高涨。

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出产量,如果以1929年为100%,到1937年,美英法三个所谓民主国中,美法两国,还没有达到危机以前的水平(美国为92.2%,法国为82.8%),英国超过了一些(123.7%)。德意日三个侵略国中,德日两国超过了危机以前的水平(德国为117.2%,日本为170.8%),意大利接近于1929年的水平(99.6%)。

到1937年下半年,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1938年,美国工业出产量为72%,英国为112%,法国为70%,意大利为96%,日本为165%,都已下降了。只有德国工业,暂时有少许的增长(125%)。但是,德国是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

济轨道上，一定会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在这个时期内只有苏联才是不知道经济危机为何物的唯一国家。1937年底，苏联工业产量达到了1929年的428%。更重要的是在工业高涨中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1937年，苏联全部工业产品中，社会主义企业出产的占99.97%，集体农庄占农户总数93%。

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它们用军事行动来重新分割世界市场、原料产地、领土和势力范围。

日本在1937年7月侵入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德国在1938年强占了奥地利，同年秋又强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年强占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春，意大利侵占了阿尔巴尼亚。德国和意大利在1939年春帮助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随后德国进攻波兰，接着就是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这个战争，是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损害英法美帝国主义利益、反对苏联的战争。在世界战争爆发以前，德意日三个侵略国，从多方面损害英法美三个所谓民主国，而英法美实行退却，实行“不干涉”政策，实行拒绝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甚至于给侵略者以各种帮助。

德国军国主义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美英法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复活起来的。首先美国当权派恢复和革新了德国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自1924年至1929年，美国垄断资本为建立德国军事工业而输入德国的资金共有二百亿马克以上。美国的财政援助造成了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希特勒上台后英法两国政府实行绥靖政策。1933年，英法德意政府在罗马签订了

四国协定。1934年，英法两国帮助纳粹德国签订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它们默认德国恢复和扩张军备，并默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和德意两国侵略西班牙。1937年，英国政府同意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并且要求希特勒接受英法两国加入“柏林—罗马轴心”。英法当权人物认为这是没有危险的，它们企图把法西斯的侵略引向东方，利用它作为反苏战争的武器。

英法美三国，一方面反对日本损害它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另一方面又畏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畏惧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抵抗世界革命的一种有力工具，因而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它们企图使一切交战国都陷入战争泥坑中，然后当交战国疲惫时，就挺身而出，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国家来接受它们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条件。

侵略者所掀起的任何战争，都是威胁爱好和平国家的一种危险。至于包括着几万万居民的战争，更不能不是威胁着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苏联是不能不注视这些危险事变的。苏联一方面坚决地实行维护和平的政策，保持和邻近国家的和平关系，“援助遭受侵略而为本国独立奋斗的民族”；另一方面竭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量，准备狠狠打击那些企图侵犯苏联的战争挑拨者。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策动下，德意日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各国之间，在确定战争的目的和组织战后世界和平的任务上，都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别。

苏联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反轴心国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和加强民主制度，消灭法西斯主义，防止德意日新侵略的可能性。相反地，美英法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德日两国从世界市场驱逐出去，而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它们完全没有想到去消灭法西斯主义，解放被法西斯所奴役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内实施民主改革。

二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北京西南十余公里的芦沟桥，向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守军在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违反国民党的意志，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并准备向华中内地进攻，上海守军起来抗击。全国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以侵占芦沟桥作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因为当时芦沟桥是北平的唯一门户（北平的东北和西北方面都被敌伪所包围，只有西南方面由中国军队防守）。敌寇首先占领芦沟桥，使北平四面受敌，企图一下把北平夺取过来，然后以北平、天津为据点，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以宋哲元^①为首的国民党冀察当局，反对二十九军坚决打下去，只许抵抗，不许出击（守着阵地挨打）。接着，日本为了集中兵力，宣布暂时停止进攻，冀察当局幻想战争可以局部得到解

^① 宋哲元：原冯玉祥国民军一军第四师师长。1930年，蒋冯阎大战，冯玉祥失败后，张学良将退入山西境内的国民军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收编为29军，以宋为军长，1932年9月，任宋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3月，宋曾参加长城抗战，战士以大刀英勇近战，夜袭日军，声誉大振。5月“塘沽协定”后，宋在日蒋之间力求自保，对日作战消极，听任平津沦陷。

决,为了表示不抵抗的诚意,单独撤除了北平城内通衢要道所设置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谢绝了全国各地人民寄来的抗战劳军的捐款。到日寇集中了兵力,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冀察当局事先已经解除了武装,华北两个最大的城市北平和天津很快就落在敌人手里。

芦沟桥事变一起,国民党晋绥当局阎锡山手足无措。当日寇从平绥铁路举行进攻时,国民党军队从山西省大同不战而逃。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了,阎锡山退守临汾。一九三八年春,阎锡山逃往黄河西岸陕西省宜川县去了。

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摇摆不定。到上海战事爆发,日本打到蒋介石政权的中心地区来,国民党四大家族在东南的统治地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蒋介石被迫得无路可走,才开始实行抗战。但是,蒋介石一面进行抗战,一面期待和平。十一月,九国公约国(华盛顿条约上九个签字的国家)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蒋介石等待九国公约国出面制裁日本,把国家的命运完全放在不可靠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会议桌上。蒋介石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作战部队集中到上海地区,他命令军队死守上海。蒋介石的意思在上海作战要适可而止,及时向既设阵地转移,使日本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然后寻找适当机会,更好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贯彻持久战的方针。后来,敌寇从杭州湾登陆,困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到十一月九日才仓皇撤走,由于没有撤退计划,成了溃败,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

由于蒋介石的错误的作战方针所造成的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战役中的溃败,严重地影响了南京的防守。蒋介石把刚从上海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兵败将,不加整顿,拼凑成军。这些拼凑起来

的军队没有作战的能力。这时，蒋介石接受了法西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劝降，幻想德国的调停可以在南京得到妥协的城下之盟。蒋介石在南京外围摆着要打仗的样子，但是日寇却没有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又没有作战能力，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了。南京失陷后，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了旷古未有的大屠杀，赤手空拳的和平居民和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杀的数目在三十万以上，日本刽子手的暴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洗刷的污迹。

在国民党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国民党战场大溃退的形势。

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就放弃了北平和天津，不久又放弃了察哈尔和绥远两省。到1938年3月，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敌人打到了山西的风陵渡、河南的归德、山东的枣庄。1937年11月上海失陷了，12月南京失陷了。1938年6月，国民党放弃了长江马当要塞，使武汉东北两面受敌。在日本的继续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陷落。从此，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广东和湖北等省的绝大部分都丧失了。总之，在国民党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一直退到四川。

中国共产党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即人民战争的路线。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①，号召实行全国抗

^①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六大以来》上）。

战。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宣言^①。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八月二十二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十月十二日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九月底，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蒋介石也发表了关于承认中共合法的谈话。于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了。

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的错误路线，在国共两党之间，就发生了原则的分歧。为了实现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又统一又独立的正确方针。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原则。8月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区别和争论，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因而尖锐地提出了谁领导谁的问题。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②，这是党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反对国民党反人民路线的纲领。只有彻底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本的目的。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为了防止可能发生和纠正已经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在参加政权问题上，9月25日党中央作

①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

②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的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出了一个决议,指出当时并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共产党员不能参加这样的政府。如果参加,只能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第二,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①。就是说,到敌后去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而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战争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组织人民的力量,经过人民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一个战略时期,再达到人民抗日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战略时期,来争取抗日战争的发展,使它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接连发出了许多指示,明确指出党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为了执行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方针,就必须分散兵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工作中,应当以游击战争为唯一的方向,其他工作都以游击战争为中心而进行。党的地方组织必须动员群众,普遍地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

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的有效办法,是加强部队的整顿训练和党的工作,肃清根据地里的土匪分子,慎重地有效地改造一切土匪式的抗日军队,加强地方上的锄奸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外发展。

在全国坚持抗战和深入群众工作的条件下,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应当在平原地带划分游击区,成立指挥机关,有步骤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吸收民间枪枝,动员人民加入游击队和军队。

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华中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间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是可能的。茅山地区根据地建立后,应当准备分兵进入苏州、镇江、芜湖三角地带。还要分出一部分部队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新四军必须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在大江南北,创立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的领导者必须在党内充分地解释抗日时期的斗争形势和工作方法同内战时期是根本不同的,只有我党我军向外发展,才能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我的防范限制政策。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和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八路军三万多人,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加上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的新四军一万二千人,共四万多人,开赴前线作战。八路军开赴华北,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数量上是不能和国民党军队比拟的,然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质量是优越的。它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为民族的利益而战斗,这些都是国民党军队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抗日战争一开始,八路

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相反，一到前线就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广大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失去的国土。

八路军开到前线后，为了阻止敌军南下占领太原，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向平型关进发，9月25日在平型关进行了一次对敌作战。这次作战歼灭了敌军精锐部队一千多人，是全国抗战中第一次对敌歼灭战，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平型关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继续溃退。在忻口战役和太原战役中，八路军在正太路 and 同蒲路大力牵制了前进中的敌军。

11月8日太原失陷，国民党军队向山西省西南部撤退，八路军在山西省东北部五台山地区和正太路敌后牵制敌人，使敌人不得长驱直入，渡河西进，并解除了数十万国民党溃军覆灭的危险，起了重大的战略掩护作用。

从此，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始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的一部分留在五台山地区坚持抗战。当时，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带极为混乱，几个日本浪人拿着日本旗，即随意占领县城，国民党军队望风南逃。八路军在1937年秋成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克服了国民党政权瓦解后的混乱现象。吕正操率领东北军一个团，创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5日，在河北省阜平县举行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38年6月，八路军又领导了冀东的抗日大起义，建立了冀东根据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原失陷国民党军队南撤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据，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新兴力

量，创立了太行太岳山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底至1938年，一二九师部队越过京汉路，进入冀鲁豫平原，组织群众的游击战争。1939年3月，开辟了冀鲁豫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1937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1938年2月，为配合国民党所谓反攻太原，一二〇师担任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任务。和敌军南下临汾同时，驻大同敌人向晋西北进攻，八路军回师抗击，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县。3月，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一二〇师一部向绥远省北部大青山挺进，9月，收复了陶林，10月，收复了乌兰花。

山东抗日根据地。1937年底，当山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时，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平津救亡学生和当地农民，在徂徕山组织抗日起义。1938年秋，在胶东黄县、蓬莱、掖县创造了抗日根据地。在鲁西北聊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帮助当地抗日人士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的抗日工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后，即分两路进入华中敌后，一路在江南，另一路在江北。江南部队，1938年6月进入京沪铁路两旁，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江北部队，1938年5月进入安徽省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地区，以藕塘为中心，建立了江北根据地。

三 中日战争发展规律

抗战爆发后，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时刻都在渴望战争的胜利。但是，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呢？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如何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当时

是很多人都没有解决的。并且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抗战初期，国民党内有亡国论的叫嚣。芦沟桥事变前，国民党是不愿抗日的，亡国论就是不愿抗日的借口。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被迫抗日，汪精卫集团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同时，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在一部分人当中，也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抗战开始后，又出现了毫无根据的乐观的速胜论，以为中国抗战很快就能够取得胜利。一方面，党内某些同志存在着轻敌的思想，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作用，只看到它抗日的一面，而忘记了它反动和腐朽的一面，以为依靠国民党就可能很快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一心等待外国的援助，尤其是等待英美来代替它抗日，以便继续它的反动统治。以国民党政学系^①报纸《大公报》为代表，在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时^②，从一种侥幸的心理出发，以为这些战役就是抗日反攻的开始。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并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

① 政学系是1916年由一部分官僚政客所组成的右翼政治派系，在南北军阀中从事投机，以猎权位。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期间，政学系的一部分开始投靠蒋介石，利用他们的反动政治经验，帮助蒋介石巩固反革命政权。

② 台儿庄是山东南部一个市镇、徐州的门户。1938年3月，为了阻止敌人南下，由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统一指挥国民党十多个军四十万人在台儿庄一带会战，抗击日本侵略军七、八万人，取得了胜利。5月徐州战役时，速胜论者认为是“准决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终究未能阻止敌人南进。5月19日徐州失陷。

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对抗日战争整个发展趋势及其前途作了光辉的科学的结论。

第一，亡国论和速胜论是毫无根据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胜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不是亡国论）。根据在哪里呢？“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

战争双方，日本是强国、小国、退步、寡助；中国是弱国、大国、进步、多助。这四个矛盾中，只有一个矛盾有利于日本，即敌强我弱。强国临弱国，不利于我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其根源就在这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忘记或抹煞敌强我弱的矛盾，而只提起或夸大其他矛盾是错误的，这是速胜论的错误根源。

另外三个矛盾都有利于中国抗战而不利于日本侵略。敌小我大，日本以小国临大国是不利于它的。但是，只有这一个因素，还不能得出中国一定不能亡国的结论。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小而强的国家是可以灭亡大而弱的国家的。例如英国灭亡印度。中国不能亡国，抗战下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是由于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日本退步和寡助，中国进步和多助。日本对华战争是反动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而中国对日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由于日本的非正义性的掠夺性的战争，它就极大地激起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使日本失道寡助。由于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就能够唤起全国人民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的团结和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夸大强弱的矛盾而忽视其他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亡国论的错误根源。

毛泽东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第一阶段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我采取的作战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主要的是运动战，辅助的是游击战和阵地战。在敌后战场上，主要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第二阶段为战略相持阶段，即敌人停止战略进攻转入保守阵地的阶段。敌人企图组织统一的伪政权，保守占领区。但是在敌占区，人民开展广泛和猛烈的游击战争。这个阶段的游击战争是残酷的。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辅助的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相持阶段的内容就是准备反攻。这个阶段是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也是战争转变的枢纽。

第三阶段为我之反攻阶段，主要地依靠在第二阶段中所准备和在这个阶段中继续生长起来的力量，并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主要的作战方式是运动战，但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部过程。

第二，战争中的主观指导作用的问题，国内外各种关系可能变化的问题。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实际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才能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

被动。

敌强我弱,敌优势,我劣势,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敌相对的强,我相对的弱;敌处于相对的优势,我处于相对的劣势。自然,这是现实的东西。由于敌强我弱,敌向我进攻,打进我国来,敌处于进攻,我处于防御。至于大国和小国、进步和退步、多助和寡助等因素,其中有的是萌芽的东西,有的是可能的东西。要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停止敌人的进攻,并准备反攻力量,必须使敌人的有利条件化为乌有,使我国的有利条件,由萌芽的东西成为支配的东西,由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这就有赖于主观的努力。这就是主观能动性。即“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①

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方针,速战速决的方针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采取防御的方针,持久的方针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然而,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以少兵临多兵,只能占领我国的一部分领土,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我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就有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一来,在战役上和战斗上,我可能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而敌可能被动地进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我采取外线作战的速决的进攻战的方针,于是我进攻,敌防御,我在外线,敌在内线,我进行速战速决,敌企图持久待援。战场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中心是在于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在战场上,敌可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却相反,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在战场上我打了许多胜仗之后,敌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我形势将发生相反的变化，我壮大了自己，同时削弱了敌人。

在战役上和战斗上多打胜仗，集合起来，配合着我们其他有利条件，即敌人内部的变化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这就可使敌我力量对比走上平衡，再走上敌劣势我优势。“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①

毛泽东着重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游击战不仅辅助正规战，而且在长期战争中独立地进行作战，同时游击战在长期战争中也将会提高起来变为正规战。

第三，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战争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政治和人民。“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③为着抗战胜利，必须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必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论持久战》一书是当日本大举进攻武汉外围，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两种谬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发表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从理论上彻底地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② 同上。

③ 同上。

论,确定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因而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抗日人民的胜利信心,使抗日战争获得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见的正确。

四 纠正新投降主义

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争论,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深刻的反映。党内曾经出现过新的投降主义。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纲发表以后,党内投降主义者就反对这个提纲。

当时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党内新投降主义者,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来反对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第一,他们抹煞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提出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只分亲日派和抗日派的错误思想,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政策方针相对立。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①,认为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领袖”^②,认为国民党内没有法西斯派的存在。他们否定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把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们放弃了党和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他们否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所谓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在抗战、民

① 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1937年12月27日,《群众》第一卷第4期)。

②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主、民生、两党合作等问题上，对国民党只是“提出主张和建议，与之讨论”。他们反对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主张以片面的消极的让步来保持和国民党的合作，来迁就蒋介石。他们把让步看作是消极的东西，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不敢起来斗争，反而说斗争会扩大内部磨擦、影响团结，会把蒋介石从统一战线中吓跑，因而主张在各方面实行无原则的迁就。

第二，新投降主义者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主张以国民党部队作为抗日军队的骨干，并且为国民党设想了许多增强它的军队的战斗力的办法。他们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当作党的中心工作，夸大国民参政会的作用，把它当作一个民意机关。他们轻视游击战，要我们军队盲目冒险地集中起来打运动战，使国民党顽固派达到借刀杀人的阴谋。他们认为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做不出令人满意的的成绩，认为陕甘宁边区肃清贪污分子和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等是无足轻重的。他们轻视八路军和新四军，轻视根据地工作，只看见国民党军队，看不见人民军队，只看见国民党区合法运动，看不见敌后根据地斗争。这样，就不去放手地发动群众斗争，不去在日本占领区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

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他们主张国民党顽固派所要求的所谓统一。这种所谓统一的实质，是要使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合并于国民党的军队，使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合并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政府，其结果，就是解除了共产党的武装和放弃了共产党的阵地。

他们不敢胜利,对抗日前途没有信心。他们宣称,抗日战争的结局为共产党和人民的胜利,乃是一种谣言。他们看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依然是国民党继续统治,而不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实现。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丧失了信心。

包括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内部成分是十分复杂的。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集团——左翼、中间和右翼集团,这三个集团对抗日的立场和作用各不相同。区别统一战线的不同集团,对党的策略路线是极端重要的。

第一,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统一战线是以两个以上的阶级或党派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一个阶级或党派就无所谓统一战线。既是统一战线,那末,在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各党派,就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否则就不是统一,而是混一。当然,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是主要的东西,而独立性是从属的东西,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但也不能由此而抹煞独立性。因此,必须有一个为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党派所遵守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象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①

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党派的让步,应该是积极的、有原则的,而不是消极的、无原则的。党曾为了抗日而让步,即红军的改编,红色政权的改制,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停止等,这些让步

^①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都是积极的、有原则的，让了这些，争取了抗日。党是把它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来看的。正因为这样，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就不仅没有让步，并且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方针。

毛泽东驳斥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①的口号，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不许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提这个口号，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共产党同意是做不到的。如果想把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因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一切服从蒋介石。这样，只有把党和人民的行动限制于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自己束缚自己，正符合了蒋介石企图限制共产党发展的反革命要求。

第二，毛泽东批判了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确定了全党组织人民抗日战争的极端重要的方针。只有发动人民抗日的力量，才能胜利，胜利的结果才属于人民，因此必须争取党的兵权，争取人民的兵权，争取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是有极端重要性的。

因此，军事战略必须转变，即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用具有某种正规性的八路军去执行游击任务，使我们的战争同敌情和任务相适应。

^①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

这样，毛泽东从抗战一开始，即指出全党组织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并规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敌后和敌占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

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抗日战争的结局是人民的胜利抑或是国民党继续它的反动统治？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党内新投降主义者放弃党的领导权，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水平。

阶级投降主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年代里，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冒险主义或关门主义，它使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投降主义，它放弃对于一切同盟者的领导权。

两种投降主义，一种是民族投降主义，另一种是阶级投降主义。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为了坚决而有力地开展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必须反对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主义。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上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毛泽东在会议上

所作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就是这次会议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的结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同党内新投降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因而使这种错误思想在还没有发生重大危害的时候就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纠正。

五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由于我之坚强抵抗和敌人之兵力不足，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已经达到战略进攻的终点，不能再前进了。敌人的后方暴露在强大的游击军的袭击下，受到极大的威胁，而不得不回过头来保守占领区，于是，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在相持阶段初期，由于人民抗日力量的成长、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的加紧，国民党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

第一，武汉失守以后的两年中，根据地继续不断地发展起来。

晋察冀是敌后首先建立起的根据地。晋察冀区位于京汉、京绥、同蒲、正太、北宁五大铁路之间，直接威胁着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大同、张家口、承德等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

1940年8月，晋冀鲁豫各区统一起来，于是发轫于太行山的游击战争，扩大成为西起同蒲、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沧石铁路的一块广大的根据地。

1940年2月，晋绥区全区统一起来，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成为支持华北抗战和屏障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一一五师主力由山西挺进山东和地方游击队会合。1940年底，在山东几十个县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创立了鲁中区、鲁南区、渤海区、胶东区等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建立了苏南区、苏北区、皖中区、淮北区、鄂豫皖区，并成立了苏南指挥部和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南、江北的游击战争。华中根据地处于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路，北达陇海线，包括苏、浙、皖、豫、鄂各省，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徐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统帅部控制华中和准备西进的企图。

广州陷落后，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下，创立了包括东江区和琼崖区的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底，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人口发展到一百万，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十万。相持阶段的相持，实际上乃是敌后根据地人民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相持。因此，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心，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主力。

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企图借助日本来削弱、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但结果完全相反，人民力量却日益增长。解放区战场的胜利和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明显的对照，这是蒋介石当初所料想不到的。由于战争的失败和仇视共产党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更加凶恶和露骨了。

第二，战争初期，日本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它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相持局面到来之后，敌人重视共产党而轻视国民党。它把主要压力放在敌后战场，对国民党战场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即把对国民党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

1939年3月，日本政府声明：国民党政府如果重新考虑它的对日态度，和日本合作，日本准备同它进行停止敌对行为的谈判。这是在既定的征服中国的方针下，日本政府公开声明把它在

这以前所坚持的蒋介石必须下野的政策改变为引诱蒋介石投降的政策。

第三，美英法在欧洲的“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纵容侵略战争，以便从中取利。但是，法西斯国家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这个反动政策牺牲了西班牙后，又要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政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政策，是损人害己的政策。

1938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接着又要求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那时，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了苏联关于集体抵抗侵略者的建议。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交给德国。

1939年3月15日，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又准备向东欧进攻，占领波兰。苏联建议缔结英法苏三国同盟，共同保卫遭受法西斯威胁的国家。

从1939年3月到8月，英法苏三国进行谈判。但是，英法政府却不愿意和苏联缔结平等的条约，它们要苏联承担保障英法所要保障的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比利时五国安全的义务，而对保障和苏联毗邻的國家的安全，却不愿承担义务。这样的谈判，不能不宣告失败。

在和苏联谈判的同时，英法政府和希特勒德国仍然继续外交谈判。它们准备订立关于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协定，如果这个协定缔结成功，英国就拒绝给波兰以保障，把德国侵略引向东方。苏联不得不警惕被卷入挑拨者所发动的战争的危险，于是在8月23日接受德国的建议，成立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为苏维埃国家争得了一年半以上的和平时间（1939年8月23日至1941年6月21日）。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为了对付欧洲的紧张局面，美英法帝国主义策动了远东慕尼黑会议，就是1939年6月美英法三国所提议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同德意妥协。太平洋国际会议的目的是美英法三国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便和日本妥协，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到苏联方面去。

英法对德国战争爆发后，美英法三国急忙在东方寻求和日本妥协的道路，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希特勒德国，因此，就压迫中国政府向日本投降。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国民党大资产阶级亲日派汪精卫集团，首先公开投敌。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在河内响应日本政府的声明。不久就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从此，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成为人民的公敌。

国民党大资产阶级亲美派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危险也达到了顶点。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声明：“抗战到底”。所谓“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只要日本保存四大家族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的利益和统治，蒋介石集团就正式投敌卖国。

蒋介石集团为了清除投降道路上的障碍，集中全力反共反人民，为投敌进行准备。因为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是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顽固派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因为内战一开，抗日自然不可能，结果，必然要同日本订立投降的条约。

蒋介石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首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决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等，并决定向抗日根据地举行军事进攻。

在这些反动文件中，国民党顽固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华北根据地一切抗日的军政组织。顽固派要在陕甘宁和华北根据地建立反共据点和施行保甲制度。他们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北和华北，在政治、军事、经济、民运、宣传等方面，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加以限制、破坏和消灭。

这些反动计划见之于行动，就是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撤到以重庆、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和西北，避开和日本作战，并同日本进行公开投降谈判。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达到了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主要地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山西省西部和东南部。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侵占了我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在山西省西部，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抗日决死队和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进攻。1940年春，蒋介石命令朱怀冰部队袭击太行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保卫和扩大抗日阵地，在1939年7月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倾向和妥协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决自卫原则，对反动派的进攻，给以严重

的还击。国民党反共军队向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被我军击溃。阎锡山旧军进攻山西新军，新军给阎锡山以重大打击，然后转移到山西省西北部。在太行区，八路军消灭了朱怀冰三个师。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各地反共军队土崩瓦解了。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向人民展开了进攻，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进攻。国民党叫嚣“一个党、一个主义”，叫嚣“基马尔主义”，叫嚣“资产阶级专政”等反动口号，为取消共产党、维护国民党反动政权制造借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迫切问题了。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出发，说明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毛泽东严厉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在资本主义死亡和社会主义兴盛的时代，要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对行不通的。毛泽东指出了企图扮演基马尔角色的蒋介石自从背叛革命后，不是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仍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可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彻底地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当长的。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革命是谈不到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时间,因此,不能把必须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中去完成。两个革命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这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转变。“一次革命论”是“偷梁换柱”,是不要革命的反动言论。

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政策。

第一,在政治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第二,在经济上没收垄断的大银行、大企业,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发展有利于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企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吸取外国的进步文化来丰富我国文化的内容。但是,反对生吞活剥地抄袭外国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对文化遗产,既不容许采取粗暴的态度加以否定,也不容许毫无批判地什么都加以接受,必须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舍弃其封建性的糟粕,才能创造我国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当属于人民大众的,首先应当为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这是它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向全国人民说明了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观点，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武装了党和人民。

六 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的反共危险仍然存在。但是，由于日本深入国土，全国人民都主张团结抗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要实现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四〇年三月，毛泽东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十二月，发出《论政策》的指示，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政策。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努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在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抗日人民政权。在国民党区尽可能发动群众运动，要求国民党承认抗日党派和抗日团体的合法地位。进步力量是统一战线中的基本力量，只有逐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才能阻止顽固派的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巩固的基础。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是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和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可以参加或保持中立。地方实力派，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可以共同抗日，但不能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对顽固派斗争中也只能采取暂时的中立的立场。中间派的态度是动摇的，顽固派也竭力在争取他们。他们往往可以成为决定共产党和顽固派斗争胜负的因素，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有效的办法。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他们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一面在抗日，一面又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日本的准备步骤。在抗日问题上，既抗日，但又不积极抗日，在反共问题上，既反共，但又不敢完全分裂。这样，我们就必须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他们抗日和不敢实行全面分裂的一面，采取联合的政策，争取他们较久地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对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一面，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即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才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使顽固派孤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中，避免大规模内战发生。但是，在顽固派还没有公开投敌之前，对他们的斗争，必须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必须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就是每一次具体的斗争先要有理；还要在形势对我有利，并有胜利把握的时候才斗；斗争不是无止境地斗下去，要适可而止。

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着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可能，并准备一切力量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至在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

这种突然事变后来果然发生了，这就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

当时，国际局势更加紧张。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横行到了极点，1940年4月，纳粹军队占领了丹麦和挪威，接着侵入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5月，他们开始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日本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互相呼应，北攻苏联，南取南洋。因此，加紧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它策动中国内部的分裂，企图掀起国共战争，借以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在国际上，德意日三国联盟成立后，英美苏都在财政上军火上增强援华抗日的力量，蒋介石认为国际形势对它有利，反共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在国内，蒋介石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问题所采取的顾全大局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为可欺，认为不敢和他们决裂，他们想逼迫共产党让步，或者把共产党各个击破。这时，蒋介石认为大规模的反共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准备发动全面战争，以便经过反共战争达到和日本妥协的目的。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新四军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命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其目的，是要从华中调开抗日人民军队，在那里拔掉日本的眼中钉，并准备乘我们军队在移动和无准备的状态中，来一个突然的袭击。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引起全国人民的警惕。1940年11月9日

朱、彭、叶、项致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的通电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①“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坚持抗战，仍然答应新四军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地和敌人战斗了七昼夜，终于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加上仓促应战，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害。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实现后，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公开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并杰出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坚决的反击。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②，揭露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大阴谋的第一步，接着他们将要准备进攻江北新四军，准备取消八路军番号，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共产党组织。他们作了这一系列反动行为以后，日本就答应从华中、华南撤退，让国民党军队接防，然后日本集中力量于华北，进攻八路军。而这一切得手后，国民党即宣布加入德意日三国反共同盟。中国共产党中央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反共逆潮。

①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1940年11月9日，〈六大以来〉上）。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41年1月22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继续领导分布于华中、华东的九万军队，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将新四军改编为七个师，活动于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赣湘、苏南、皖中等区。

这些革命的措施，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计划，并使新四军的主力，比在皖南事变以前更为巩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为了解决皖南事变，中共中央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祸首，废止一党专政等十二项要求。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针锋相对的态度，使顽固派不得不考虑到全国分裂的危险。

这次事变后，国民党民主派斥责了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各民主党派所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皖南事变后成立的。有些地方实力派也不满蒋介石这种消灭异己的行动。顽固派内部也发生纷争。全国最大多数中间派和进步人士都站在团结立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措施。

这次事变后，在美英两国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美英两国政府都不愿意国民党发动内战，放松抗日。苏联援华的力量和态度，使顽固派不得不慎重考虑。

皖南事变爆发后，日本逼迫国民党立即投降，但它还没有投降，所以，日本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国民党在华中举行“剿共”的军队遭到日本军队的“扫荡”。

国内国外的形势迫使顽固派不得不暂时收敛他的反共气焰。

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后，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孤立地位，于

是，又玩弄两面手腕，宣传“国防”“对外”的重要，诡称党派的经营理念已经陈旧了，而把自己说成仿佛是“民族领袖”，装作超党派的样子，来进行政治欺骗。

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上有严重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抗日人民方面的重大变化。

皖南事变前，1940年5月，中共中央明确地指示东南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中央指出在敌后，不应当强调特殊性，而应当强调同一性。同一性，就是不论华北、华中、华南，都有敌人，都在抗战，因而都能够发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不应当强调统一性，而应当强调斗争性。对顽固派一切反共政策，不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项英本人没有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终于使新四军部队在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而项英本人也因此被反动派所杀害。

皖南事变后，党内一部分具有“左”倾思想的同志认为这次事变是过去“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的重演。他们在和顽固派的反动进攻进行自卫斗争的时候，忘记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点，他们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者很快就要破裂，因而在抵抗顽固派的进攻时，以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同时不加以区别地把国民党都看成是顽固派，不注意团结中间势力，忽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过重地打击了地主。“左”的情绪成为当时党内有些同志的主要倾向。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经验证明：当蒋介石集团倒行

逆施，掀起反共内战，为投敌准备的时候，必须坚决斗争，不怕分裂。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左派，团结中派，更加孤立顽固派。同时还证明：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忘记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的“左”倾情绪都是错误的。只有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才能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统一起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胜利。

第九章 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

(1941年1月至1942年12月)

一 人民抗日战争的困难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始终不懈地捍卫世界和平,并号召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防止新的战争发生,但是,这些国家不但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企图引导法西斯来反对苏联。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和其他国家爱好和平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1940年到1941年,希特勒德国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当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落在德国法西斯铁蹄下的时候,希特勒就准备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地进犯苏联。

这次战争是在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德国军队在战争初期得以占领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

英美两国政府在它们同德意法西斯的矛盾和人民压力下不得不同苏联缔结联盟。1941年7月,英苏订立了共同对德作战协定,1942年6月,美苏也订立了对德作战的互助协定。

苏联军队同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歼灭它的有生力量，消耗它的装备。在苏联后方，又积蓄着强大的后备力量，来打击法西斯侵略者。在苏联许多城市周围，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其中最英勇的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保卫战，苏联红军保卫住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粉碎了希特勒的“闪击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港一带的美国海军根据地，击毁了美国主力舰若干艘，同时，发动对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进攻。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4月，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包括东起中途岛，西迄印度东岸，北邻西伯利亚，南迄澳洲北岸的广大地区。英美法荷帝国主义过去一百多年在这一片海洋大陆和岛屿上所占领的殖民地，全部落在日本手里。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法西斯阵营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政策是企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以便扩大它的冒险政策。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加紧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日本把华北、华中分为三种地区：所谓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敌人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用圈村办法，实行大编乡，企图肃清内部抗日分子，加强对人民的搜刮和镇压。对游击区，敌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对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最野蛮的“三光政策”、“梳篦清剿”等等。日本作战的对象包括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机关、壮丁以及一切老弱妇孺，连粮食、衣服、牲畜、工具、水利等，都成为日本掠夺

破坏和烧杀的目标。日本实行这些办法的总目的，是要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1941年和1942年，敌人对华北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每次使用兵力在一千人以上，有一七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总兵力有八十三万三千九百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日本普遍地修筑碉堡、封锁沟（沟宽达一丈五尺）和封锁墙（墙高达一丈五尺）。到1944年，敌人在华北解放区内八十三万平方公里、有八千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上，除铁路公路外，即已修筑了一万多个据点，三万多个碉堡，一万多公里封锁沟，六百多公里封锁墙。

日本对国民党顽固派继续采取以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就是：着重于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是：采取诱降和威迫相辅而行的方针，在和平谈判不成时，接着就用军事压迫。

敌后国民党军队，由于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人的“扫荡”。1941年，国民党军队溃败于中条山，1942年溃败于浙赣间，1943年溃败于山东。

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本侵略者搏斗时，蒋介石除用大军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地区外，又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指使其部队投降日本，以便明目张胆地打起反共的旗帜，协同敌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其目的是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他就可以完全投降敌人；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他就让投敌的军队重新占领那些原为日本所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攫取胜利果实。蒋介石把这个卖国通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无耻地名之为“曲线救国”。当时，在“曲线救国”这个名义下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达

到了五十万人，占伪军八十万人的62%。国民党的二十个中央委员和五十八个高级将领，都先后投敌了。这些投敌的军队变为伪军以后，就马上跟随着日本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扫荡”。因此，抗日根据地不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还得抵抗伪军和蒋介石的反共军。

在敌伪军队和国民党反共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夹击下，八路军由1940年的四十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三十万三千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也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1941年和1942年，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处于军民交困的严重局面。

二 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展开了对敌斗争。为了胜利地进行对敌斗争，必须充分发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和伟大力量，进一步展开全民的革命战争。

党在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在民主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即规定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各占三分之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方针的出发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①

^①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抗日民主政权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地主减租减息，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得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农民交租交息。既承认地主的地权，又承认农民的佃权。

抗日民主政权的劳动政策，一方面，必须既适当地改良工人生活，并规定劳动时间；同时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流通，达到经济自给，一方面，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另一方面，奖励民营企业，并吸引外地资本家来根据地开办实业。

抗日民主政权的税收政策，是按收入多少来规定纳税的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除最贫苦者应当免征外，都要负担国家赋税，纳税人口，应占80%以上。

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治权利上，规定抗日的资本家和地主，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权、政权、财权，同时又要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活动。

这些政策就是要调动一切抗日力量，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目标上。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进行普选，成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府。1941年，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

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建立后，就成立了村代表会和县议会。晋察冀边区1940年普选中，选民占公民70%以上。1941年至1942年，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参议会，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成立于1941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成立于1943年1月。参议会讨论和颁布了各边区施政纲领，制定了各种基本法令。参议会

是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机关，它有权选举政府，创制法律。共产党坚决约束自己的党员，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

正当对敌斗争紧张的年月，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其目的就是要克服曾经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妨碍党贯彻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整风运动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统一的巩固的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党员由几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成为当时全国第二个大党。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统一的、巩固的。在思想上，党学会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政治上，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就是整风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状况。

但是，当时党内还存在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问题还相当严重。因为党处于农村环境，被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所包围，不能不经常受到他们的影响。资产阶级也通过种种方法来影响党。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共产党不单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因此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了多数。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

子，必然地通过种种方法，用他们原来的世界观来影响党，甚至想用它来改造党。于是，形成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是当时党内的严重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去改造他们。

从党的历史来看，党以前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虽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被纠正，但它的错误思想并没有被清算，虽然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揭露过它的思想错误，但还没有在全党进行清算，特别是1931年以来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因此，展开马克思主义同主观主义之间的斗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党的建设上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这次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反对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文风中的党八股倾向。

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

学风问题就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整顿学风就是教育全党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运动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主观主义有两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轻视实际，从书本出发，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们都是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去指导革命，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政治上的

“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所以，在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就便于在政治上彻底清算和防止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毛泽东用“有的放矢”四个字形象地说明了全党所应当采取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学习，然后才可以不停止于书本子上，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向理论方面学习，然后才可以使经验上升为理论，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

主观主义在政治生活上和组织上表现为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对党闹独立性，忽视集体利益。当时，党内虽然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已经不存在了，但它的残余仍然存在，特别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和小资产阶级的强大突出地表现为山头主义。

宗派主义不把党的领导机关作为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使党的领导机关脱离党员群众。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即党的路线、策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集中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必须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

由于党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地区、性质上的不同，于是发生新干部同老干部、本地干部同外来干部、军队干部同地方干部、这个部分干部同那个部分干部、这个地区干部同那个地区干部之间的问题，在各种干部之间，必须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必须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全党和整个革命内部的团结，保证组织上的统一，反对互相轻视，闹无原则纠纷。

对于一切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以及可能同共产党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反对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否则，就会脱离人民群众使自己孤立，妨碍党的路线的实行。

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

中国封建时代的八股文章是一种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游戏。这种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教条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五四运动反对这种旧八股旧教条，这是前进的、革命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批判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这是一条道路。另外一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问题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因而在反对旧八股的同时，发生和发展了洋八股。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有一部分人，马克思主义拿不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也发展了党八股。这种党八股、洋八股，长期地在革命文化队伍中存在，流毒全党。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中了党八股的毒害的人写文章对事物不加分析，只生吞活剥地搬用一些革命名词和术语。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这种党八股不但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反而使革命精神非常容易窒息。

写文章，做演说，反对空话连篇，反对罗列现象，反对语言无味，反对无的放矢，反对装样子吓人等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只有这种文风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广泛地传播出去，深入人

心,使革命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

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方针是,对于由认识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着重思想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即采取“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思想一定要揭发,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批判,去掉人们思想上的坏东西,提高思想水平,治病救人就是必须认真团结同志,对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和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而加入共产党的人,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即使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们不坚持错误,也不应当采取个人打击的态度,应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思想问题,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扫除了党内自1931年以来教条主义的影响,帮助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原有立场,使全党的思想水平大为提高,使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达到了从来未有的大团结。这就保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各方面贯彻下去,从而使我们能够并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毛泽东所倡导的整风运动这种适合于党内斗争的方式,是他一贯强调的思想建党的方式,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和重大贡献。整风运动把党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必须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必

须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这个时期,为了克服由日伪和国民党的进攻和封锁而造成的经济上和财政上的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和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结果,既减少了脱离生产的人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又缩小了我们的战争机构,更加轻快敏捷地和敌人战斗。因而,克服了战争机构和战争情况之间已经发生的严重矛盾,使它和战争情况相适应,更显得有力。

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所写《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各根据地进行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各根据地经济问题的方针是发展的方针,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是财政供给的根本保障。因此,中共中央在经济问题上既反对不去发展经济而企图从收缩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反对不顾具体环境而空喊不切实际的大生产计划的冒险观点。

在这个总方针下,第一,考虑到根据地处于个体经济为主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必须开展以农业为主同时也发展其他生产事业的大生产运动。要求军队、机关和学校,自己动手、自力更生,逐步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大部或一部自给。

第二,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援革命战争,必须发展人民经济。党政军必须从各方面大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首先普遍地

深入地进行减租减息,然后,把一切劳动力组织起来,经过互助组、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力。

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以改善生活为主的军队机关生产,开始于1938年;以自给为主的军队机关生产,开始于1941年。敌后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于1942年,到1943年就发展成为普遍的运动。

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粮食收获量,1938年为一百三十万石,1942年为一百六十八万石。1942年,公私企业年产土布十万匹。日本投降前,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可以炼油,炼铁,修造机器,配装军需品;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和陶器。纺织工业生产十九万匹布。全部职工一万多人。

部队和机关学校的粮食,1942年主要取给于人民,到1943年后,自给一部分。副食品、办公费和军队装备用费,大部分自给。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由于精兵简政和部队机关开展生产运动的结果,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东六个地区,就扩大耕地六百万亩以上。机关部队一般可以自给两、三个月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

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打击了敌伪和国民党的摧残、掠夺和封锁,保护和发展的根据地的物资和生产。

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人民抗日战争度过严重困难的中心环节。

三 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方针

由于实行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实行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就更有效地展开了对敌斗争。

在根据地，针对着敌人的“扫荡”政策，我们采取了反“扫荡”政策。

军队和人民形成一体，正规军、游击队和广大的民兵，结合起来。在敌人每次进攻初期，我们“化整为零”，待机破敌，或转移到敌后，去袭击敌人。当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我们又“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军的一路。人民使用自己在战争中所创造出来的地道战、地雷战等，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使敌人处处挨打，时时胆战心惊。

在游击区，针对着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采取了反“蚕食”政策。

对敌人点线的正面，我组织联防线，在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时，打烂敌人“蚕食”的嘴。如果敌人深入到根据地内扎下了据点，我们就围困敌人，一直到把他们撵走。在敌人点线后面，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区，使敌腹背受敌，穷于对付。

在敌占区，针对着敌人的“清乡”政策，我们采取了反“清乡”政策。

我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之敌后前进。组织武装工作队，越过敌人的封锁，深入到敌占区去。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的一元化的组织，也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武装工作队的活动是神出鬼没的。敌人据点突然来了我方工作人员的电话，居民房顶上突然响起了我方工作人员的

话筒喊话，伪军家属家里突然来了不速之客。在敌占区，我武装工作队巧妙地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各种斗争，打碎敌伪的统治机构，使敌人抓丁、抢粮、“开发”、奴役等计划归于失败，并向敌伪组织进行政治宣传，使他们分化、瓦解或中立，以便孤立敌人。

武装工作队在敌人的“心脏”里，出没无常，人民随时可以找到它，敌人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这样我们不但有大块完整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敌人的巢穴里有许多小块的抗日基地。敌人要割裂我们，反为我们所割裂。敌人的治安区，永远无法巩固。

这些办法是互相配合的。采取这些办法就能够粉碎敌人“扫荡”、“蚕食”、“清乡”的政策，使我们在极端困难中站稳脚跟和度过难关。

这样，各个敌后根据地都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英勇斗争。

1941年8月，敌人集中十三万军队，向晋察冀区进攻，企图把我军主力围歼于长城两侧。我军主力适时地转移到敌人的后方，无数游击队和民兵到处困扰和阻击敌人。待敌分股“清剿”而感到疲困时，我外线部队转戈回击，配合内线部队夹攻敌人。为了配合晋察冀区的反“扫荡”战争，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进行了有力的协同作战。9月，敌军主力撤退，残敌留在我区内，我军以一部分兵力在内线作战，打击残敌，主力挺进敌区，袭击敌人据点，切断敌人归路，使内线敌军陷于被歼的危险，只得在十月中旬退走。

1942年，敌人对华北所进行的最残酷的“扫荡”是5月1日

开始的冀中平原大“扫荡”，敌人在冀中地区密布一千五百多个据点，经常使用几百辆汽车巡逻。我冀中部队当敌人合击时及早转移到敌人的腹地和铁路线，进行突然袭击，使敌人不得不后撤援救。当战役后期敌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向外围大转移，一部分留在当地，分散成小部队，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进行战斗。这次“扫荡”，敌人实行极端残酷的“三光政策”，冀中有五万群众被杀或被捕。我全体军民英勇斗争，苦战两月，终于击退了全部敌军。

1943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人使用四万多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所谓“毁灭扫荡”。在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敌人进据我中心区，分散兵力，进行反复“清剿”，我军集中适当力量去打击分散的敌人，逼迫敌人不得不结集力量以对付我。第二阶段中，敌人盘据滹沱河抢掠粮食，我军在河流两岸出击，用大量兵力配合民兵，夺回粮食。第三阶段中，敌人奔袭我后方机关，但是，我区经过精兵简政后，后方机关已经简化精干，行动灵活，既便于同敌人作战，也便于转移，使敌人到处扑空。

在这次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我采取主力和民兵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反“扫荡”和政治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我主力部队和广大民兵始终密切配合作战。当我区内地斗争激烈的时候，外线我军深入到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我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展开政治宣传，引起伪军伪组织的普遍动摇。由于我们运用了各种斗争方式，敌人这一次大“扫荡”被打退了。

1941年，敌军围攻我晋冀鲁豫区晋东南黄烟洞修械所，我军以少数兵力击败优势敌人。

1942年6月，敌军三万人“扫荡”晋东南区，我军在反“扫

荡”中击毙敌军五千多人。

1943年10月到11月，敌人二万人“扫荡”太岳区。敌人把兵力集中于纵深的一线上，由北向南然后又由南向北反复“扫荡”。敌人所到的地方，杀尽人畜，毁灭和抢掠一切资财。敌人这一次“扫荡”的目的不仅要毁灭我太岳根据地，并且企图取得经验指导各地敌军对我作战。

敌人从各地调集军官、参谋到太岳现地观战。10月23日，敌观察团遭我军伏击，全部被歼，接着各路敌军也被击退。

敌人把它在华北所用的“扫荡”“蚕食”“清乡”政策，同样用在华中区来对付我新四军。

敌人的进攻开始于苏北。1941年7月，敌伪二万五千人合击盐城、阜宁，企图消灭我新四军军部和苏北主力。新四军一开始就及时地跳出合击圈，在外线袭击敌人背后，苏中我军配合作战，敌军被迫向南撤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我华中采取了极端残酷的“一元化清乡政策”。敌伪把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攻的办法都搬了出来。他们在华中地区划出“清乡区”，先从苏南开始，逐渐扩张到苏中、皖中和武汉近郊。敌人用强大兵力占领我们一个地区，接着编造几百里长的竹篱木栅，使“清乡区”和其他地区相隔离，然后挨村挨户搜查，企图把新四军干部和战士清查出来。

新四军的斗争方针是：第一，当敌人集中力量对我一个地区进行“清乡”时，我所有各区就进行全面出击，扰乱敌人后方。第二，在敌“清乡区”，我主力转移出来向敌人后方或侧翼进攻，或者动员广大群众在一个晚上把敌人的封锁木栅烧毁或拔掉。

在反“蚕食”方面，敌人依靠原有据点逐渐向我区推进，我军

加强边缘区的防御，挖掘地道，用土涂房，然后全村撤退。在敌人的前进道路上，我军不断出击和到处埋下地雷等等，使敌遭受重大伤亡，而不敢贸然前进。

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无数次残酷进攻，使根据地屹立不动，扭转了它的困难局面，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 对敌斗争中的民兵

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对敌斗争是人民战争，军队和人民协同作战，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协同作战。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建立起人民武装——人民自卫队。在抗战初期，人民自卫队一方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一方面协助军队，担任战时勤务。

由1941年至1943年，日本在敌后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华北区更有持续几个月的长期的毁灭性的“扫荡”。因此，敌我的斗争就由大块土地的争夺到小块土地的争夺，打仗的方式，由摆开阵势，你进我退，到短兵相接，互相扭打。这样，我正规部队就不能不机动转移，争取歼灭敌人的时机。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前担任战时勤务的人民自卫队，其中一部分参加了民兵，来担任战斗的任务。

在抗日时期，根据地民兵有二百五十万。民兵的发展，在工作深入和人口稠密的地区，达到人口8%。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关——人民武装委员会，并且在它的领导下成为统一的战斗组织。民兵是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有力的助手，有了民兵，敌后游击战争，就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民兵在反“扫荡”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民兵日常的战斗生活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放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侦探一直派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民兵有时候还突然宣布戒严，进行检查，捉拿敌探汉奸。民兵的侦察警戒工作，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民兵领导居民进行空室清野，把粮食、柴草和一切非日用品都埋藏起来。

敌人出动时，往往先遇着民兵。民兵担任前哨作战或配合作战，使正规军队的威力充分地发挥起来。他们实行高度的分散，随时随地杀伤敌人。敌人遭受了民兵的截击，不能按时到达合击地点进行作战。待敌人精疲力竭实行撤退的时候，各村联防的民兵就漫山遍野地截击敌人。

民兵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是地雷战。反“扫荡”中，在边缘区，在中心区，在道旁，在村口，在山顶上，在小沟里，到处都有民兵埋下的地雷。地雷布成了进攻阵地，使敌人到处都有死亡的危险。

民兵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也很重要。

敌人“蚕食”政策就是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把抗日根据地割裂起来，然后进行“清剿”和“扫荡”。因此，破坏交通，拆平碉堡，毁灭墙沟，是我反“蚕食”的极重要工作。

大规模的破击战，主要是民兵和正规军配合进行的。正规军袭击敌人据点，使敌人不敢出动，民兵担任掩护，使群众放手破路。

对敌的交通战，一方面破坏敌人的交通，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交通。在平原地区，民兵带领群众，把道路挖成地沟，完全改造

了地形。敌人的快速部队在地沟不能行进，但它却可以掩护我军民的转移。破坏敌人交通，修理抗日道沟，成为民兵直接参加战斗的基本任务。

民兵展开了比道沟斗争更为严重的地道斗争。在平原地区，地道在村、区、县之间都连接起来，几百里幅员，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在山岳地区，民兵在山沟里开凿山连着山的窑洞地道。把平地挖通，把山峰凿穿，只有广大群众才能有这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和创造。

对敌人用来围困我区的星罗棋布的据点，我就用反围困来对付，把敌人据点围困起来。敌人要挤进我根据地来插下几个钉子，我们就拔掉它。在围困敌人的斗争中，民兵由外线到内线去围困，日以继夜地去扰乱，把敌人挤出去。

民兵在反“清乡”斗争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到敌后之敌后去是反“清乡”的基本方针。在民兵战斗力量日益增长的条件下，他们单独地到敌占区去逮捕敌探汉奸，摧毁敌伪组织。我在敌占区还有秘密的人民武装——秘密的民兵，在那里活动。他们的组织绝对秘密，或者隐蔽在合法的伪组织里。他们秘密地进行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敌探，使这些人有所畏惧。他们调查敌区情况，召开群众大会。他们配合着在敌区的武装工作队进行各种反日斗争。

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却不能占有我们的人民，更不能占有民心。秘密民兵是我们在敌占区建立据点，维系人心，打击敌伪的一支基本力量。有了坚强的秘密民兵，配合武装工作队，我们就能够在敌后之敌后建立起隐蔽的抗日根据地来。

民兵在生产斗争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为了粉碎敌人企图毁灭我区的“三光政策”，我们一面要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一面也要减轻民负，增加生产。战争和生产是不可偏废的。战争保卫生产，生产又支援战争。敌后民兵斗争的特色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成立民兵和群众组成的劳动互助组，把生产斗争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民兵参加了互助组，不打仗时就和群众共同生产，打仗时也按时计工。

为了适应敌后战争环境，民兵参加互助组这种方式，不断得到新的创造和发展。第一，把变工和爆炸结合起来，每个劳动互助组里都有民兵在指导群众学习地雷战，实现了全民皆兵的口号。第二，成立生产战斗统一指挥部，把战时指挥部和生产大队合并起来，在组织领导上解决了生产和战斗相结合的问题。第三，组织联防线，即根据自然地形和战斗的需要由数村民兵共同订立联防公约，一村有事，数村增援，合力围攻敌人。

在抗日战争中民兵和人民自卫队自始至终协同正规部队和游击队作战，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以至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十章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

一 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根本转变。

由于英美当权人物竭力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德国把后备力量及其同盟国的军队，调到苏德战场的西南战线来。德国军队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推进，企图从东方来包抄莫斯科。

苏联首先疲惫和削弱德国军队，然后包围它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全部突击部队。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会战，苏联军队消灭了德国军队三十三万，获得完全的胜利。

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1月这一年内，苏联收复了将近三分之二被敌人所占领的苏维埃国土。

1944年，苏联把德国军队完全赶出苏联国境，并把战线转移到德国境内。

希特勒德国的溃败，使法西斯同盟瓦解，首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被推翻，意大利退出了战争。在1944年内，苏联军

队击溃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欧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汇合了起来。

苏联的胜利迫使英美不得不在1944年6月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虽然开辟了，德国军队的主力依然留在苏德战场上。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东方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孤立了日本，造成了中国人民反攻的有利的国际条件，对我国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敌占区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成立了伪政权。除了“蒙疆自治政府”外，敌人在华北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在南京成立了“维新政府”。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从敌占区搜刮物资，敌人把一切汉奸组织合成为“统一政府”，这就是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在南京所成立的“国民政府”。在这个伪政府成立之前，1939年底，汪精卫集团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一个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承认把东北割让于日本；承认日本军队长期占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承认由日本顾问监督伪政权；承认由日本军官训练伪军伪警；承认由日本控制伪政府财政经济等等。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的同时，还成立了另一个国民党。汪精卫国民党也扬言要实行“三民主义”。它的“民族主义”，即大日本主义或以日本为主体的大亚洲主义，寡廉鲜耻地宣称日本是亚洲的盟主，中国是日本的附属国。这是汉奸的民族投降主义。它的“民权主义”逼迫敌占区人民无条件地服从敌伪法西

斯的统治。它的“民生主义”强制敌占区人民以“铢积寸累”的精神来“发展”伪政权的“国家资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伪政权又发起所谓“新国民运动”，要敌占区人民“舍身救世”和“劳身焦思”，就是在敌伪统治下，老百姓要献出自己的一切。

日本侵略者在敌占区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

战争初期，敌人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占区采取了直接掠夺方式，不是实行军事管制，就是实行委任管制，摧毁了一切生产事业。为了“以战养战”，敌人实行所谓“中日合作”，由“华北开发会社”、“华中振兴会社”等吸收汉奸资本，进一步掠夺我国物资。

由1936年到1938年，日本在华北、华中占领区掠夺中国纱厂的纱锭有一百三十三万多锭。华北、华中敌占区的棉纱、棉布以及面粉、卷烟的生产总额逐年下降。

日本在关内占领区残酷地掠夺土地。有的用武装直接霸占，有的用敌伪组织名义进行没收，有的用低价强迫收买。敌人在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周围建筑封锁沟和封锁墙所用的土地，是用武力强占的。敌人为了增种棉花、粮食而设置的农业公司和农场等所用的土地，是用敌伪名义进行没收或用贱价收买的。农民和一般地主同样被驱逐，留下来的农民实际上乃是敌人垦殖公司的农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伪法西斯暴政之下，敌占城市和乡村的反日运动，比过去时期，更加扩大和更加深入。敌伪自称为“清乡中心区”的常熟、无锡、江阴一带农民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中国米市著名的芜湖的十万饥民举行暴动。青岛、太原、天津、北平等城市不断发生市民抢米事件。在华北各省，接近抗

日根据地的敌占区人民，一方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一方面组织地下军，为八路军侦察敌情，保护人民财产，并协同八路军作战。上海是敌伪在华中的心脏地带。上海失业人数有一百万，连家属在内，占全市人口半数以上。上海人力车夫举行大罢工，小学教员举行罢课，产业工人举行怠工、罢工斗争。敌占区铁路工人，经常采用怠工、破坏机器、搬走物资等方法，反抗敌伪统治。

中国东北是日本侵华的后方基地和反苏的前哨阵地，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这个基地，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加紧剥夺和压迫。

日本掠夺中国铁砂由 1939 年的四，五〇二，二二二吨到 1943 年的一〇，六五四，五二五吨；生铁由 1938 年的八六八，四八五吨增到 1943 年的一，八一八，五一七吨；煤炭由 1938 年的二七，四五一，九六八吨增到 1943 年的五〇，〇七五，一四一吨。日本在东北的“企业公司”每年获得暴利三亿元。这是无数东北人民的血汗所化成的财富。

日本在东北强占土地一千万顷，占可耕地四分之一。1943 年以后，日本每年在东北抢夺一千万吨粮食，抓壮丁、服苦役的有几百万人。

日本在抗日游击区烧毁小屯子，制造无人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进行轮番的“扫荡”。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入深山密林里，坚持抗战到底。其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小部队，分散在北满、延边、辽吉边界等地，侦察敌情、联络群众、宣传抗日，并在可能条件下，组织地下武装。东北抗日联军从敌人背后侧击，配合了关内的抗战。

总括起来说，1943 年至 1944 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中

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占区人民到处掀起了反日浪潮，动摇了敌伪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从1944年起，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局部的反攻。华北的山东区、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华中的苏北区、苏南区、淮北区、鄂豫皖区，华南的东江区和海南区，都进行了局部的反攻。

在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同敌伪作战二万多次，毙伤敌伪军队二十六万多人，俘敌伪六万多人，争取伪军三万人反正，收复县城十六个，攻克据点五千多处，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

二 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当抗日根据地正在恢复和发展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在地区上，西南部和西北部各省较东南各省更为落后。抗战爆发后，沿海工业开始内迁。由抗战爆发起到1940年止是中国第一次工业移动的时期，除战区工厂向内地迁移以外，西南西北各省新建的工厂为数也不少。这些内迁和新建的工厂以四川为最多，其次是湖南、陕西、广西、云南等省。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有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在国民党顽固派手里都没有发挥它的抗日作用，它不是用来增强抗日的力量而是当作残酷搜刮的对象，当作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来源。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抗日时期得到了迅

速的膨胀。它利用了抗日的招牌，用超经济的极端野蛮的掠夺方法，集中了全国更大量的财富。

抗日时期中，四行联合办事处是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垄断组织，这个组织利用所谓“法币”来搜刮和独占。抗日时期，国民党政府发行了十万三千一百八十亿元“法币”，人民被迫接受毫无价值的“法币”，而交出物资和财富。“法币”是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人民和垄断金融的主要手段。

抗日时期中，四大家族把金融垄断变为商业垄断。四大银行在战时的业务是商业投机，商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占极大的数量，而工矿业放款却微不足道。1937年到1942年，四行工矿业放款只占19.7%，而商业放款占80.3%。贸易委员会是四大家族官办的垄断商业的组织，此外，还有四大家族私办的商业组织。它们对生丝、茶叶、桐油、猪鬃、钨、锑等出口品，实行统售统购，对棉花、棉纱、棉布以及食盐、食糖、卷烟、火柴等日用品，实行专卖制度。它们用贱买贵卖的野蛮方法，在买的方面掠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应得的利益，在卖的方面，又掠夺了全社会的消费者。

抗日时期中，工矿调整委员会是四大家族垄断工业的组织，垄断的方式是援助官办工业和吞并民营工业。四大家族官办工业的两大系统是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此外还有四大家族的私营工业。1945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垄断的重工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占的比例是：煤11.9%，电35.9%，铁矿82.6%（1934年），生铁46.5%，钢56%，其他汽油、煤油、铁砂、锑、锡等，占100%。官僚工业在资本、动力和生产方面，垄断一切（官僚资本占全部资本70%左右）。四大家族在工业上的垄断，绞

杀了民族工商业。

抗日时期，四大家族在农业方面，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和高利贷主。田赋征实是四大家族最残酷的掠夺形式。田赋征实的负担，在四川省，占农产收获量50%以上。这个负担，完全落在农民身上。四大家族的农民银行代替了旧时农村高利贷的地位。四大家族的农贷是高利贷性质的，因为农贷期限为一年，农民在春荒借款时，谷物昂贵，到秋收后，还款期近，农产品价格大跌，使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农贷放款先给农村高利贷者再转放给农民。四大家族一方面从金融方面吮吸农民的血液，另一方面又扶植农村中的封建统治势力。

中国官僚资本，在抗日时期，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经济，集中了全国更大量的财富。它彻底地破坏和摧残了中国生产事业。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达到了腐朽的顶点。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和消极的抗日政策的总根源，也是它在政治上坚持独裁、绞杀民主和在军事上对日本消极作战的总根源。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变的前夜。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打击人民力量，并准备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次反共高潮之前，蒋介石进行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一本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伪造和涂改了中国历史，贩卖了反革命的法西斯毒素。蒋介石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就是说，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另外，趁着共产国际解散的

时候，蒋介石指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务分子，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解散共产党”。

蒋介石经过各方面的酝酿和准备，1943年6月底，调动国民党黄河河防军队到陕甘宁边区周围。7月7日，国民党军队开始炮击陕甘宁边区，并准备夺取延安。中共中央揭露了蒋介石调动河防军队和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反动企图，并发出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陕甘宁和各解放区军民开会、示威，准备反击。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事前的揭露和声讨，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反革命政策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得被迫停止。

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转变，对日本是极为不利的。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帮助了英美军队，使他们有可能抽调一部分到太平洋方面来，发动对日本的越岛进攻。根据地的胜利的出击，增加了日本的困难。日本当时企图打通从北京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一方面，把中国大陆上和孤悬于南洋的日本军队联络起来，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将来在中国大陆上作战。这样，1944年日本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即豫湘桂战役。

1944年3月，日本首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5月，向湖南省北部进攻，8月，向湖南省南部进攻。到12月2日，日本军队一直打到贵州，占领独山。在短短八个月中，敌人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打通了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五、六十万人，丢失了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抛弃了居民六千多万。国民党又一次的慌乱惊人的大溃败，使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

国民党军队如此腐败无能，这是由于实行其反动政策的结果。

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统治在经济上的掠夺、在政治上的反动和在军事上的失败，再也不能忍受了。人民痛切地感觉到要缩短战争时间，准备反攻力量，一定要彻底地改革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

在1944年4月至8月国共两党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并解决国共两党的某些悬案——承认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不但拒绝商谈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并且企图取消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限期集中”）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谈判未得到任何的结果。

1944年9月，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地方政府、人民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广泛地响应这个号召，民主同盟、国民党民主派，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并提出政治纲领，主张为改革政治制度和挽救抗战危机，必须立即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内一些民主分子，由于不满国民党顽固派的独裁专制，要求政治民主化和党内民主化，他们开始组织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国共谈判开始以后，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爱国民主分子一致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政治，消灭法西斯。9月，中国共产党发

出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后，国民党统治区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者、教育界、文化界、舆论界一致主张废除一党专政，赶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根据地各界人民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重庆、成都、昆明各界民主人士成立民主促进会，并集会游行。在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号召下，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走向高涨。

中国人民民主运动遇到了另一个外国侵略者的干涉。这时，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了对日本的优势。美国企图把自己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中国来，准备在战争结束后代替日本来独占中国的市场，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美国竭力支持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抗日招牌下，美国军官史迪威和魏德迈先后被派遣到中国来。由史迪威到魏德迈，美国为国民党装备了三十个师，到马歇尔来华的时候（一九四五年底）总共装备了五十七个师。当时，美国每天从印度出动了几十架飞机，不断地给国民党运送武器。美国训练国民党军队由史迪威开始，魏德迈继续扩大，训练的总机构设在印度的兰姆伽，在云南的昆明和广西的桂林也成立了训练机构。

正当中国人民开展广泛的民主运动的时候，美国却装出一副公正的面孔，要求调处国共两党的问题。1944年11月，美国代表赫尔利以第三者姿态到了延安。他假意赞成成立联合政府，劝说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随后，赫尔利又积极向蒋介石建议，为了获得对人民军队的控制权，蒋介石可以在政治上作些让步，即蒋介石用邀请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打消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企图用这个诡计来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1945年1月，国民党提出要组织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面

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整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派一名美国军官担任人民军队的司令官。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这种荒谬的要求。赫尔利公开声明，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美国对华政策，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毛泽东严正地揭露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阴谋，指出它“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实行这个政策，将给它以“千钧重负”，因为这个政策“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①。同时向美国人民敲起了警钟：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将给他们以“无穷祸害”，因为一个政府实行对外侵略，也一定对国内人民实行高压政策。

三 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基本政策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处于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前夜，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的胜利已经获得保证。同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执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积聚力量，准备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因此，当时在中国展开了两条道路、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中国究竟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还是走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

^① 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的道路？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并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的人民群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斗争、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明确地总结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并阐明了中共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和蒋介石妄图把中国拖向黑暗的两个前途的斗争。

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出发，规定了党的总政治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人民是中国之命运的决定者。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词中，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所指出的，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即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只要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它是一定能够被推倒的。

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党为着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党的一般纲领，就是：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必须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因素，它的必然趋势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党的具体纲领，就是：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实现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发展现代的工业，发展人民的文化，实行民族平

^①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等，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政策等问题。

实行以上纲领就必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国民党政权实质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政权是中国人民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内战的祸根。因此，要求废止这个专政，就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企图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来搪塞、来抵制。借国民大会通过一个所谓宪法，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还政于国民党反动派，而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分裂的方针，是内战的方针，是反动派要勒死自己的一条绳索。毛泽东说：“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①

在这次大会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十七年来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及其完整体系。就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路线，以及执行这个路线中关于建军原则、兵役、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队的指挥、军队的装备、主力军和地方军或民兵相结合、瓦解伪军等项工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因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停止了日本战略进攻，抗击了敌伪的主要力量，使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战的重心。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党内关系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以及党和群众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党十七年来的新的经验,有了巨大的进步。刘少奇的报告就是党的组织路线的总结和发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因此,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党员选出自己的领导机关,信托它的领导,并自觉地服从领导机关所定出的纲领、章程和决议。党的领导机关要领导得好,必须定期地向党员报告工作和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发扬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经常听取党员的批评和意见。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新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四条规定,乃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党内的高度民主。新党章又把学习和服从纪律规定为党员的义务,保证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特征。

新党章中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和工作必须密切地和群众相结合。为了贯彻群众路线,新党章中着重说明了几个根本观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永远排除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态度。

大会的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全党一致承认毛泽东英明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党一致承认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为党的指导思

想,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经过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找到它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毛泽东。这就极大地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全体党员紧紧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形成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统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有了全党的团结一致,这就百倍地增强了党的战斗力量和党员的胜利信心。因此,第七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也是准备胜利的大会。

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四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人民军队在局部反攻中,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发展了人民的抗日力量。

1945年4月以前,人民军队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自卫军一千万人。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解放区总面积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

这十九个解放区是: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海南区。

解放区处于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的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在人民军队的包围中。

抗日时期中,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因此,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就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队的总后方,敌后各根据地和全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制订关于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各项重大问题的指示。

华北解放区包括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等六个战略地区。华北解放区东至渤海、黄海，西至黄河，南迄陇海铁路，北达包头、多伦、锦州，控制着京绥、京汉、同蒲、正太、北宁等铁路交通线，威胁着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大同、太原、张家口、承德等重要城市。

华中解放区包括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等十个战略地区。华中解放区在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包括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两省的大部分以及河南、浙江两省的一部分，湖南省的一小部分。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徐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控制着津浦路、京汉路南段、淮南路以及区内纵横交织的水陆交通网。

华南解放区包括东江区和海南区。东江区威胁着粤汉路南段和广九路，威胁着广州和香港。海南区控制着敌人通往越南、马来亚、婆罗洲以及菲律宾的要道。

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政治，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解放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全部纲领，把人民的力量组织动员起来，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的战略基地和解放全国的主力。

“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

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①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8月8日，苏联对日作战，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迅速到来。苏联红军从海陆两方面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迅速歼灭了日本的关东军。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军越过内蒙古大沙漠进入热河和察哈尔。

苏联对日出兵，使中国抗日战争立即转入最后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

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②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号召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人民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号召放手发动沦陷区人民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这个声明，同时提醒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的危险。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进军命令，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②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我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①，限令其附近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投降缴械，并准备接收任何敌伪所占城镇和交通要道。由于苏联红军力量的强大和进攻的神速，日本关东军迅速被歼，又由于中国人民抗日军队的全国大反攻，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并继续抵抗正在包围着他们的人民军队，拒绝向中国人民投降。中国人民军队有责任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独立自主地向敌占区受降，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队。

中国人民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经过激烈的战斗而得来的。

冀热辽人民军队沿着北宁路，向东北进军，与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协同作战，解放了东北。晋察冀人民军队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着北平、天津、保定。晋绥人民军队解放了绥远、山西两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人民军队解放了山东一百个县。华中人民军队向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和陇海东段反攻。华南人民抗日武装进攻广九、潮汕两路。

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的两个月内，人民军队收复国

① 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在波茨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部城市）会议上提出的促令日本投降的公告。主要内容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必须永远肃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的军事工业必须拆除；日本的战犯必须审判；开罗宣言必须实施，即日本必须放弃其前所掠取的土地，如朝鲜，中国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地，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其他小岛之内；同盟国军队占领日本直至日本民主政府建立以后为止。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亦签字于该公告。

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座，毙伤敌伪军队二十三万多人。我解放区大为发展。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人民军队所包围的中心城市没有完全获得解放，抗日战争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宣告结束。

9月2日正式举行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

抗日战争结语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

中日战争，是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成长经过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即经过“上升、下降、再上升”然后获得最后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侵略的胜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即：为着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必须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和在根据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地中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

这个路线成为全党和解放区军民所遵循的路线。

因此，由 1937 年到 1940 年，我们能够开辟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1941 年到 1942 年，在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和进攻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度过难关，站稳脚跟。到 1943 年以后，开始举行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使解放区成为反攻的战略基地。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来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在苏联和国际革命力量的大力援助下获得的。

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援助，苏联红军歼灭日本主力关东军，极大地帮助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苏两国人民的同盟互助，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

第十一章 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斗争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6 月)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和世界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战争的结果，一方面，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被击溃了，英法帝国主义被削弱了，美国获得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霸权。另一方面，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它更加强大了；欧洲产生各人民民主国家，它们脱离了资本主义的体系和苏联形成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高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的巨大变化。战后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的时期。战后时期，不利于世界反动势力而有利于世界人民。

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以 1929 年为一百，1946 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为一〇七（1949 年为一三〇），其中美国一五三

(1949 年为一六四)，英国一一八，法国六三，意大利七二，西德三五，日本五一。由 1929 年到 1946 年这十七年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依然停滞在世界经济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由于战时军事生产的激增，才有了若干高涨。英国稍微增加一点。法国减少三七。三个战败国中，意大利减少二八，西德减少六五，日本减少四九。在这个时期内，尽管苏联的国民经济由于战争而受到巨大的损失，但它的工业总产量为四六六，增加到四倍以上(1949 年增加到八倍以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时期，各帝国主义打算牺牲它的敌手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摆脱危机的企图并没有实现。

战争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结果，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德、意、日三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英法两国也遭到重大的损失，只有美国靠战争发了横财。战后美国垄断资本为了扩大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势力，趁着竞争者破产或衰落的机会，夺取了英法殖民地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大部分。这些国家只是从美国手里得到美国过剩的粮食和工业品，如煤炭、面粉、棉织品等，而不是最需要的工业设备(只有 16%)。1949 年后，美国对西欧的军事援助多于经济援助。

美国又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方面，美国用倾销办法加紧输出自己的货物，另一方面，不让外国货物进入美国市场，也不让西欧国家向东欧市场输出工业品来换取粮食和原料。

美国这种横蛮的政策必然使美国和英法以及美国和西德、意大利、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比战

前更加混乱,更加不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指望都落空了。战争一结束,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就着手准备发动新的战争。美国企图统治全世界和征服所有其他国家。美国统治者知道用和平方法不能取得世界霸权,不发动新的战争,要想统治世界是不可想像的,为此,他们积极组织北大西洋集团,在苏联近旁设立军事基地,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加紧扩张军备,拒绝缔结和平公约等。

美帝国主义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把自己的战争计划,建立在利用他国的领土和他国的军队的基础上。它利用西德、日本以至英、法等国的军队,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统治者给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国家 and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规定有关备战的各项问题,使这些国家违反它们民族的利益,而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充当美国的工具。

新战争威胁,促使各国人民都卷入和平运动。战后的和平运动,其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群众反对战争的积极性,加强和平保卫者的组织,揭露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为维护和平和防止新的战争而斗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帝国主义的败亡,由于在战后时期英法等国家把经济军事化和美国的扩张政策所加给它们的重担转给殖民地,由于美国侵入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并在许多殖民地建立军事基地,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长期压迫和剥削,使殖民地经济处于更加衰落状态中,这一切就造成了殖民制度的危机,加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殖民地人民日益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奴役者。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获得了解放

的胜利，印度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获得了独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帝国主义的后方受到极大的威胁。

战后在欧洲出现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它们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形成世界体系。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大大加强了。

如上所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溃败，英法等国的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孤立，人民民主国家在欧洲的出现，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各国和平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都说明，战后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美国干涉者和中国反动派。

二 新的国内战争的威胁

当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国民党的军队还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过去几年中一直坚持抗日，而当时在华北、华中、东北等广大地区包围敌人的都是人民军队。因此，受降的应该是人民军队。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命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即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而对于延安总部所发出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肆无忌惮地诬为“唐突和非法之行为”。蒋介石把人民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要加以“军事纪律处置”。

反动派怎样准备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呢？首先美国军官、远东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在中国方面的日本军队只能向蒋介石投降。另一个美国军官魏德迈把美国所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军运送到南京、上海和北平。这三个

大城市都是长期以来被人民军队所包围的。为了扭转国民党当时所处的不利地位，魏德迈提出利用美国军队来帮助蒋介石守卫华北。即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大量运送到华北和东北以前为蒋介石固守华北的城市和交通线。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秦皇岛登陆，侵占了天津。并从北宁路沿线分别向北平和唐山、北戴河、秦皇岛等地开展。美军侵占了上述地区后，随即派出军舰把国民党军队从越南、上海、广东等地运送到秦皇岛。这些部队到达后，即攻占山海关，长驱直入东北。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部的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支配着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但不许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解放的愿望，反而把他们投入内战和破产的深渊。

对于中国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就是坚决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爆发。党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机是十分严重的。中国反动派时刻准备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绝不容许反动派攫取而去，必须起来保卫，如果反动派一定要强迫人民接受内战，人民就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逼迫我们打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站在自卫立场上，用一切力量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为此，解放区人民军队必须利用作战空隙，注意练兵；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我们的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在它们内部组织起义；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日本投降后，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农民在反奸清

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党在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出指示，坚决拥护农民的一切正当主张和正义行动，批准农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土地，宣布由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为农民所有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区别一般富农、中小地主、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区，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对地主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解放区土地改革一开始即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提高了他们保卫解放区和争取和平民主的积极性，使党获得战胜反动派的基本力量。

三 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

蒋介石是坐待胜利的。胜利突然来了，使他一切都措手不及。他需要时间。抢夺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准备反共内战，更需要时间，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需要一段所谓和平时期。

受尽了长期战争苦难、并为新的国内战争所威胁的全国人民迫切地渴望和平，要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解放。为了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巩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普遍地迫切地需要和平。中间阶级和它的政党对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抱着和平的幻想。他们向往美国式的民主，为美国政府的“中立”、“调停”的假象所迷惑，对国民党存在着“法统”观念等等。

在这样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对日本投降后国内国际形势作了科学的全面的分析。战后在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已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的条件下，当时美国反动派虽然鼓吹第三次世界

大战,但立即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只要人民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达成某些妥协。毛泽东认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如果放弃斗争就要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至于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看到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但它又估计到在人民革命斗争形势下,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或延缓全国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争取最好的可能,即争取实现全国和平;同时准备应付最坏的可能,即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并且把全部工作的基点,放在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应付最坏的可能方面。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和平欺骗和准备全国内战的反革命两面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真和平对假和平,以革命战争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把这种政策通俗地形象地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根据这个革命方针,在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6月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来领导人民制止内战,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试图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某些社会政治改革。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内有出现和平的可能。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改革,这对人民是有利的。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个口号。这时,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商谈国家大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此到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了延安。蒋介石希望毛泽东不去，好借此说中共拒绝和平，发动内战。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并揭露美国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决意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应邀而去。8月28日下午，在千万人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到达了重庆。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为了和平和民主，中共在四十三天的重庆国共谈判中，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又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这次谈判虽然取得某些协议，但是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即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却得不到协议。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妄想用谈判方式来达到取消它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把和谈当作掩护他发动内战的手腕。这次双方所签字的文件——《国共会谈纪要》刚一发表，蒋介石立即动员一百多万军队来进攻，几乎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准备打仗。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绝不容许反动派攫取而去，必须起来保卫。

9月，人民解放军阻止了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的进犯，10月底，完全击溃了敌军。10月中旬，在有名的上党（即山西省襄垣、长治、屯留一带）战役中，全歼阎锡山进犯部队三万多人。10月底，又全歼由彰德沿京汉线北犯的国民党军队七万多人，人民军队先后共歼敌军十一万人，占敌全部进攻兵力的十分之一。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对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保持着充分的警惕，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厌战，所以这些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1月间重庆成

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民行动起来制止内战。12月1日，昆明学生们举行了反内战的大示威。

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在重庆举行包括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是，蒋介石及其美国主人同意签订停战协定是要在另一种方式下准备反共内战。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为了孤立共产党，使它通过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

国民党孤立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分化，拆散民主同盟，使国民党在政协代表中占压倒的多数。国民党先拉走了民盟的一个组成单位（民盟有六个单位）青年党，又要拉走民盟另一个组成单位民社党的代表张君勱、张东荪等。但是，中间阶级的代表坚持和平民主，在政协开会期间，基本上是和中共采取一致态度的。这次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军队问题的决议规定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宪法问题的决议规定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的原则；政府改组的决议规定各民主党派参加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大会的决议规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民主宪法；和平建国纲领的决议规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方针。

这几项决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及其内战政策，否定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训政的法统，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的愿望，这是人民的政治胜利，反动派的政治失败。因此，反动派由于政协决议的通过而暴跳如雷，而全国人民却到处热烈地庆祝政协的成功。

四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支持下部署反共内战

可是，国民党却自食其言，它无视自己的一切诺言，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国民党反动派把庄严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当作是配合其“剿共军事”的“策略”。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即派遣特务去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集会场所捣乱和搜查政协会员住宅。政协会议闭幕后，2月10日国民党特务人员在重庆校场口捣毁了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打伤大会的演讲人郭沫若、李公朴等，造成校场口血案。此后，国民党又在各地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游行，并在2月20日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这几次事件中，反动派破坏政协的暴行，是以所谓群众面目出现的。

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公然地否定了宪法草案问题的民主原则。政协宪法草案确定了中国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在当时它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国民党反动派主张制定宪法，必须以“建国大纲”^①为依据。反动派取消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精华，而利用“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作为推翻政协宪草原则的借口。他们叫嚷“权能分职，五权分立”，即政权归于“有权的人”和治权归于“有能的人”，他们诬蔑人民是“无能的人”，否定群众管理国家的能力，从而剥夺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事实证明：政权是具体的东西，政府机

① 孙中山在其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三个时期，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孙中山这种“军政”“训政”的说法，以作为不实行宪政而实行反革命专政，剥夺人民一切自由的借口。

关、法庭、军队、警察、宪兵，乃是政权的具体标志。谁掌握了这一切东西，谁就有政权，谁就可以统治一切，谁也就有治权。所以，政权和治权乃是一个东西，政权即治权，治权即政权。真正的民主主义乃是人民的权力变为政府的权力，如果人民和它的代表不能掌握治权，那就是说人民还没有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假借孙中山关于权能分职的见解，窃据全国的国家机器，实行封建买办的独裁统治，把全国人民放置在法西斯铁蹄之下。

1946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重弹所谓法统的滥调，说什么国家法统不容中断。蒋介石所指的法统就是1931年国民会议所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他认为国民政府就是根据这个约法而成立的。但是，事实上，国民政府的法统早在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集团背叛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时候就已中断了。1931年9月5日的国民会议是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的会议，不但没有人民的代表，也没有蒋介石集团以外的国民党其他派别的代表。蒋介石召集这个会议的企图，在于制定一部法西斯的国家组织法，并在这个法西斯独裁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屠杀人民和剪除异己的国内战争。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各地人民解放军下达了停战令。但当时还有大量敌伪军队存在，他们到处破坏停战，向解放军进行各种挑衅。为着终止一切冲突，中国共产党建议三人委员会和北平执行部迅速确定国共两党共同解除敌伪全部武装的办法。这个步骤的实行，当然大大有助于国内和平。同时为着巩固和平，这个任务只能由民主政府和民主统帅部来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求迅速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使国内和平得到切实的保障。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停战协定签定之前，并没有真心停战，停战协定签定之后，又一直破坏停战。在停战令下达之前，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在热河占领承德附近大块地区，在河南占领砀山县城。在停战令下达后，蒋介石又命令他的军队占领山东济南等地。蒋介石一方面下公开的停战令，另一方面又下秘密的作战令。

停战令规定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可是停战令发布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继续向人民解放军进攻，扩大东北内战。蒋介石说东北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收复主权问题，硬把东北放在停战协定之外。东北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准备打仗。由于国民党的兵力分散，在几个月中，被解放军整师整团地歼灭了三个师。也由于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和谴责，蒋介石才被迫在6月6日起停战半个月。但是，这并不是真停战，而是蒋介石为了取得喘息机会，重新部署新的军事进攻。

在关内，国民党对包围已久的中原解放军六万人，部署了三十万兵力的围歼计划。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出国民党这个行动是带着全国性质的问题，是全面内战的起点。6月26日南京谈判还在进行时，国民党围歼计划即已开始，我军被迫突围而出。

停战令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军队一律停止调动，但是，停战令发布后，到5月底止，国民党调动了一百三十多万军队布置内战，并在冀西、晋南（晋冀鲁豫区）和豫南、鄂北（中原区）周围，到处修筑碉堡，包围和封锁解放区。

从1月至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四千三百六十五次，被攻地点四千一百五十八处，占我城市四十座，占我村镇二千五百七十七处，使用兵力先后总计二百七十七万人。

6月17日，蒋介石蛮横地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他所提出的荒谬绝伦的条件，才允许政治谈判。蒋介石提出要关外几乎全部九省，关内要苏皖区、热冀两省、陇海津浦两路、威海卫烟台两港。

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和以后所进行的调处工作，大大帮助了国民党加强战争的准备。

中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企图独占的最大殖民地市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战后美帝国主义主要政策之一。为此，美帝国主义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工具，用内战方式进攻中国人民力量，来独霸中国，而国民党也只有得到美国的援助，才能进行反共内战，美国和国民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起来，积极布置反革命战争。

美国政府命令魏德迈为国民党把美国所训练和装备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美国政府供给国民党大量物资。1945年12月，马歇尔来华，以进行调处中国内战为名，援助国民党加紧准备内战为实。马歇尔制定了巩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方案。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民党发出反苏照会，掀起了反动派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逆流。6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了军事援蒋法案，并声称美国不肯从中国撤兵。

美国政府在白皮书^①（1949年）中招供了战后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战后摆在美国政府面前有三条道路。第一，完全“摆脱”在中国的一切牵连。美国政府认为要是退出中国就放弃了美国的“国际责任”（独霸世界）和对华传统（侵略）政策。美国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第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

^①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党来毁灭共产党”。但是，美国政府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任何侵略中国主权的大规模地军事行动都会使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加以美国人民反对侵华战争，美国不敢走这条道路。第三，既不愿走第一条路，又不敢走第二条路，那末，美国政府就只有走第三条路，就是采取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的政策。马歇尔正是抱着这个帝国主义目的来华进行调处的，即在这个政策下，美国出面协助国民党制定一个暂时性的协定，用以“保持甚至增加国民政府势力”。美国政府调处的目的在于增强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以便发动反共内战，帮助国民党继续在中国进行黑暗的统治，作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援助，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中国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以制止的根源，美国政府使中国陷于内战、分裂、恐怖和贫困之中。中国反动派是孤立的，困难是很多的，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无力在战后打内战。正因为美国政府给他们以日益增多的各种实际的帮助，蒋介石也就越来越蛮横。美国的调处为名援蒋为实的政策，乃是造成中国内战的一个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坚决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中国有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动阶级——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存在，引起国内战争的基础也就存在。战后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人民所力争的。人民在内战还没有爆发以前，依然争取和平。为了中国人民的善良愿望和要求，最后挽救和平，中国共产党用了极大的努力和

忍耐，领导全国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道路。

人民的斗争没有制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广泛而有效的教育。通过双十会谈、政协决议和停战令，宣传了党的政策以及党为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出尔反尔，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事实，美国政府一手调处内战冲突，一手积极布置内战的阴谋，来教育人民，使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从对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而觉悟到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要得到生存权利，必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地暴露了。反动派蔑视了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它在政治上是更加孤立了。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是早已洞悉的，并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反动派发动全国内战时，有力量打败它的进攻，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第十二章 人民解放军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

一 人民革命战争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

1946年6月底,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卖国集团——蒋介石集团,在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的支持下,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向人民解放区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战争。

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力量是强大于我们的。当时,敌军总兵力共有四百三十万人,拥有三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和丰富的资源。敌人还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特别是获得了美帝国主义的大量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当时美国垄断原子武器)。而且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是经过了长期的充分准备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全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敌军比我军多二倍半,而敌军装备又比我军强得多。解放区人口,共有一亿三千多万人,约当国民党统治区人口三分之一,而解放区内土地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没有肃清,解放军后方还不十分巩固。

在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素质及其同人民的联系优于国民党军队以外，其他各方面的条件，敌军是优于我军的。因此，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使用正规军一百六十万人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军民实行全面进攻，企图一下子把解放区打得一蹶不振。

但是，中国反动派及其美国主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解放区军民的力量。他们错误地把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力争和平民主的一切努力看作是力量薄弱和胆怯无能的表现。他们只看见自己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最后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企图依靠其军事优势，特别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冒险地发动了内战。

有些人被这些表面现象吓倒了。一小撮惯于投机取巧的无耻的政客们，如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曾琦、张君勱之流，固然赶快投靠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就是有些革命的朋友，也开始怀疑处于劣势的解放军到底能否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并揭穿了美国反动派用原子弹进行讹诈的阴谋。

毛泽东明确指出，原子弹虽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不能阻止人类历史前进，不能阻止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不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

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的观点，这是从它们的本质来看的。毛泽东说，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

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藐视它们，有把握和信心战胜它们。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统治机构和武装，它们欺骗人民，要推翻它们还要经历严重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在具体斗争中，必须善于对敌斗争，讲求斗争的艺术，一步步地扩大革命力量，求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扫清了一切悲观情绪和怀疑。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而且能够打败它。我们必须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所发动的是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战争，如果我们不起来粉碎这个反动企图，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我们就要被美国和中国的反动派所奴役。我们能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反动派军事力量的优势以及美国的援助只能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民群众的向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中国反动派所发动的内战是卖国、独裁和与民为敌的反革命战争。要进行反共内战，反动派更严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因此它不得不同它的统治区的徒手人民作战。抓兵打仗，士气低落是反革命战争的必然的结果，一切武器都可以被士兵放下的。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致命弱点。因此，国民党军队的军心是厌战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是反战的，国民党内部派系间有严重的矛盾，军队中的官兵又有尖锐的对立。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全国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因此不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就是中等资产阶级也可能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或保守中

立。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革命战争，是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在这方面，解放区军民处于绝对的优势。同时，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城市政策。党在土地改革中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区别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在城市工作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争取中间阶级，孤立反动派。党的政策，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拥护，巩固了解放军的后方，并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国民党把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上，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薄弱、心理恐慌和丧失信心的反映，是他们除了依靠美国援助以外，就感到毫无出路的表现。

根据对国内国外形势的具体的分析，在中国有可能建立起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极其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因素。反动派的根本弱点，在于它的政治上的反动性，任何力量只要它是反动的，与民为敌的，不管怎样强大，它一定要倒下去的。

为着打败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规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就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为了歼灭敌人，在战役上当敌人使用大军向我军分进合击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是敌军中较弱、较少援助或当地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它的。同时我军还用少数兵力箝制敌军的其他部队，使它不能向被我包围的敌军迅速增援。胜利后看战争的发展趋势，再歼灭

敌人的另一部分或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术上,当着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军一部分的时候,我担任攻击的各个部队,不应企图把这部分敌军一下子歼灭干净,因而平分兵力,使攻击部队到处不得力,以至拖延歼敌时间或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而应当集中优势兵力,从这部分敌军中选择较弱的一点,进行猛击,务求必胜。得胜后迅速扩大攻击,各个击破。

这种作战方针的好处在于全歼和速决,一定要全歼,才使我军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也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解决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最有力地沮丧敌军士气和振奋我军战士。一定要速决,才使我军有可能歼灭敌军,避开敌军和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部队。

集中兵力、歼敌一部、各个击破这个原则,是我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军的强大,就有可能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而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形式。

这样,在整体上,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在每次战役上我们都处于绝对优势,保证每次作战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在全体上变为优势。我军又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装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来改变敌我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劣形势。

这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策略,是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教育和领导下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中锻炼出来的。蒋介石熟知我们这些军事策略,并研究过对付的办法,但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任何反革命军队都不能利用的。

国民党的军事优势,这是它敢于发动反共内战的主要条件。

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却有无法克服的弱点。国民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战争，它要占领中原、苏北、承德、安东、哈尔滨，它要打通胶济路和同蒲路，打通由南京到长春的交通线等。在几千里交通线的两侧是崇山峻岭，东北处在一千里长的供应线以外。国民党企图使用一百六十万人就要占领这许多地区，这样长的交通线和沿线的许多城市，不能不分散兵力来守备，所以，它的兵力不足。即使国民党定出了一条作战计划，即集中机动使用兵力，对某个地区一时结集相当优势兵力，但是，由于兵力分散，其他的地区就破绽百出，造成我军反击的有利条件。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蒋介石一贯排斥非嫡系部队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所以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央军和地方军的矛盾是尖锐的。蒋介石只任用他认为可靠的人担当重要军职，而军队一切调度，都须按照他的指挥，通过不称职的参谋长来执行。所以，产生它内部的互相倾轧和指挥不统一的根本弱点。

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国装备，说来应当是个优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产生了它的弱点。机械化部队必须有良好的交通线，可是，中国交通不便，敌军进入解放区作战，就没有现代的交通路线和工具可以利用，因而在山地作战，机械化部队是难以发挥它的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这个大规模的革命战争。

二 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在国民党军队侵入各解放区的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退出

了许多城市和地方。敌人在关内的进攻,开始于1946年6月底围攻中原解放军,接着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实行分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动地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多于敌人数倍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份,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转变。

由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以后,即阻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

首先,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率领下从宣化店突围,转移到陕南豫西地区和川陕边境,并在鄂东皖西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我中原解放军另一部分由王震率领横越鄂豫陕甘四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包围,返回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的围歼计划就宣告破产。我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先后在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的地区(仙女庙、泰县、海安至小洋口一线以南)和淮阴、淮安、涟水、睢宁等地区,进行了胜利的运动防御作战。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先后在陇海线(开封至徐州段)和鲁西南(定陶)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出击战。我太岳部队在晋南和晋绥解放军在晋北互相配合作战。我山东解放军在胶济线进行了破击战。我晋察冀解放军抗击了敌军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的进犯。我东北民主联军在辽南宽甸地区歼灭敌人。

接着,我华东解放军在宿迁、鲁南(枣庄峄县)、鲁中(莱芜)三次战役中对敌人进行了大歼灭战,粉碎了国民党南北会师侵占山东的作战计划。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先后在豫北(滑县)、鲁西南、豫东、皖西北进行歼灭战。晋绥解放军和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部队在晋西南战役中粉碎敌军西渡黄河进击陕甘宁边区的企

图,我晋察冀解放军向京汉线保定以南地区出击。我东北民主联军在南北战线互相呼应,北满我军三次进击松花江,南满我军打退敌人四次进犯临江的企图,粉碎敌军南攻北守的计划,结束了敌人在东北的进攻。

人民解放军用缴获敌军的装备武装了自己,又把俘虏来的士兵加以改造,补充了自己。虽然敌人占领了我解放区若干城市和地方,它却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时,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虽然增加了,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动地撤出一些城市和地方,国民党侵占的城市和地方增多,它的守备兵力也增加了。因而国民党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它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兵力削弱了。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多越强,而国民党军队却越战越少越弱。

从1947年3月起,敌人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就是敌之局部进攻和我之局部反攻,即拉锯式的战争形势。敌人进攻的重点是山东和陕北。

敌人被迫改变了战略,集中兵力于两翼,企图由东西两方面首先压迫解放军退出黄河以南以西,以便逐步消灭。由顾祝同指挥四十五万人(相当于进攻总兵力三分之二)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由胡宗南指挥二十三万多人(相当于当地解放军的十倍)向陕北解放区进攻。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机动的作战,粉碎了敌人在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

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始于1947年3月。它妄图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中国共产党的右臂,并且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西北解放军在西北山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它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

然后伺机歼击。经过延安、青化砭、瓦窑堡、蟠龙、陇东、榆林、米脂多次战役，解放军粉碎敌人的进攻，使它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边区。同时，西北战场以很少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作战。

敌人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开始于1947年4月。在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我歼灭了敌军主力。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华东人民解放军以一部兵力阻击进攻临沂的南线敌人，其主力北上莱芜，歼灭李仙洲部队六万多人，打击了国民党最强大的进攻矛头，消灭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人民解放军开始夺得战争主动权，这标志着华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开始转变。配合其他战场的胜利，形成人民解放军的全国大反攻的开始。

同时，我军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区向防守敌人发动反攻，根本改变了各战场的形势。

东北人民解放军1947年夏季在东西南满以及热河冀东各个战场上，展开了对敌的进攻战，使敌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采取所谓“重点防御”，因而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

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在豫北、晋南举行战略性反攻。晋察冀解放军在石家庄外围、津浦路北段、保定以北等地进行作战。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的总兵力有一百二十万人，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二百万。敌人的战略进攻被打退了。

国民党的军队，不论在哪一个战场，都打了败仗。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1946年举行全面进攻中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的时候那种威风没有了，就在举行重点

进攻中占临沂、占延安的时候那种威风也没有了。反动派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方式，以为我战略退却是胆怯，我暂时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是失败。反动派彻底地错误了，而且完全失败了。

丧失了巨大的有生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从战略的进攻转为战略的防御。

从此，全国战争的形势，由敌之局部进攻和我之局部反攻，转变为敌之全面防御和我之全面反攻，即转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进犯军的新形势。

三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和 国民党政治欺骗的破产

和国民党军事危机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也爆发起来。

日本投降时，国民党接连得到了大量的美国物资和接收了大量的敌伪物资，这是国民党政府财政上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内战的扩大，反动政府全部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用在军费方面。维持庞大军费的方法是滥发钞票。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摧毁了民族工商业，加速了法币崩溃。到1948年5月，法币已经发行到一百六十四万亿，相当于战前发行额的十二万倍。物价上涨比法币增发更快。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代替了法币，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反动政府用政治暴力强迫没收全国人民所有的金银和外汇，进行又一次公开的大掠夺。反动政府宣布所谓限价政策，把全国经济生活置于军警宪特的暴政之下。但是，暴

力决不能代替经济规律，不依着经济规律，任何财政经济政策都要失败的。由于纸币继续滥发和限价无效，金圆券又宣布废止了。到1949年4、5月间，原来四元合一元美元的金圆券暴跌到一千万元兑一元美元。

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全国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掠夺成性的蒋介石政权，疯狂地把广大人民逼到死亡线上，广泛地掠夺了中等资产阶级的企业和积蓄，还把贪婪的魔手伸到四大家族以外的大资产阶级方面去。这样，蒋介石政府遭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唾弃，它在政治上是彻底孤立了。

国民党的政治欺骗也完全破产了。

1946年3月，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的计划，其中心就是伪造所谓国民大会和宪法，借以欺骗群众。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冲昏了头脑，当天即发出了国民大会的召集令。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单独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这就彻底地破坏了政治协商的路线。

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一个伪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伪宪法的特征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行政有权。伪宪法上虽然也规定人民的“权利”，但它同时规定“为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得以法律限制”。这样伪宪法上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就等于一纸空文，只要什么时候反动政府下一道命令，这个权利就化为乌有。伪宪法上规定总统六年选举一次，连选连任，总统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统有权颁布紧急法令，也有权否决立法院的任何决议。这样，国民党的独裁者就一手包揽国家一切最高权力，而人民却一无所有。伪

宪法上否认地方自治，否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否认立法院的同意权和否决权等等。

因此，对于这样的宪法，连国民党政学系的《大公报》也不能不说是：“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几十年来，中国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要宪法，但它们到快要死亡的时候，却想用一个伪宪来解救自己。国民党反动政权在革命力量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于是制造这个伪宪，借以抵制革命和欺骗人民。它想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外衣来掩盖腐烂透顶的反动政权。当然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这个伪宪公布不到三年就随着国民党反动派一同宣告死亡。

1947年4月18日，国民党宣布“改组”它的政府。

国民党政府改组后，蒋介石无耻地声言：这个政府是“自由主义”的政府，是“多党”的政府，是“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政府。扮演改组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张群、曾琦、张君勱、王云五等。张群——官僚买办阶级政学系的首领，老牌的亲日派。曾琦——卖国贼汪精卫的食客。张君勱——保皇党北洋官僚余孽，反动透顶的玄学鬼。王云五——朝秦暮楚的掮客。这些卖国老手、封建余孽、政治贩子、无耻政客，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拥护者，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令的帮凶，为美国统治者所宠爱，他们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自由主义者”，成为一时“风云人物”。蒋介石的所谓“多党”，即国民党之外还有从民主同盟分裂出去的出卖灵魂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国民党政府的主人是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的中坚力量是国民党军阀党阀和财阀，而青年党和民社党，只是一群政治乞丐，只是蒋介石用来粉饰独裁的泥土。国民党政府改组后，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都猎取了国民政府的委

员、行政院的政务官和部长等。青年党在经济部和农林部争夺资源委员会和中国建设纺织公司等机关的劣迹和国民党官吏是毫无两样的。民社党为了争夺国民党政府的席位，1947年8、9月间内部发生了分裂，结果成为两派，互相攻讦。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党派所合成的政府，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宣称它是“自由主义”的政府，是“多党”的政府。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此欺骗人民，解救自己，孤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但是，结果却相反，被孤立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而是反动派自己。

四 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失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机构崩溃了，国民党的政治欺骗破产了。和国民党反动派结下血海深仇、势不两立的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运动和解放区的武装斗争结合在一起，形成两条革命战线。

1946年9月，由美国进步团体发起立即普及中国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是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要求美国军队从中国撤退，美军不退，运动不止，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这次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特别是在上海、重庆等地区最为高涨。

在伪国民大会召开期间，12月1日上海爆发了摊贩斗争事件。当时，上海广大群众靠摊贩购买日用品，而摊贩人数也很不少，所以，摊贩是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党政府为了垄断一切市场，下令取缔摊贩的营业，使他们无法谋生。

为了保存糊口的权利，他们向国民党上海当局请愿，但结果是遭到了屠杀。上海摊贩的斗争获得上海市民以至全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次事件发生于上海，那里是中国和美国反动派势力最集中的地区，它象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危机。

1946年12月底，全国学生发动了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及其他暴行的示威运动，在抗议美军暴行事件中，卷入斗争的学生，在五十万人以上，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

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改组时，爆发了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一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爱国运动。这次运动的特点是：第一，运动包括全国各地的学生群众。第二，学生们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派不准学生罢课，学生扩大罢课；反动派不准学生到南京去请愿，学生自己开列车到南京去。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殴打学生，学生把他们手里的武器夺取过来，等等。

到1948年5月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爱国运动具有全民的性质。几十万学生和教职员卷入了斗争，并且在各阶层人民中获得了深厚的同情和赞助。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寄托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全国各城市也爆发了规模日益巨大的工潮。由1945年8月到1946年9月，上海工人为了反对关厂、解雇以及物价飞涨而掀起的工潮有一千九百二十件，参加斗争的工人有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多人。而人力车夫工潮和劳资双方直接解决的争议，还不算在内。上海工潮的规模，比五卅时期的大罢工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重庆、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城市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

农民也广泛地组织起来。抗租、抗征、抗捐、抢米、反对抓丁、

惩办汉奸、清算恶霸的运动，普及于国民党统治区。江苏、浙江、安徽地区和湖南广大地区，几十万农民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四川省一百三十多个县中没有一个是没有农民起义的。西康农民起义军共有五十万人。除农民以外，苦力、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逃兵也加入斗争。

台湾人民的斗争是这个时期内的大事件。台湾是中国最富庶省份之一。台湾人民五十年中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他们渴望解放。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了日本在台湾的企业和财产，任意搜刮。国民党把台湾人民当作殖民地奴隶。人民被排斥于经济事业和政府机关所有重要职位之外。他们感觉到处于另一个征服者的暴政下，他们要求自治，要求自己管理本省的经济事业，要求国民党废止专卖制度，要求台湾人在台湾担任行政官吏等等。台湾人民的要求是合理的，正义的。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大规模的自治运动，成立了临时自治政府，并通过了改革台湾政治制度的方案等等。

对一切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实行恐怖政策。1947年5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对城市一切越级的或十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罢业、游行示威等，“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的制裁”。

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到处同学生和市民发生冲突，反动政府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行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群众。但学生爱国运动并没有被压服下去，这个运动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斗争的先导，赢得几乎整个社会的同情和声援。

对各省农民起义，国民党派遣大批军队“进剿”，但结果是失

败了。很多地方保安队甚至正规部队往往发生兵变，农民武装是越剿越多。

对台湾自治运动，国民党实行军事恐怖，台湾人民被杀害的在一万人以上。台湾自治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却更加深了。

与民为敌的反动派，处在全民包围之中，无论是军事战线上或政治战线上，它都打了败仗。反动派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

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显示着人民革命浪潮走向高涨，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彻底推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第十三章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1947年7月至1949年10月)

一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到1947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三百七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却由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近二百万人。在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里，敌人的兵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但是，敌人由于军事失败、经济崩溃和政治破产，结果兵力削弱、士气低落、后方空虚、人民反对，人民解放军由于不断获得胜利，结果越战越强、士气旺盛、人民拥护、后方日益巩固。这样，就改变了战争开始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于是，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人民解放军执行了外线作战的方针，举行大进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把战争引向长江地区。这个方针，一方面，破坏了国民党毁灭解放区的罪恶计划，使解放区广泛地连成一片，恢复相对的稳定；另一方面，把革命战争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扩大了革命的规模 and 影响，从而造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进攻的开始，是以人民解放军渡过黄河向南推进为标志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1947年7月渡过黄河，越过陇海路，向南进攻，直达大别山区，开辟了中原解放区。于是，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武汉至南京间插进了一把利刃。晋冀鲁豫解放军另一个部队8月由晋南渡过黄河，解放了豫西和豫陕边界广大地区，孤立了敌人豫西重镇洛阳，并威胁潼关。华东解放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8月由山东中部向山东西南部进攻，越过陇海路向南推进，直达淮河，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和郑州。从此，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于海的大平原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也举行了反攻。西北解放军收复了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的绝大部分，使陕甘宁同黄河东岸的解放区互相衔接起来。华东解放军收复了山东的绝大部分，同冀鲁豫解放区相衔接。并重建了安徽东部的江淮解放区，同中原解放区相通。东北解放军解放了东北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敌人在东北只剩下了几个据点。在华北地区，除太原孤城外，敌人在华北解放区的中心据点都已全部被攻占，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获得了合并的条件，并同山东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衔接起来。

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内线外线大举进攻下，在战争第一个年头，由全面进攻被迫采用重点进攻，到第二个年头，由全面防御被迫采用重点防御。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完全失败了。

这时，解放区普遍地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

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等，对党的土地政策作了明确的说明。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制度。

在土地改革中首先坚决依靠贫农雇农，把贫农雇农组织起来，成为运动的中坚，然后团结中农，使中农紧密地靠拢贫农雇农，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发动农民的途径是：深入群众，在贫农雇农中扎下根子，并通过他们去带动群众；采取逐步扩大逐步提高的方式去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团结中农的方针是：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原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为富农；在平分土地时，必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应当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有土地的平均亩数为高的土地；在农会和政府中，必须吸取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

对于富农，征收其土地财产的多余部分。因为旧式富农一般带着很重的封建剥削，它的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封建式的条件。富农占有土地数量很大，质量很好。当时革命战争胜负未决，富农倾向反动派那边，人民战争又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出兵、出粮、出义务劳动）来支援，争取战争的胜利。

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是有步骤的有分别的。先由反霸、清算、减租、减息开始，等到环境条件、群众条件、干部条件成熟时，然后实行土地改革。区别地主和富农，区别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区别，区别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区别地主富农分子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的前提下，对不同情况的人，采取各种不同程度的处理。

土地分配的方法是：乡村中所有地主的土地和公地，由当地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使乡村农民获得在数量上大体相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一年内，解放区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土地改革后，党领导农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互助合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为提高解放区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由于分得了土地积极参加战争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军的后方也更加巩固，这就造成了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又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行整党运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克服农村党员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现象。只有保持党的纯洁，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克服恶劣作风，才能使党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才能坚决地正确地实行党的土地政策，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根本意义就是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及其全部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号召全国人民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来代替封建买办法西斯政权；第二，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全部基础，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这时候是否还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

线呢？这是有的。全国内战爆发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曾经怀疑过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反对过党的政策，对国民党和美国政府抱着幻想。

他们被国民党暂时军事优势的表面现象所吓倒，错误地认为革命战争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产生统一的中国，也不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内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政权。他们从和平主义，即从所谓“牺牲较少”的错误观点出发，反对任何一种战争，不仅反对人民革命战争，甚至反对革命武装，主张裁撤任何一种军队，连国防军也不要了。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反对华北、华中解放区进行清算斗争的土地改革，认为用和平方法，用保存地主阶级利益（购买地主土地）的方法，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他们主张保存国民党反动政府，主张把反动派包括在民主联合政府里面。他们错误地认为美国不愿意中国内战，认为中国实行工业化就不能不求助于美国。他们希望美国帮助他们形成第三种政治力量等等。

他们坚持“中立的”、“独立的第三者”的态度，企图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寻找一条中间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他们幻想中间派的所谓完全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幻想在美帝国主义所全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即在保存国民党反动机构及其全部基础的条件下，经过改良的道路可以达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

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存在着左翼、中间、右翼的政治分野。它的右翼一向标榜旧民主主义；它的左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它的多数属于中间派，在政治上介乎左翼和右翼之间。因此，在民主党派内部，实际上有着两条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和旧民主主义道路的斗争。在

中共的影响下,全国各城市进行了对中间路线的批判,推动了民主党派中左翼的斗争。民主党派的左翼认为在民主和反民主、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民主党派的唯一出路是加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子,认为中间道路、改良主义、和平过渡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一切政协决议,竟不惜掀起全国规模的内战,中间阶级只有走革命的路。认为社会分野上的中间阶级和政治上的中间路线是两回事。在政治上,竭力鼓吹中间路线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而处于中间地位的中间势力,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逐渐转到人民革命方面来了。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正确方针。党明确指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大众的主体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必须争取团结他们。对于这个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必须慎重处理。人民民主专政,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首先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同时保护民族工商业。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定的阶级联盟,这个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其中也有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团结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便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日益被证明为中国的唯一出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采取正确的方针，支持它们内部的正确路线，反对它们的错误路线，而对于主张追随错误路线的人，仍旧采取教育争取为主的方针。它们之中，支持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人日益增加，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逐渐减少。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各中间性的政治集团重新结合起来。一面民盟一部分领导人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并停止盟员的活动，一面民盟一部分领导人在香港召开中央全会，恢复领导机构，宣布民盟采取由中立的第三者转而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继续奋斗的方针。他们认识到要争取和平民主，必须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

由国民党几个民主派的组织联合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1月成立于香港，它公开宣布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宣布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一致认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其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先后进入解放区。12月，各民主党派宣布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1949年1月，民盟承认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反革命内战的根源，国内和平民主的根本障碍。同月，各民主

党派宣布放弃中间路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以上各种政治主张,表明各民主党派,由中立的第三者转而又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它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美国的对华侵略政策。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成熟。

到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中国人民革命已经进入新的时期,中国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都已成熟了。194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革命战争的形势,提出了为取得革命战争更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任务。

第一,指出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进到一个历史的转折,就是人民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并使它走向灭亡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个转折点就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因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进攻,就标志着中国革命必然地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对于世界特别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也是极大的鼓舞和援助。

第二，总结了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作战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由于我们在战争的第二年，攻克了一些中小城市（石家庄、四平、洛阳、开封等），学会了攻坚战术，组织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报告中着重地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必须注重阵地战和攻坚战，准备夺取更多城市。必须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攻取城市，先取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然后取大城市，先夺取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然后相机夺取中等程度守备的城市，到条件成熟时再去夺取守备强固的城市。

第三，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作了重要的指示。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坚决团结中农，不得损害中农的利益。掌握这两个基本原则，土地改革的任务才能胜利完成，已经发生的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能及时得到纠正。整编党的队伍，解决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第四，随着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将解放更多的城市。因此，党不仅应有正确的土地政策，还应有正确的城市政策。报告中明确地解释了党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为农民所有，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党的政策就是要没收官僚资本为人民共和国所有，变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对

于中小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需要它们中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有所发展。中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由没收官僚资本而转化为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人民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报告中明确地区别了国民党统治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政治倾向和党对于民族工商业所采取的保护政策的不同，政治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倾向和经济上消灭民族工商业是两件事，决不能混同。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民族工商业必须坚决保护。因此，严格地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工作人员对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

第五，指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扩大和巩固。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完全暴露，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党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个统一战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醒全党记取历史的经验：1927年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在革命高潮时期放弃革命领导权使革命遭受失败；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个报告阐明了党在革命战争转入进攻以后关于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以及统一战线各项工作的基本政策，成为党

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行动纲领。

二 中国共产党的新区政策和 新解放城市政策

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后，迅速地解放了广大的地区和许多城市，开辟了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解放区人口有一亿六千多万。解放军由于攻坚能力的提高，收复和解放了许多中等城市，其中包括敌人设防坚固的鞍山、四平、潍县、石家庄、运城、临汾、洛阳、宝鸡、开封、兖州、襄阳等。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认真地研究和正确地执行对新解放了的地区和城市的政策。为了规定和执行新区政策，中共中央指出全党必须掌握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具体地分析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从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出发，决定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区别老区和半老区，区别游击区和新区。

对于新区和新解放城市，必须区别它是否可以巩固地占领。凡是可巩固地占领的地区，一方面坚决消灭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解散一切反革命组织，逮捕反革命首要分子，没收官僚资本和反革命罪魁的财产，以便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另一方面，切实保护一切守法的民族工商业以及一切不在没收之列的公私财产，尽量留用国民党经济教育文化机关中可以留用的人员，以便安定社会秩序，避免过渡时期中的混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依靠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逐步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

城市中社会改革的任务、方法和农村中土地改革完全不同。新解放城市实行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没收官僚资本。被没收

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得分散，保证它继续生产和恢复生产。为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一切公私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适当地提高工人的地位和保障他们的生活。

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具备三项条件：第一，反动武装力量已经完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第二，基本群众的绝大多数已经有分配土地的要求；第三，党有了能掌握当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干部。土地改革后确定地权，调整和减轻人民负担，给农民以必要和可能的援助，使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条件不具备的地区，首先实行减租减息和调剂种子吃粮的社会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消灭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和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

在游击区，社会改革的范围更应当缩小到适合于游击战争的程度。

随着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拥有一亿六千多万人口和在很大程度上联成一片的地区当政，并且将成为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为了保持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争取全国规模的胜利，加强党的纪律性，具有头等的意义。全国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政策的完全统一。在行政制度和行政机构方面，也要求逐渐实行必要和可能的统一。适当地缩小各个地方和各个兵团的自治权，把全国一切可能和必要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而在各地区，就统一于中共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全国规模的革命战争和实行各种革命政策。

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在 1948 年 1 月发出指示，要求全党

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建立各地向中央的定期的报告制度。

和加强纪律性的指示的同时，党中央又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克服某些党的领导机关中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错误。这个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和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由党委进行充分的讨论，做出明确的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同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健全党委制也是实现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中心环节。

由于全党实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性和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大大加强了全党的集中统一，使党进一步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党在1947年12月所召开的中央会议及其以后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使党为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在主观上的准备已经成熟了。

三 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使战争形势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局势已经确定了。

三大战役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战役。人民解放军先打锦州地区，并分别阻击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的援敌。九月十五日解放锦州、占领东北境内敌人和关内联络的咽喉，封闭东北境内敌军在陆上的退路。

接着解放了长春。但是，蒋介石企图夺回锦州，命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人民解放军使用于锦西、锦州、辽西的兵力不下八十万，而廖部只有二十万人，并且解放军的后方是巩固的。解放军使廖耀湘兵团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集中兵力包围歼灭。在打虎山、黑山之间廖耀湘兵团被解放军所切断，在两三天间廖耀湘兵团完全被歼，沈阳和营口相继解放。至此，解放了东北全境。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物产富庶的东北地区，就永远地为人民所有。辽沈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是人民革命战争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从此以后，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胜过敌人，而且在数量上也多于敌人，即敌人总兵力降为二百九十万人，而解放军却增至三百万人。

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7日到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邱，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地区所进行的一次带有决定性的战役。人民解放军首先争取张克侠、何基沣等起义，从而迅速由山东枣庄南下至碾庄的曹八集，把黄伯韬兵团包围起来，这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包围圈。解放军一面用主力围歼黄伯韬部队，一面用有力部队打援，牵制徐州各兵团出来解围，全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

黄伯韬兵团被围时，蒋介石调遣黄维兵团，由河南信阳向安徽宿县前进，即被解放军所包围，这是淮海战役的第二个包围圈。由于在行军中途被围于双堆集，弹尽粮绝，黄维兵团被歼，黄维被俘。

由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所指挥的国民党三个兵团，从徐州出来解救黄维，被解放军所阻击，解放军首先在青龙桥歼灭了孙元良兵团，又在河南永城县东北陈官庄附近把邱清泉李

弥两个兵团包围起来，这是淮海战役的第三个包围圈。国民党二十多万军队在方圆二十多里地区被围，这里民房很少，又是寒冬季节，杜聿明拒绝解放军敦促他“下令全军放下武器”，结果全军被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只有李弥个人逃跑了。

淮海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五十五万多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中原地区，这是解放战争另一次有决定性的伟大胜利。长江以北残敌纷纷向江南逃窜，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就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这时，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的各野战军分别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个野战军和直辖于解放军总部的华北野战军。

第三个战役是由1948年12月5日到1949年1月31日围歼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平津战役。国民党估计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况且隆冬严寒，难行远程，解放军不会很快入关。又估计东北解放军进关部队至多不过五十万人。因而加紧准备在三、四个月内在美国支援下扩充部队。可是，在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八十万大军马不停蹄地在严冬时节，连续十九天，跋涉二千多里的长程，开进关内。不给华北敌人扩军的余暇，同时使他们不得南逃或西窜。

入关大军迅速地将敌军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等据点。在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傅作义所部主力，使他们在天津、塘沽负隅顽抗。接着，攻打天津，使反动军队尽量少从海口逃跑。天津守敌陈长捷拒绝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天津的建议后，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天津。陈长捷被俘。北平二十万守敌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1949年1

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解放了。平津战役中被歼灭和被改编的敌军有五十二万人。

北平的和平谈判从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就已经开始，但直到天津解放的前夜，敌军还不愿接受和平改编的条件。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强大，天津的迅速解放，国民党官兵的斗志消沉，以及由于北平广大人民坚决拥护真正和平，使北平终于获得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号召的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方针的伟大胜利，这对长江以南及其他地区的解放指出了一条道路。

三大战役进行了一百四十二天，歼灭了敌人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极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这三次战役，在规模方面和歼敌方面，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三大战役集中地表现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根本思想，它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看到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天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即利用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谈阴谋。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发生了更大的矛盾和分裂。蒋介石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南方各省地方军阀为自存起见，不仅要保存自己统治地区的半独立性，并且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美国的援助。在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的策动下，桂系头目之一、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的和谈阴谋就是这样出现的。1948年5、6月间，在伪国民大会上，桂系首领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就

是桂系企图在和谈幌子下逼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的一个步骤。李宗仁当选为伪副总统后，白崇禧就以武汉地区为中心，形成广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五省地方军事集团，逼蒋下野，准备由桂系出面同中国共产党恢复和谈。一面竭力保存已有的力量，一面积极训练新的部队。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了他的求和的文告。蒋介石提出和平谈判的条件是：要求人民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要求人民承认国民党反革命的伪法统、伪宪法，要求人民保存国民党的反动军队等等。

蒋介石求和的目的显然是借此赢得喘息的时间，准备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毛泽东在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求和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而不是和平的条件。指出虽然人民解放军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时间之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提出了八项条件^①。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否则就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果然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和平攻势的阴谋被揭穿了。接着在美国的授意下，1月20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把伪总统职务交

① 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法统；三、废除伪宪法；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实行土地改革；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

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目的在于阻挡或延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划江而治”，并在这个条件下同中国共产党组织所谓联合政府。为了这个目的，南京政府通过它的代表，对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中第一项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拒绝接受。对第四项关于改编反动军队问题，另外提出对案：即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决定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由双方各自编成。对第八项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反动政府的问题，妄想在未来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民党反动派保有和中国共产党同等的地位，实行所谓多党政治。他们企图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准备继续反革命战争。蒋介石在引退之前，把他的死党布置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和西南地区，尤其重视巩固东南各省。蒋介石准备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训练二百万新兵。蒋介石辞职后，隐居于浙江溪口，并以溪口为他发号施令的大本营。

至于桂系，他们增强对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方面的力量。

所以，蒋介石的引退是美帝国主义导演下实行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分工。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了周恩来等六人为代表，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并通知南京政府依据上述时间和地点，派遣代表团。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这是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商定的修正案。中国共产党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国内和平，作了极为宽大的有原则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第一项规定：“一切战犯，不问

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真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一条对于战争罪犯非常宽大的规定,指明除蒋介石及其死党外,其他战犯都有可能戴罪立功。这是中国人民最后一次留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这个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了。

拒绝这个协定,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这样,国民党和平谈判的诡计就完全被揭穿了。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和西北进军,解放全中国。对于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人民解放军同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和平协定。所向无敌的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天的战斗,就横渡长江,并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正式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接着,人民解放军就在江南和西北数千里的战线上勇猛前进,扫荡残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太原、杭州、武汉、西安、上海、兰州、广州、贵阳、桂林、重庆、成都等城市,并用和平办法解放了湖南、绥远、新疆、西康、云南等省。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全部都解放了。

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另一种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在革命阵营内组织所谓反对派。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即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右翼是美国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注目的对象。他们中的胡适、傅斯年等,早已成了美帝国主义手中的玩物。但还有另一部分人,既同反动派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为了使革命停顿起来,或者使革命不至于过多地侵犯反动

派的利益，保存和加强反革命阵地，美帝国主义多方策动他们，力求混入革命阵营，形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

这些人中，有的主张联邦制，“划江而治”，反对解放军渡江作战，妄想把黄河流域划为中国共产党的管辖地区，长江流域由国民党统治，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由中间派来支配。有的主张把民主党派变为资产阶级反对党，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纲领，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加接受，它就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等等。

毛泽东曾经向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敲起了警钟：他们究竟往何处去？要作“敌人的朋友”，还是要作“人民的朋友”？的确有一些原先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后来站起来坚决地反蒋反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人。闻一多和朱自清是其中的表率者。毛泽东说要歌颂闻一多和朱自清，歌颂他们什么呢？歌颂他们以自己的转变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走的道路，使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市场，人皆掩鼻而过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报告决定了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

报告指出：在全国胜利的条件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暂时转移到乡村，在乡村建立根据地，积聚革命力量，用革命的农村长期包围城市，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经过二十多年长期艰苦的斗争，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从

此，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由城市来领导乡村。

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只有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要做好城市工作，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城市中其他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战胜敌人，建设人民的城市。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第一发展国营经济，第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第三发展手工业。

报告提出^②全国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报告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政策，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左”右偏向的错误。

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现代性工业大约占10%，农业占90%，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也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中国现代性工业虽然仅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10%左右，但是它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革命胜利后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占国民经济总量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

来。谁要忽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这些个体的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且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大力组织、推广和发展合作社经济，才能引导劳动人民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忽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采取参加的立场，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便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可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要受到限制而不能任其泛滥的。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通过合作社，改造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国民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就保证我国稳步地向着社会主义过渡。

这些原则就是后来制订“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础。

报告最后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以

后的路途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一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另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全党必须提高政治警觉性，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谦逊的态度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进行隐蔽的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向我们进攻，不要被他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或腐化。

报告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各种社会经济成分，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并具体地规定了党对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从而制定了使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以后，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

人民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这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许多人都还弄不清这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要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毛泽东在1949年3月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和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详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统一了全国人民的认识，纠正了某些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找到这一条道

路是经历过千辛万苦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努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救国的道理。从那时候起到 1911 年革命后的几年,他们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人民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因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宣告破产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光芒,他们深信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就担负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解放的唯一道路,所以,我国人民所要建立的国家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要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实行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样的政权实质上是工农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开始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所以,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

政。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它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外国和中国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并继续前进。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是小私有者，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的工作。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时候，再进一步地进行教育改造，最后消灭资本主义。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即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如果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也给他们以土地和工作，使他们可以生活下去，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也还存在，因此，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即加强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并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稳步地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必须联合苏联，联合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各国广大人民。中国人民的真正友谊，只能向社会主义国家去找，向各国广大人民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方面去找，也没有第三条道路的、模棱两可的可能。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召开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的临时大宪章即“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在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没有反动派参

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党派热烈地响应。同年11月25日各党派的代表集中于东北,协商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代表范围的问题,代表们一致赞同新民主主义是新中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新政协的代表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因此,决定了参加政协的代表资格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分裂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1949年工人、妇女、青年学生等人民团体先后在北平成立起来。华北、中原、东北各地先后召开了全区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人民政府。经过以上许多组织上的准备,建立人民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完成了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人民政协“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①的关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互相结合,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工人阶级在

^① 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社会主义)、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都得到法律上的规定。这种领导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就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能使人民充分地实行民主，又便于对反动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它无比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规定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经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去团结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来共同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1日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公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将逐步消灭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是最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打断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锁链而得到解放。中国从前是帝国主义所争夺的重要市场。中国革命的胜利，宣告了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破产，宣告了它们奴役中国的计划的终结。因此，这个革命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揭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日日益逼近，使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最后胜利

更快到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

中国革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一个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它的胜利,就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并提高他们的胜利信心。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超额利润的来源,变成了和正在变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阵地。

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正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它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真理,也是各被压迫民族解放自己的唯一真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全面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这就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具有的极其生动的力量,它不仅胜利地指导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时也胜利地指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语

在1946年7月,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竭力支持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卖国集团——蒋介石集团,不顾我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一切努力,不顾全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四年的严重的斗争,最后终结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和国民党反动派二十二年的黑暗的和反动的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所武装的国民党反

动派，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和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进一步削弱的时期进行的，战后时期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中国和美国反动派；由于我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并建立了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是我国人民赖以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坚固基础；特别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确地制定了战胜反动派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制定了解放全国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使人民解放军迅速地由劣势转为优势，由防御转入进攻，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这个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这个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个胜利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

领导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原则，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赢得全国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将保证我国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十四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

(1949年10月至1952年)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际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项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在一切方面立即着手进行的。在我国过渡时期的头几年，首先必须医治由于长期国内战争而造成的创伤以及进行社会改革等。即在广大农村中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决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城市中，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并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着手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工作，需要相当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而我们也正具备了和创造了这些有利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欢呼。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首先宣布承认我国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各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

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越南也相继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巴基斯坦等国家也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挪威、荷兰、阿富汗等国也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1949年12月16日至1952年2月17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这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1950年2月14日，在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直接参加之下，由周恩来外长和维辛斯基外长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条约和其他协定的签订，使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上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大大加强了两大民族的友好合作。毛泽东主席1950年2月17日在莫斯科车站上的临别演说中曾这样说：“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在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问题上，规定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不允许日本或者在侵略行为上同日本勾结的任何国家重新进行侵略和破坏和平。条约指明：“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

事及其他援助。”这就是说，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敢于侵犯我国，必将遭到中苏两大国的有力反击。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是远东和平的中流砥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重大的因素。

这个条约和其他协定，对于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按照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苏联在五年内贷给我国三万万美元（仅仅以年利一厘的利率付息）。苏联还给我国以其他经济和技术援助，包括电力站设备、机器制造工厂设备、采煤采矿设备、铁道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苏联专家们接受我国政府的邀请来到我国，在工业、铁路、农业、水利、医药各项建设中，都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进行忘我的劳动，毫无保留地把先进的技术经验传授给我们。

美帝国主义的继续侵略我国并和日本反动派互相勾结，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发动新的战争，严重地威胁到我国安全并破坏亚洲和世界和平。1952年9月，我国政府代表和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会谈。其中讨论了关于两国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双方协议，一方面苏联政府依照原来协定所规定的期限，将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提议，对于原来协定中规定苏联军队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撤退期限，予以延长。旅顺地区对于保卫我国国防和防止日本的侵略，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这个新的协定，保卫了中国北部海岸的安全，给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同盟国在西太平洋进行侵略的企图以严重的打击（中苏两国鉴于朝

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后远东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国防力量的巩固,1954年10月12日两国协议: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大连行政权完全属于我国)。

在战后时期,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经济上的合作,缔结了经济上合作和互助的协定。

三年来,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发展得很快。1952年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72%(1950年为26%)。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输入的物资,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帮助极大。我们所需要的工业装备和工业器材,全部或大部分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输入,而我国需要输出的农产品、畜产品、矿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部分销售于这些国家中。

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反,帝国主义十分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决定以武力阻止台湾的解放,并派出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沿海地区;10月,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逼近鸭绿江,从南北两方面以武力威胁我国的安全。12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冻结我国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船只开往我国港口,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政策。1951年8月,美英单独拟定对日和约草案,阴谋侵犯我对台湾等岛屿的主权。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严重威胁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安全。

二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着手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和改造工

作时,在财政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困难,我们接收了国民党反动机构的烂摊子,承受了它的腐败透顶的遗产。当时的工业大部分破产,工人大部分失业,所有矿坑几乎都灌满了水,铁路不能通车,农业破产,自称农业国而粮食和棉花却有很大部分依靠进口。1949年,工农业生产和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25%以上,耕畜减少了16%,主要农具减少了30%,粮食减少了26%,棉花减少了48%。十多年来通货膨胀,投机商人控制着工商业市场,国民党统治区从1937年8月到1948年8月物价上升了六百万倍。人民日夜不安于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威胁之中。

另一方面是战争胜利带来的经济困难。1949年解放战争进展得很快,许多地方又和平地获得了解放,对于不再抵抗的旧军队旧人员,我们采取了一律包下来的方针,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的支出。而财政收入方面,老解放区还拿出很多粮食支援战争和新解放城市,在新解放区,仅有一部分地区开始征收公粮,新解放区结束战争不久,城乡交流需要一个恢复过程,所以,城市的税收是很少的。这样,政府财政支出和收入之间大不相符。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暂时还只能发行钞票(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其结果固然解决了当时人民革命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但却不能避免通货膨胀和物价波动。1949年,全国物价发生了四次大波动,1950年1、2月间,也还有相当的波动。

在这样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党和政府的任务首先是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前提

条件。

党和政府为了制止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作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进行了反投机的斗争，打击了投机商人几次掀起的物价大涨风。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1950年度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在这个草案中的收入方面，城市税收占第一位（占全部收入的40.1%），农业税占第二位（37.2%）。当时，税收在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币值、物价和发展生产事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把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过去以公粮为主的情况，改变为公粮和城市税收并重的情况，在财政政策上是重要的措施。在支出方面，军政费是草案中最大的一项支出（占38.8%）。财政支出仍然是以保证战争胜利为它的主要任务。行政费（占21.4%）中的主要项目是公教人员的生活费和公杂费。建设费（占23.9%）以重点建设为主，长期战争对于国民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这是一项必要的支出。

在这个支出概算中，收入总额相当于支出总额81.3%，其余18.7%是赤字。政府解决赤字的办法：一个是发行公债，解决赤字三分之一强，另一个是发行货币，解决赤字的三分之二弱。

我们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从抗日战争起到1948年这个时期内，都是分散经营的，统一的只有一项，即政策的统一。1949年，随着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财政经济工作上的统一的范围和程度也因而扩大，但整个来说，基本上依然是分散经营的，因为财政上只统一支出，而没有统一收入。为了平衡财政和稳定物价，就必须做到财政支出和收入的统一。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

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财政收支的统一，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公粮、税收、仓库物资、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即军费和重点建设费等。全国物资调度的统一，使国家所有的主要物资（粮食、纱布、工业器材），从分散而集中，变为有效的力量。全国现金管理办法，是把分散在国家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除若干近期使用的以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个决定对于扭转财政经济困难，即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它集中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合理使用，量入为出。这样，就使得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币值和物价也因而逐步稳定。这样，国家就有可能使国营工矿企业在正常状态下进行生产，同时也有可能使私营企业的生产摆脱了投机市场的控制，而逐渐转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这就证明了统一中国的口号确实有其严格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内容。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又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这个胜利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民经济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开端。

但是，这个转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暂时困难。从1950年4月起，全国各大城市的物价开始下跌，以3月为基数，到5月底止，全国七大城市物价平均下跌22%。物价下跌，一方面固然提高了广大人民所存货币的购买力，打击了投机商人，但同时也给一般工商业者以很多的困难。因为物价不断下跌，对于生产事业和

广大人民也是不利的。它会使生产者不敢进行再生产，消费者不愿购买，商人不愿进货，结果就会使生产萧条和商品滞销。

生产突然萧条和商品突然滞销的原因在哪里呢？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和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形成了市场上若干物资一时供过于求和商业萧条的现象。在长期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购买力是极低的，但是，由于十二年来的物价不断高涨，全国人民为着避免货币贬值的损失，竞相抢购物资，加上投机商人的大量囤积，这就变态地出现了一种虚假购买力。既然通货膨胀迫使人民抢购物资而造成的市场繁荣是虚假的，那末，这种繁荣后面显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因为，如果通货膨胀越来越快，这种虚假繁荣虽然能够暂时保持，但是，人民的实际购买力跟着通货膨胀越来越小，这些囤积商品也就越来越缩小它的真正的市场。一旦物价涨风停止，这些囤积的商品就必然没有销路。这是全国工商业萧条的基本原因。

除此之外，工商业突然停滞的原因：第一，过去适应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若干工商业如洋货店、钱庄、西服店、金银首饰店等，不符合人民的需要，结果就引起了这一部分工商业倒闭和一部分工人失业的现象。第二，许多私营企业的机构臃肿庞大，企业经营的方法极不合理，因而成本高，利润少，或者还要亏本，使许多私人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歇业。第三，生产的盲目性，引起了许多工商业的减产、停工、倒闭的现象。总之，服务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以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上的虚假繁荣突然不存在了，因而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机构也顿时失去了依据，许多工商业突然萧条、停工、歇业和工人失业的现象大量发生。

但是，全国人民生活的主要日用必需品和某些主要工业原料都为人民政府所掌握，政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一方面加强行政管理，实行物价评议，另一方面有计划地投出一部分货币，适当地收购物资，力求物价稳定。同时，全国的囤货并不很多，这些囤货经过几个月的消费和物价稳定后人民真实购买力的增长，结果象4、5月间从通货膨胀转入物价稳定初期所发生那种商品滞销的状态，到6月以后就开始成为过去。

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前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确定党和全国人民在今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政治形势，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削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所以，当时政治形势对我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是有利的。报告又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因此，有老的解放区和新的解放区。在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而在新解放区，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这样虽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毛泽东指出：当时我国“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即完成国民

经济恢复的任务,需要三个条件:(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三中全会以后,全党遵循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指出的道路,团结全国人民,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的历史任务而前进。

三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

中国人民在着手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和改造的时候,必须争取一个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对朝鲜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同时侵占我国台湾。美国侵略者的企图是要征服整个朝鲜并进一步侵犯中国,作为他们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的一部分。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并提出严重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停止侵略战争,要求美国武装部队退出台湾。美国侵略者无视我国的主张和警告,由朝鲜向我国东北边境进犯,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就用实力来保卫和平。中国人民组成了志愿军,10月25日出国,和朝鲜人民军并肩地为制止侵略保卫远东和平而战。在中国人民热烈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抗美国侵略的战争,不断地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到1951年5月间,就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使美国军队停止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地方。从此,中朝两国

部队采取了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在横贯朝鲜的战场上构筑了牢不可破的防御阵地，把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美国侵略者竟然违反国际公法和人类道德，从1951年12月开始，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但这种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也被我们所彻底粉碎。

中朝两国人民被迫进行反侵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所以，中朝两国人民和政府迅速响应了1951年6月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谈判停战的和平建议。美国面对着强大的中朝军事力量和强大的世界和平力量，面对着帝国主义内部由于它的失败而引起的严重矛盾，不得不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进行停战谈判。但是，妄图独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谈判并不是甘心情愿接受的。因此，朝鲜停战谈判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的复杂而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在谈判建立军事分界线和停战等问题时，美帝国主义曾施用军事压力及其他野蛮手段，但依然不能达到它的侵略的目的，于是在谈判接近达成协议时，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实行卑劣的阻挠拖延政策。中朝方面在谈判中，不断地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压力”及其卑劣手段，打击了它的反动气焰和阴谋，使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议桌上仍然得不到；同时又以坚定耐心的努力和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使历时两年的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了协议，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出动了大部分的海陆空军，还纠合了十六个国家的军队，伤亡一百多万人，耗费二百亿美元，仍然达不到侵略的目的。而中朝人民武装却越战越强，不断取得光辉的

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并且证明已经觉醒了的为独立和安全而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胜利,打击了美国以至整个帝国主义世界,打乱了他们准备另一次战争的计划和部署,保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这些,正是保障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顺利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国人民需要一个持久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需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应付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党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在原有基础上,把人民解放军建成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单一兵种建设成为拥有诸兵种的合成军队。展开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运动。人民解放军实行正规化,即在指挥、编制、训练和纪律上实行统一。在另一方面,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国政府进行必要的国防工程建设。还进行了后备兵源的储备工作。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国内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胜利初期,还有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散布在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也有潜伏着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组织了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骚扰暴乱和各种破坏,刺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和保卫经济建设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条件下,在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所规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明确方针和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

例》，集中地打击了当时还压在人民头上的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严办了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要分子。这次运动肃清了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国内外阴谋破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事业的敌人，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力量。但这并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完全消灭。只要帝国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只要国内阶级斗争还存在，反革命分子就不会完全被消灭，他们的破坏活动就不会停止，而且必然采取更隐蔽更毒辣的方式进行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经常性的斗争。

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胜利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我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在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上，我们也获得了重大成就。

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根本制度，是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的真正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彻底实现，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还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而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个过渡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

解放后三年中，全国各省、市、县和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范围内从上而下地建立起来。所有的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绝大部分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

县和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是由人民间接选举出来，代表中由人民直接和间接选举的一般都达到代表总数 80% 以上。

人民代表会议是议事机关，也是工作机关。人民政权对于各项重要工作的领导，例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爱国增产等运动，大都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发动人民参加，从而提高了人民政治觉悟、爱国热情、革命警惕性和生产积极性。

因此，这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的组织形式，在团结全国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这一系列伟大事业上，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

在这个时期内，在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肃清了残存于这些机构中的封建反动势力，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团结和改造了旧的技术人员，清除了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了新的民主制度。这些改革提高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

在这个时期内，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我国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为此，知识分子就必须彻底改造，逐步工人阶级化。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形式下，用教育方法，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经过这次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彻底揭露了和大量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初步解决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有小部分已经逐步成为共产主义者，使工人阶级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建立和巩

固起来。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质的转变,非经过长期的改造功夫不可,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四 民族工作的胜利

这个时期内的民族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全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6%,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其中许多地方拥有各种工业资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的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建立各民族的真正合作的区域自治,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原则,注意各民族的历史特点和差别,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第一,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能够用彻底的民主主义来解决民族问题。第二,我们以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为出发点,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来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民族区域自治的优点是:既可以实现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民族,又可以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基础上团结各兄弟民族在统一的大国内,互相合作,共同管理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各民族共同生活在祖国大家庭内,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分裂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第三,在国内各民族中,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较高的汉族应当帮助其他兄弟民族，各少数民族也应当认识到汉族对他们的帮助的重要。因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错误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忽视少数民族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忽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的状况，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忽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忽视接受别民族的有益经验和帮助等等。第四，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由于国内各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其方法和步骤也应有所不同。因此，必须注意民族的差别，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觉悟，民族间历史上残留的隔阂等。各少数民族的改革，必须坚持和平方式，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考虑，并且同上层人物长期团结合作，协商办事。对于少数民族的改革问题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正是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和实际要求。

解放后，国营贸易机构已经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用合理的价格，供应各族人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收购土产特产。根据民族的自愿，有些民族的农业区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一部分牧业区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人民政府用各种方法帮助各族人民发展农业和牧业生产。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都已建立了卫生机构。少数民族的人口正在逐渐增长。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也不断改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了现代工业。内蒙古和新疆开始建设规模巨大的钢铁、有色金属和石油的工业基地。党在少数民族中采取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共产党员和普遍、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在那里建设了党的队伍和培养了干部。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少数

民族的语言文字，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改善文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充分的尊重。

这样，团结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获得了空前的显著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照耀着中华各族人民前进的道路。

西藏的和平解放扩大了我们在民族工作上的胜利。

西藏之所以能够获得和平解放，一方面，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废除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西藏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入昌都一带地区，并在那些地区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于是，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长期被压抑着的爱国主义立即迅速地昂扬起来。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改正了以往的错误政策，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通知派遣全权代表到达北京，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是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字的。

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必须坚决脱离帝国主义影响，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地区，西藏地区一切对外事宜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即西藏地方政府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协议规定，在西藏内部关系上，对于西藏地方的现行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不加变更；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受到充分的保障。在西藏社会改革事宜上，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

应当主动地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可以采取协商方法加以解决。

这个协议使西藏人民永远脱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奴役，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权利。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汉藏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解放后，党在西藏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加强了西藏民族和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解放前，西藏内部关系是不团结的，解放后，党帮助西藏各方面本着互相合作让步的原则，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历史上的纠纷并增强内部团结。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特别注意西藏的特殊情况。考虑到西藏上层人物和广大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考虑到他们对于祖国统一和内部团结作了贡献，因此，在改革问题上认真地同上层人物协商，使他们绝大多数真正愿意，并且商定一个各阶层都满意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要求上层人物力求进步，主动地负起改革的责任，争取同劳动人民一起完成改革的任务（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蓄谋撕毁这个协议，准备武装叛乱）。为了建设祖国和建设新西藏，人民政府在交通闭塞的西藏高原上修成了工程巨大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修通了西藏几个重要城市间的公路，并且开辟了航空线。扩大了西藏资源的调查研究。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由黑暗转向光明，人口将逐渐增长，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将逐步提高，这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

民族工作的胜利，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 全国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

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伟大胜利和人民政权日益巩固的条件下,遵循着党的指示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从1950年开始预备在三年左右完成的土地改革,是在包括三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进行的。在这样大量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件,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在军事取得伟大胜利后,我国人民对残余的封建制度所发动的一场最激烈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在实际上结束了中国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根据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获得基本胜利和国家可以用贷款办法来帮助贫农解决土地不足或缺少生产资料困难这种新的情况,采用了中立富农的政策。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采取这个政策,就更进一步孤立了地主阶级,并有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领导全国新解放区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从1950年6月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三亿人口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的土地,把土地改革以前每年给地主缴租的三千万吨以上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所有。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开始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有很长的历史的,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广泛地进行互助合作运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1年底

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发展到四千个。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领导和帮助，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运动，为自己的幸福和国家的建设而劳动。农民添置了大量的新式农具和耕畜，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整个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全国土地改革之所以获得伟大胜利，是由于执行党中央的正确土地改革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农民自觉地行动起来。为了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都组织了土地改革工作队到农村中去，逐步地组织了由贫农雇农发展到包括中农的农民协会。在土地改革中，坚决地保护中农利益，对占有土地高于当地每人平均数的一部分中农的土地保留不动。另一部分缺地的中农分得了土地。这样，整个中农每人占有土地的平均数较以前是增加了。采取了保护富农的政策。土地改革法规定：第一，对于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第二，对于富农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保留不动，在某些特殊地区，得征收其出租土地一部分或全部。第三，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对其出租的部分，加以征收。这样，富农在土地改革后每人所得的土地，一般相当于当地每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两倍。土地改革的步骤是：农民协会和农民代表会议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广大的农民自觉地起来和地主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反霸减租退押，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或缺少生产资料的农民，彻底实现了土地改革。贫农雇农得到了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

均数 90% 左右的土地,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迫切要求。

这个时期,在城市郊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

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规定:城市郊区所有被没收和被征收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连同国家所有其他可分的农业土地,由人民政府交由乡农会,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所有被没收的生产资料由农会接收,分配给缺乏这些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规定凡是在郊区使用机器耕作的农场、菜园、果园等,无论为地主或农民所经营,也无论土地所有权有无变更,都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使用。

这些条例是为适应城市建设、工商业发展和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的特殊状况而制定的。

土地改革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从而消灭了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基础,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人民,遵循着党的指示,进行了工商业的改造。

改造工商业包括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

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就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使私营经济能得其所。当时,人民政府采用了对于可能维持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厂,进行加工订货或其他方式的扶助,使它们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而生产,并使它们取得合法的利润。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一方面加强了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加强了生产和市场的计划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私营企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的问题,并允许它们取得合理利润。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步骤。1952 年 6 月对

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收购,上海占私营工厂营业总额的 80%,天津占 60%,广州占 50%以上。

在调整劳资关系上,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两方面的偏向,有些资本家顽固地不承认工人必要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工人对资本家提出过高的要求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确认工人必要的民主权利;必须确认发展生产是有利于人民经济的;劳资间的紧张关系应以协商方式求得解决,然后过渡到固定的合同关系。

为了调整产销关系,全国公私经济成分必须逐步加强计划性,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实行产销平衡。

1951 年 10 月召开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人民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我们要进行建设,实行国家工业化,就必须积累资金。而资金从哪里来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资金积累。国营企业的增产节约效果是最大的。这些企业增产节约的主要方法是:纠正积压资财的现象,避免由于流动资金周转太慢而引起的浪费,避免在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避免工业设备利用不足的现象,节省使用原材料,减少管理费用,精简企业和机关的人员编制,杜绝贪污浪费行为,等等。实行这些方法,从而提高全国国营工厂矿山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使创造出来的财富能够大量地用于再生产。

应当知道增产节约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针和基本方法。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必须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的大敌,而官僚主义是

贪污、浪费的温床。如果不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增产节约运动就不能顺利展开。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害”在革命政权下依然存在，而且比胜利前的解放区时期有了发展，一方面由于在胜利后党对于旧政权和企业部门的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方针，他们之中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一部分干部对于革命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进攻缺乏足够的警惕。他们忽视或无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必须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向我们进攻的警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为，因此，“三反”运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斗争。

在“三反”运动的同时，我们又进行了“五反”运动。这是对于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所举行的猖狂进攻的一个反击。解放后，许多资本家是不甘心接受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政策的，在商品滞销和原料来源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接受加工订货，一到产品畅销和原料不困难的时候，就又希望摆脱这个限制而去追求自由市场的高额利润，甚至有一部分资本家采取非法手段去追逐暴利，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向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大肆进攻。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的内奸分子和外界不法资本家勾结起来进行的，这些行动决不仅是贪污盗窃者违法乱纪的问题，而主要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资产阶级企图窃取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这就是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直接进攻，所以“三反”、“五反”运动的本质，就是保持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

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迅速地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对于“三害”、“五毒”采取了适当的方针。在“三反”运动中有4.5%的国家公务人员，由于有不同程度的三害行为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这个运动纯洁了国家机关，使得人民政府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国家机关内部的纪律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使得国家的开支大为节减。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审查了四十五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其中一部分曾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对他们进行了守法教育和作了适当的处理，其中特别严重的并给以法律的制裁。“五反”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违法行为大为减少，把它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所以，“三反”、“五反”运动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运动。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为了团结和教育他们，使资本家在事实面前获得有益的教训，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逐渐进步和逐渐靠拢党和政府。我们又划清了严格的界线，只取缔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那些违反国家法令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同时保护那些有利国计民生和爱国守法的部分，避免生产和正当经营的停顿。使资本家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工商业才是他们的正确道路。“三反”、“五反”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极大地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并为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清除了障碍和准备了条件。

此外，三年来，我国政府还进行了重点建设，特别在铁道和水利建设上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有良好的交通运输，使工业区和农业区联结成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到1950年上半年，全国原有铁路已经完全恢复，为了发展经济和开发内地资源，从1950年下半年起，政府以大量投资修筑铁路。从清朝末年以来，四川人民渴望了几十年而没有兴修的成渝铁路，解放后以两年时间即已建筑完成，陇海路也通到兰州。这些建设大大有利于西南部和西北部各省的经济发展。

三年来，政府对于全国四万二千余公里的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对于一些水灾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永定河等，已经开始进行全流域的根本治理，其中淮河水利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从规模和速度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长江、黄河这些特别巨大的河流，由于治水工程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也举办了临时性的防御措施。三年中在水利工程上，所完成的土方有十七亿立方米以上，这等于十条巴拿马运河或二十三条苏伊士运河所完成的土方。水利建设的成功改变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河流失修的状态，基本上解除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受洪水灾害的严重威胁，保证了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命的安全。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努力，以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在解放后的三年间，在伟大抗美援朝运动的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的号召。

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志，就是经济恢复、收支平衡、物价稳定。

(一)经济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部恢复和超过1949年的水平。1952年,全国工业农业生产总值为1949年的1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了278.6%。现代工业的产值1949年占工农业总值的17%,1952年增到26.7%。生产资料比较消费资料有更大的发展,两者在工业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上发生了变化。1949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占工业总值的29%,到1952年增为39.7%。社会主义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工业中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所占比例,由1949年的36.7%上升到1952年的61%。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比例,由63.3%降到39%。

1952年,农业生产总值为1949年的148.5%,其中粮食144.8%,棉花293.4%。我国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可以输出国外。棉花也能够供应国内的需要。农业正在以日益增多的原料,供应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内工业,并适应着国内在粮食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又消费着日益增加的工业制造品。

(二)财政平衡。三年来,我国的总收入每年都有增加,并在1952年达到了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国家总收入以1949年为100,1952年增加到239。而国家的收入又是以扩大生产为基础的,1950年,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税款和利润,在国家总收入中只占34%,到1952年增加到56%。在支出方面,虽然当时必须用很大力量去加强国防建设和进行抗美援朝,但在1952年还把支出预算中的半数以上充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经费。

(三)物价稳定。1952年物价达到了完全的稳定。如果以1950年3月,即实行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那个月份的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那末,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6月

为 91, 12 月为 96.6, 1952 年 6 月为 92.4, 12 月为 90.6。这说明了两年多以来,我国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而 1953 年更达到了完全的稳定。十多年来物价狂涨的威胁从此完全解除了。

经济恢复、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从 1953 年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

六 中国职工运动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整党建党工作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事业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不但已经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而且已经证明自己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

1948 年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那时,人民解放军还在进行解放全中国的紧张进军中。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工人阶级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任务。这次大会以后,中国工人阶级遵循着党所指示的道路前进。在解放区,工人们积极进行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们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在全国各个城市的解放过程中,工人们进行了英勇的护厂斗争,保护了人民的财产。在解放了的城市中,工人组织协助人民政府,接管了官僚资本的企业,把它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从敌人手中把工厂矿山接收后,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一次民主改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

动,发掘生产潜力,推广先进经验,实行经济核算制,提高劳动生产率。

解放后三年中,中国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劳动竞赛。参加竞赛的职工,占职工总数80%以上,出现了劳动模范二十二万三千多人,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共有四十八万九千多件。我国经济的恢复,正是这个热烈的劳动竞赛的结果。

解放初期,在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正确地执行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恢复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但在后来,资产阶级用“五毒”发动了对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工人阶级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把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所规定的范围。

这个时期,工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会发动千百万工人群众自觉地参加经济建设,一方面,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增加企业的积累和国家财富,另一方面,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劳动保险,改善劳动条件,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把改善工人生活和发展生产相结合,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把经济建设和共产主义相结合。工会教育工人,使工人群众懂得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并以英勇精神为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是党关于工会工作的列宁主义的原则,党一贯地坚持这个原则。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要用教育说服的方法,来发动工人群众在生产上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在增

产的基础上逐渐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因此，必须使工人群众了解国家生产计划对于我国的发展和工人生活福利增长的重要意义，了解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于本企业的具体要求，了解本企业制定先进生产计划的重要性，等等。这就是在实际上吸引广大群众学习和参加企业管理，也就是最实际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人群众这种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完成国家计划最可靠的保证。

同时，应当知道：解放后工人阶级成员的复杂性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影响和侵蚀工人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小生产者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小生产者的传统习气也不断地影响工人阶级。所有不遵守劳动纪律、过高地要求生活福利、作投机生意、购置土地、囤积粮食、在私营工商业中参加股份等现象，都是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工人群众中不倦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是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基本保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党在执行这条路线时进行组织工作的结果。作为我国的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保证在解放后进行国家建设，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首先用来恢复经济，在恢复时期结束后用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国家经济恢复和改造工作能否以最大速度进行，能否正确地进行，决定于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放弃党的领导，经济工作就会迷失方向而有可能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让未经改造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自流发展。如

果是这样，就必然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破坏工农联盟，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我国经济就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因此，只有增强党的战斗力量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量，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纪律上的严肃性，党曾不懈地和党内的缺点以及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从1942年以来党进行过多次的整党运动，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就。历史事实证明，我们每进行一次整党运动，革命事业就向前迈进一步。

为了整党和健全党的组织，1951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自1951年下半年起，对于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由于党员数量的众多和全国各地解放时间有先后，工作水平的不一致，这次整党预定是在三年内完成。整理组织的基本方法是经过所有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并在这个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

在整党时期，党和政府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运动中锻炼了党员，考验了党的组织，也实际有效地整理了党的组织。这次运动证明了大多数党员能够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符合共产党员标准。但也暴露了一部分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甚至有个别分子，蜕化变质，成了党的叛徒。同时，还揭露和清除了混进党内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危害，使每个党员都切实了解共产主义的前途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划清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明确今后斗争的方向,提高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

整顿党组织的步骤是:首先,每个党员都学习有关文件和报告,然后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这种学习使每个党员都切实了解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登记,按照党员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改造自己。登记后进行审查,审查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的。审查后进行处理,符合党员条件的提高一步;不够党员条件而愿意改造的,进行根本改造;不愿意改造分子、异己分子、不忠实分子、变节分子,清除出党。

全国解放后,经过了许多群众运动,在群众中不断地出现和锻炼了许多积极分子。进步群众由于阶级觉悟提高,要求加入共产党,这是建设党的有利条件。党为了扩大和加强同劳动人民的联系和对国家建设的领导,也需要从各方面发展党的组织。因而在每一地区完成整党的工作以后,就进行了建党的工作。发展党员的主要办法是在劳动人民的积极分子中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教育工作和考察工作,就是首先在他们之中广泛地进行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使得要求入党的人懂得党员的标准,承认这个标准,并愿意使自己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教育基础上,经过审慎的选择和系统的考察,把其中最优秀人物即合乎党员标准的人吸收入党。

整党和建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和统一,使全党的质量和战斗力更加提高,从而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负起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任务。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

(1953年至1956年6月)

一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无数先烈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原则，已经有所规定。1952年底，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从1953年起，我国已经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受，列入我国宪法，成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重要条件。

我国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我国经济很落后,过去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工业,但是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其中重工业的比重更小。经过恢复时期,我国的经济前进一步,但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这就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工业,自己可以制造各种工业设备,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必要条件。

重工业是整个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我国是六亿人口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里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要建设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就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列宁根据社会扩大再生产必须使生产资料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重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要使国家经济事业得到不间断的高涨,要高速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由重工业不断地为其他经济事业提供技术装备、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只有首

先发展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才能加速工业建设的速度。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除了重工业以外,它还包括其他许多可以满足人民需要、积累建设资金和配合整个社会进行再生产的经济部门。这些经济部门就是:农业、轻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因此,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依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建设,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来逐步建立计划经济。

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部分。土地改革完成后,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分散的落后的,它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同时,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着两极分化。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农业是工业的原料基地和粮食基地,农业人口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农产品是出口的大宗。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

但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显然赶不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现代社会如果没有逐年增加的积累,它就不能发展,而逐年增加的积累又非有逐年的扩大再生产不可。我们国家的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而发展的,因而它的生产逐年增加,可是我国小农经济的大部分是不能逐年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但国民经济中的工业和农业必须有正确的对比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工业和农业,这两种经济部门必须密切结合,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否则,工业和农业没有正确的

对比关系,特别是工业和农业建立在两个对立的经济基础之上,一个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一个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整个国民经济就有分裂的危险,结果,我们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把小农经济变为现代化的农业,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引起农民的深刻的分化,少数投机者剥削者变为资产阶级,而绝大多数的农民陷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小农户联合成为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使广大农民过着日益美好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我们既不能让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停留于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也不能让小农经济自发地走着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末,我们就只有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让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首先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进一步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然后再进一步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经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这是改造我国小农经济的道路。

手工业过去和现在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手工业者和农村广大农民有密切联系,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和消费用品。但是,手工业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个体经济之上,资金短缺,经营规模狭小,保守思想和行会思想严重,因而生产力是很低的。个体手工业者既无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也无力改进技术,就不免助长手工业生产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不仅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利,也影响到国家建设的计划性。

国家对个体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即经过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部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因为它可以增加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工业化资金的积累，扩大产品的流转，维持劳动者的就业，训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必须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因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这种唯利是图的本质，使资本主义的经营必然带着投机活动，“五毒”行为等消极作用。必须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必须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经过国家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的监督，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种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不能为所欲为地唯利是图，所以，它是特种资本主义。它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以及初级形式的统购、包销等。

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个人的改造相结合，既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最后地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还要改造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积极有益的作用。

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斗争就必然有利于消灭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大步骤。

我国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从1951年初就已开始了。1953年国家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虽然在我国编制长期的建设计划有很多困难，但经过两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取得不少经验，五年计划草案经过多次的补充和修改，最后编成了。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真地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出决议，建议党中央对这个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审议和通过，把它作为我国的计划。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造这两个方面。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就是进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建设，建立和扩大电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机械制造业等等。因为，这个五年计划是以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中心的，它规定工业投资占总投资40.9%，规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62.7%，制造生产资料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88.8%。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及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等。

由于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工业生产的发展

速度是很快的，在五年内，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14.7%，到1957年我国工业生产将增加一倍。这个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常发展速度所不及的。

其次，对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以部分的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来初步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尽可能增开荒地，保证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注意发挥单干农民潜在的生产力量。规定农业及其副业的生产每年平均增长4.3%。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扩展公私合营企业，加强对私营企业产品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并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树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计划规定五年内把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之中。

实现这个计划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6.7%上升到1957年的36%。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9.7%上升到1957年的45.4%。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将有很大的增长，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将由1952年的61%上升为1957年的87.8%。在社会零售总额中，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商业将占78.9%。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在中国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就是在

我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因此，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增强党的领导作用，增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

在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向党内党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帝国主义和国内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和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的反动分子，他们要利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中国革命事业。

四中全会唤起全党提高革命的责任心，提高对于敌人阴谋的警惕性和对于党内可能出现个人野心家的警惕性。为了增强党内团结和粉碎敌人破坏分裂党的阴谋，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四中全会向反党分子提出最后警告：对于那些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和党对抗坚决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给以严厉的制裁，甚至把他们驱逐出党。

在党的四中全会前后所揭露的个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①反党分裂活动，就是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在党的内的一个尖锐的反映。

他们反党分裂活动的特点是他们没有提出过反对党中央的纲领，而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进行宗派活动、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收买党羽，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反对党的统一领导，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作是独立王国，准备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来实现他们的个人政治野心。

^① 高岗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饶漱石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工作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①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反党分裂活动，教育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回到党的原则立场上来。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二 我国的和平和统一政策。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人民要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着和平的劳动，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的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而奋斗。我国加强同东南亚和其他邻国的和平合作。我国同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愿意建立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我国愿意同欧洲、美洲和澳洲各国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国为保卫世界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了极大的努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人民发动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斗争，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和苏联及其他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②，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克服了美国政府

①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于1953年6月至8月召开，讨论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于1953年9月至10月召开，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② 日内瓦会议，1954年4月至6月讨论朝鲜和平问题，7月讨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7月21日达成协议。

的阻挠，终于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了世界和平。1954年6月，中印两国、接着中缅两国总理举行了会议，确认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全世界已经获得非常广泛的支持。

美国侵略者一贯采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军事政治集团和联盟。在欧洲，美英法帝国主义建立了北大西洋集团。他们订立了巴黎协定。

在亚洲，美国在马尼拉举行八国会议，缔结了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缔结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亚洲国家的内政，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美国侵略者想通过这个军事同盟来摆布亚洲国家的命运和镇压亚洲人民的解放运动。

美国侵略者曾经企图从台湾、朝鲜、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进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战争火焰先后被扑灭后，美国侵略者就更加利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和准备侵略战争。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集团在1954年12月2日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同时又企图纠合日本、南朝鲜反动势力和蒋介石集团组织所谓《东北亚防务联盟》，并把它同所谓“东南亚防务集团”联结起来，加强对中国的武装干涉。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允许美国侵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一天不解放，我国的领土就一天不能完整，我国的和平建设环境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远东和世界的

和平就一天得不到保障。侵犯别国主权，掠夺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就是危害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正是保卫世界和平。1954年1月11日，我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集团，以最后完成我国的神圣解放事业而斗争。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响应这个号召，发表了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①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宣言表达了我国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解放台湾，保卫和平，从1954年11月起，连续不断地向盘踞大陈、金门、一江山等岛屿的蒋介石军队的阵地作了猛烈的进攻。1955年1月19日，我军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13日，解放了大陈岛。这些胜利，对于最后解放台湾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的正义事业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

中国人民主张和平，用一切办法来谋取和平。我国政府历次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的可能性。并号召在台湾的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激发爱国良心，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但是，台湾解放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是中国内部的事务。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第三者来干涉我国这个内部事务。

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是同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分不开的，也是同国家机关的日益完备分不

^①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开的。

全国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国政府采取了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过渡办法，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来逐步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953年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在基层选举工作完成以后，接着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这个基础上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4年9月15日在我国首都北京开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整个宪法确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达到完全的胜利。所以这个宪法是为争取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宪法，它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愿望。

第一，我国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方法。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贯彻第四条规定的方针，宪法在总纲的其他条文中又作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乃是全部宪法的最基本的实质。

这里的问题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的问题，是通过和平道路来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要用社会主义所有制来代替一切

非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最终成为我国唯一的所有制。宪法指明我国除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是分别属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还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都是完全的私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个体劳动者的土地、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所有权；同时，国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经过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所有权；同时，国家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转变成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逐步把它们变成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主要的过渡形式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即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过渡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宪法把这些过渡形式明确地规定下来，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实现的。宪法总纲中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表明了我国内部的基本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这个人民民主国家正是我国能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我国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我国已经有了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这种国营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经不占统治地位。在我们国家内，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联盟的关系。我们可以依靠这样的国

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当然,由限制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国家行政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用和平的斗争方式来达到目的。

第二,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制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宪法总纲前面两条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统治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行使统治权力,就必须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来组成自己的国家机关,我们国家机关的根本组织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采取这种国家制度是同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我国一切国家机关都要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指导自己工作。依照这个原则,宪法和各项组织法对于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和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和工作制度,都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具有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所没有的立法权,即制定法律权;中央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并受它监督,也可以由它罢免;它有权决定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决定大赦,决定战争和和平等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把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起来,实现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以这些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地代表人民意志,并保证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机关，实行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这样来保证中央国家机关能够集中统一地领导全国。根据集中统一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所决定的国家经济计划、国家建设总方针等等，是全国一切国家机关所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的。

宪法同时适当地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以及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的职权，保证了地方在执行国家的任务和计划时能够发挥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宪法总纲中又保证我国的国家机关成为体现人民意志的机关，督促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成为人民忠诚的服务员，不允许他们站在群众之上，对人民作威作福，或者对人民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这些规定表明，我们国家的组织和制度更加完备，我们人民的民主生活更加发达和健全。这些规定保证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能够团结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高度发挥人民群众和一切地方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

在宪法的许多条文中，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宪法所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表现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点。宪法规定人民在参与国家管理和进行政治活动中的权利和自由；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控诉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的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宪法规定人

民在劳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其他权利：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有在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每个公民又应当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依照法律纳税和服兵役、保卫祖国等等。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没有权利的义务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尽义务的权利，也是不可想象的。每个公民能够充分享受权利，也必须认真履行义务。

第三，我国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友好互助合作，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并保证各少数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中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前进，发展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

宪法总纲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民族已经结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出现了各民族友爱合作的新关系。宪法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并指出“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宪法保证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友爱互助合作。

根据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规定，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各民族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

治权,并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采用各民族人民所能够接受的方法和步骤,发展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

宪法序言中指出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各民族的友爱互助合作的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将给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产生,但它在产生之后就会反过来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推动这个经济基础向前发展。国家的宪法是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它积极地保护和发展已经建立了的的经济基础。因此,我国的宪法今后就成为我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久经考验的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和决定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①等同志以及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人们可以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以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组织经验,使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三 肃清反革命运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了周恩来为国务院(此次大会改政务院为国务院)总理,陈云为副总理。

民的安全的。1951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残余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地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反革命分子的蠢动总是在我们社会变动较剧烈的时期。1955年上半年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他们的破坏活动，一时猖獗起来。他们破坏人民的财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反革命的复辟。

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就是肃反工作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等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第一，必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把公安机关放在党的领导之下，公安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必须经过党的讨论和批准。在公安机关内部实行集体领导。第二，肃反斗争必须贯彻群众路线。肃反斗争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动了群众就能够使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难于逃出群众的眼睛，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肃清大批反革命残余力量而避免大的错误。但是，发动群众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党是斗争的指挥者和组织者，专门机关是群众斗争的骨干。第三，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有反必肃，不把反革命肃清，决不罢手。但是，在肃反中必须划清敌我界线，在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同时，要坚决保护好人。在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时，必须采取谨慎的措施，对捕杀反革命分子实行严格的控制等等。第四，坚持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反革命分子的各种具体情况和我们改造社会、改造人

类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坚持惩办少数和改造多数的原则。就是要把一切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都改造成成为有用的人,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第五,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针对着每个时期敌人活动的情况作出恰当的估计,使肃反部署符合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必须重视真凭实据而不可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的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复杂的尖锐的肃反斗争,掌握肃反的规律,提高自觉性,避免盲目性,克服“左”、右错误倾向。

敌人经过历次打击已经大大削弱了。我国肃反斗争给反革命分子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使反革命分子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而我国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又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这一切对反革命分子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使他们中许多人投案自首。

在全国解放初期,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这个时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秩序,建立革命秩序,只能依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依靠已经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是十分必要的了。一方面,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

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深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有保障,他就不会受到任何人和任何机关的侵犯。另一方面,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一切违法犯罪的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是镇压敌人,惩办罪犯,保护人民。同时为了保护生产力,除了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使他们在服刑期间得到改造,转变为善良的人,继续参加生产。

我国法制必须进一步完备起来。第一,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必须执行审判、侦察、起诉分工的法律程序,发挥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既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积极作用。第二,解放以来,我国在颁布宪法前后,制定了各种法律四千多件。党和政府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按照实际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制定了各项法律条例,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在建国最初几年,政治经济状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定带有固定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的各种法规。而原有许多法规,也应当加以适当修订。我们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这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

四 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1955年冬和1956年上半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到了高潮,

这个高潮首先是由农村掀起来的。

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而农业也必须有互相适应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脱离农业合作化而单独进行的。所以，必须采取使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如果不争取五亿多农业人口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就跟不上去，我国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还没有到来之前，当时在大多数农民中已经表现出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第一，因为土地改革之后，广大的农民生活比较以前当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已耕地不足，时有灾荒和耕作方法落后等等，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仍然不富裕。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第二，因为我国国民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下的巨大高涨，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积极性。

第三，因为我国互助合作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各地方已经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大多数表现了增产的优越性，鼓舞着大量的农民。而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展起来的互助合作运动为合作化的发展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农民积极地起来建立合作社，甚至得不到批准而办自发社。这是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客观的可能性。

但是，合作化运动不会自发地到来的，必须依赖于党的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互相结合起来。必须党的领导工作好了，才可能促进合作化的高潮，否则，即使有高潮的条

件,也不能出现高潮。

毛泽东在1955年7月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步骤。这个方针和步骤为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并写成了党的决议。

第一,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针,就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为了实行全面规划,党中央将全国分为三类不同地区:第一类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先进的地区,第二类为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初步发展的地区,第三类为互助合作运动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必须注意各地区的差别。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各地方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应有不同的速度。

在进行规划工作时,还应当着重注意乡或村的合作化规划,因为这个规划是整个合作化规划的基础。

为了加强领导,党中央指示各级地方党委必须以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任务。他们都要重视农村问题,切实地改进自己对于农村的领导。

第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步骤,就是:必须形成一个坚定的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就是贫农和新中农中的下中农,这两部分人中的积极分子,同时也包括一部分老中农中的下中农的积极分子。首先把他们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步骤是:逐步酝酿,按着他们的觉悟程度,分为多批,建成合作社或吸收他们参加已经建立的合作社。他们之中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就要耐心等待。

在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富裕中农,除了若干真正自愿的可以吸收入社的以外,其余暂时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

他们拉进来。不论在社内或社外，都必须善于同中农共处，决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

建社以前，要有群众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建社以后，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不是一年整顿一次，而是一年整顿二、三次，以便不断提高和巩固合作社。在建社或整社时，必须合理地处理社员的私有财产（土地、耕畜、农具等），以利于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生产计划、劳动组织、财务管理、思想工作等）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个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和合作社已经巩固，才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受那些早已放弃剥削和守法劳动的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

党的方针和步骤被群众所掌握，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在农村中形成了一个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6月，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占农户总数91.7%，其中的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在高潮中，不仅仅是广大的贫农群众积极入社，就是中农群众也有许多主动要求入社，不仅仅是个别农户要求入社，而是整村整区的农民要求入社，贫农和下中农整个阶层要求入社。合作化运动的规模的壮阔是空前的。

中国共产党采取这种逐渐提高逐渐过渡的办法是适合于农民运动的发展的，因为，这种办法使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因而他们也比较自然地脱离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

在我国条件下，先有合作化运动然后逐渐使用大机器，即农业合作化的革命在先，而农业技术的革命在后。在农业合作化

高潮之下，富农已经完全被孤立起来，党采取由限制富农转变到消灭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政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得到了决定意义的胜利。完成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经过合作化的革命为技术的革命开辟道路。

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后，农村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的矛盾已经解决，但是新的矛盾又随着出现。解决新的矛盾，巩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需要我们进行巨大的努力。

第一，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使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互相适应。就是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为此，必须在今后国家建设中增加农业建设投资，尽力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使比较落后的农业和工业保持相应的发展。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而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是：一方面，在原有土地基础上，采取各种增产措施，如兴修水利、开发水源、改良土壤、选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等，来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一方面，发展多种经营，以增产粮食和棉花为主，同时发展其他副业。还需要有正确的价格政策和改进农产品的收购工作。

第三，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方面，首先，国家在农业、副业税收上和工业农业产品的价格上保持正确的比例，使国家积累和个人消费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决。其次，国家对合作社的计划指导，一方面，要把合作社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另一方面，保持合作

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合作社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和履行经济部门的合同义务之外，它有权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

在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方面：在合作社产品分配上，社和社员都要照顾，在发展生产和正常年景的条件下，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社员的收入逐步增加。在生产经营上，合作社要大力做好主要农业生产和必要集中经营的大宗副业生产，而把利于分散经营的副业都交给社员去做。在生产资料的处理上，必须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办法。在社员的关系上，必须采取双方兼顾的办法，既照顾贫农社员也照顾中农社员。还要在组织领导下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等等。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也到来了。因为，整个形势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只有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形势就是：第一，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并且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基本上消灭了市场上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第二，国家工业化的巨大进展，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迅速地壮大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缩小。第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使广大农民最后地抛弃了资本主义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1956年初，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了。

解放后最初几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多数还是接受加工订货这种中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年，国家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主要的

大型私营企业多数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但是,这种形式已经不够了,必须从个别厂店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必须整个行业的工商业都进行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形式。

第一,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比较个别厂店的公私合营有其优越性。因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打破了厂同厂之间的界线,把许多工厂并为一个企业,在生产上更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方针。按着社会主义原则对全行业进行改革,对各企业的劳动、技术、设备、资金、干部进行统一调配,合理使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所有一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中的最高形式。

第二,随着公私合营形式的发展,赎买的方式需要加以改变。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

首先,分配利润的制度规定资本家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的利润(例如四分之一)。随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改善和工人群众劳动积极性的不断增长,资本家从工人群众身上和合营企业中所攫取的股息、红利也就越多。这就同发挥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发展社会生产是互相矛盾的。

其次,个别企业合营时,工厂、商店没有变动,即每个工厂和商店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单位,独立计算盈亏。因此,可以按每个企业的盈亏状况来分配利润。全行业公私合营要实行并厂并店的改革,整个行业成为一个计算单位,这就不能按各个工厂商店计算盈亏,所以分配利润制度就不适应了。

必须采取定息的制度。定息的办法就是在公私合营期间,把

分配于资本家私股的利润，固定在一个息率上。1956年2月8日，国务院规定年息为一厘至六厘，即年息1—6%。6月18日，国务院宣布息率统一规定为五厘。定息之后，不论盈亏，资本家可以得到一定股息。这样，一方面，国家每年要拿出一定数量的现金（股息），分配给资本家，作为赎买资本家的企业的代价，经过一定时期，条件成熟了，就把企业收为国有。此外，资方人员凡是能工作的都由国家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适当的安置。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赎买办法。

定息制度使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实行定息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在生产关系上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家对于企业的所有权在极严格的限度上表现出来，即仅从定息上表现出来。资本家不能直接掌握企业，不能变卖企业。企业的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国家手里。资本家在企业中参加管理已经不是以资本家的身分在工作，而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在国家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由于企业的生产资料在国家的直接掌握下，由于企业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来经营管理，由于资本家的股息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息率上，这一切使这种企业在性质上，成为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工商业踏上了这个决定性的一步，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

第三，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需要建立企业性的专业公司。这种专业公司具有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它的经济任务就是清理财产，改组企业。1956年2月8日，国务院指示中规定必须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合营企业的实有财产进行清理估价。规定私营企业在批准公私合营以后，要改变原有的生产制度和经

营制度，所以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政治任务就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对资本家采取积极的教育方法，组织他们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改造运动，并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从一个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企业改造和人的思想改造必须互相结合，只有改造了企业，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的实质，只有实行思想改造，才能使他们积极协助企业改造，减少将来对企业国有化的阻力，并放弃剥削，从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

由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由于党采取了逐步改造逐步赎买的政策，这就形成了推动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的总趋势。

从1956年1月起，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突飞猛进。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大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些地区的手工业也全部实行了合作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体现了党的总路线，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其中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较为缓慢，但由于党中央及时地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被原来的规定所束缚。

这样，在农村中所掀起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全国91%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中所掀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企业，手工业者加入了生产合作社。

这些巨大的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仅失去了小农经济这块土壤，而且也失掉了在城市中所占据的阵地。我国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这样,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变革。这个伟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改造的理论,终于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而未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造成了某些不良的后果。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9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结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的实际，进行复兴中华和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七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新鲜的经验。

前三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条战线的严重斗争和改革工作。保卫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迅速地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一九五二年，党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创举。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过渡形式。到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大陆上，基本上完成

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的东方，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这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新的历史时期，向中国人民提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

不论道路如何曲折，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坚持不懈地奋勇前进！

出版说明

这本书是何干之同志《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的最后修订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何干之同志应高教部委托主编了这本讲义。一九五四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高教部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中国革命史课教材。一九五七年经作者第一次增订，内容写到一九五六年六月。之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三次再版，累计印数一百六十余万册。并先后译成英、俄、越等文字在国外发行。

一九六四年，外文出版社要求何干之同志再次修订此书，译成英文出版。何干之同志以一九五九年版本为基础，对此书新民主主义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增补和删节。修订后全书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论述简要。一九六五年此书修改稿完成后，因风云突起，未及翻译出版，只保存下一部修订手稿。近几年来，由刘炼同志编辑校注《何干之文集》（三卷），经与我社商定，选这本何干之同志生前最后的修订本编入《何干之文集》第三卷，并由刘炼同志负责校订注释工作，恢复原书第十四、十五章两章（即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部分）。除个别问题略作修订外，保持原作风貌。

鉴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学生和广大干部、青年学习研究中

国现代革命史的需要,我们决定在《何干之文集》出版之前,先单行出版此书,以飨读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元月